

XUESHUYANJIU

2/033

4
1982



目 录

我国试办经济特区问题初探	张汉青 (5)
从战略意义谈经济特区的作用和建设	孙 霏 (19)
主流·问题·建议	曾牧野 (28)
试论发展广州与深圳、珠海特区的经济联合	林滨 江永泰 李惠琴 (33)
加强管理, 加强立法	
——再探经济特区立法问题	王致远 (38)
特区经济条件的变化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新问题	
.....	吴群策 吴赤锋 郑伟标 (45)
试论社会生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柯木火 (52)
美国工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系统化、数学和电子计算机在管理中的应用	赵元浩 (56)
实证主义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	罗克汀 (59)
学习《实践论》	艾思奇 (遗作) (65)
关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问题	邓 超 (77)
对习惯力量的哲学探讨	王锐生 (82)
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	
——陈郁同志早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陈慧道 吴 然 (87)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朱杰勤 (92)
· 读史随笔 · 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曹松林 (96)
宣德写本金钗记校后记.....	刘念兹 (98)
茅盾小说的语言艺术浅谈.....	庄 森 (106)
略谈谷柳在香港发表的剧作.....	杨玉峰 (112)
培养学生抗腐蚀的能力.....	何 辛 (116)
后进生的形成及其转变.....	黎民安 刘大德 (121)

“嚼杨木”辨	易 名 (82)
书 关于赵佶的死所	陈继礼 (97)
海 读鼻禪考	董志翘 (105)
韵 兮	董志翘 (64)
藻 狗马病	张 蓁 (115)

· 学术动态 ·

广东省社联举行庆祝“七一”座谈会 (58) 在我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上, 经济学界就经济特区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86) 胡钟达教授在穗作学术报告 (51)

封面设计.....王海宁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4, 1982

CONTENTS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Areas in Our Country Zhang Hanqing (5)	5
The Role and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Areas—As Viewed in Terms of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Our Economic Construction Sun Ru (19)	19
The Economic Mainstream, the Challenging Problems, and My Suggestions Zeng Muye (28)	28
On the Economic Coordination Between Guangzhou and the Special Economic Areas in Shenzhen and Zhuhai County Lin Bin, Jiang Yongtai and Li Huiqin (33)	33
More on the Legislative Problems of Special Economic Areas Wang Zhiyuan (38)	38
New Problems in Building Up Socialist Moral Values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Special Economic Areas Wu Qunce, Wu Chifeng and Zheng Weibiao (45)	45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Production and Building Up Moral Values in a Socialist Society Ke Muhuo (52)	52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atization,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Management Zhao Yuanhao (56)	56
The Positivism Movement and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On the Party Affiliatio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Luo Keting (59)	59
A Study of Comrade Mao Zedong's Article, "On Practice" Posthumous work by Ai Siqi (65)	65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Unique Features Involved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in Our Country..... Deng Chao (77)	77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Force of Habit

..... Wang Ruisheng (82)

From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to the Guangzhou Uprising

—Facts Concerning Comrade Chen Yu's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Guangdong

..... Chen Huidao Wu Ran (87)

Personal Views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 Zhu Jieqin (92)

Reading Notes on History

“Zhèng Yuè” Came to be Pronounced As “Zhēng Yuè”

—Was This Change Due to an Intent to Avoid
a Taboo in the Qin Dynasty?

..... Cao Songlin (96)

A Postscript to “The Story of the Gold Hairpin”

—A Drama Manuscript of the Ming Dynasty

..... Liu Nianzi (98)

Personal Tentative Views Concerning the Art of Language

in Mao Dun's Novels Zhuang Sen (106)

A Brief Comment on Huang Guliu's Play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Yang Yufeng (112)

Helping Pupils and Students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ve Forces” He Xin (116)

How Some Pupils Became Trouble-Makers and the Way
to Reform Them

..... Liu Dade and Li Min-an (121)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Recent Academic Developments

我国试办经济特区问题初探

张 汉 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近三年来，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领导、关怀下，在兄弟省、市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艰苦创业，锐意经营，我省深圳、珠海特区建设已获初步成果，汕头特区的建设也开始起步，一个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可喜局面正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特区在筹办以来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个新事物，人们的认识在有些方面也还不一致；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人们去分析研究。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认真总结经验，开展经济特区问题学术研究，必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试办经济特区这一重要决策的认识，有利于统一思想，坚持实践，保证特区建设健康发展。

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经济特区的诞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是伟大的战略转移，是为了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这个主要矛盾而作出的。我们冲破了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的束缚，以科学的态度深入了解和冷静分析我国的国情，确认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才能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必须进一步清除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错误思想，认定四化建设仍然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闭关自守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党中央果断地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经济特区，就是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特殊的但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诞生的。

“经济特区”这个名称，目前只有我国采用。但是，世界上，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划出一定的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用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以达到一定经济目的的经济性特殊地区，却是很多的。它们的具

体特点和名称多种多样：有以促进对外贸易、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贸易区”，也有以促进加工出口工业为主的“加工出口区”，还有“自由工业区”、“自由关税区”、“自由港”、“自由边境区”、“促进投资区”、“科学工业园地”、“保税仓库区”、“过境区”等等，总之，都是不同形式的经济性特区。现在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办了三百五十多个特区。这些特区，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办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不仅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办的，而且有相当多的特区是发达国家办的。美国就是世界上设立特区最多的国家。

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试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内外经验，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一九七九年三月，广东省委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中，向中央提出了积极发挥广东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经济贸易，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中央同意省委的意见。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厦门试办和设置“出口特区”，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关于试办特区的决策确定以后，广东即着手进行筹划工作。省委、省政府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和特区建设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比较、分析、研究了世界上一些有关出口加工区的资料，作为借鉴，并对深圳、珠海等地作了实地调查，提出了试办特区的初步设想。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也就从此开始。

万事起头难。特别是在经历了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和“左倾”错误之后，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的路子，每迈进一步，都不是容易的。然而，三中全会路线的威力是至为巨大的。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的实践，必将使我们能够探索出一条如何办好经济特区的路子来。事实证明：经过将近三年的实践和探索，对社会主义中国将要办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区，我们的认识同三年前相比较，在许多方面都明确得多了。

我们认为，我们的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地点，划出特定的区域，借鉴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对我们有用的经验，采取特殊的开放政策，以更优惠的条件和更灵活的方式，更广泛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现代化的经济区。这就是说，我们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考虑我们的特区建设，同时我们又要创造条件把外资和对我有用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吸引到特区里来。在试办特区的整个酝酿过程中，着重考虑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试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办特区可以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从中取得外汇收入，以补我国外汇基金不足，帮助国家发展经济；可以增加劳动就业。然而，试办经济特区的战略目标不能简单地看成就是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指出，设置经济特区，是“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试办经济特区，能够在划定的区域范围内相对集中引进外资，可以方便和加强对外

资企业（包括外资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企业）的管理。特区将作为一个经济阵地和试验基地，适应和运用国际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遵循国际交往的惯例，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积极探讨现代化建设的有关问题。即使工作中出了一些乱子，也只局限在那么几块地方，不致影响大局。这就是说，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根本目的，不单要使特区本身的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从促进我国四化建设出发，利用经济特区直接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试验各种改革，包括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我们就是要很好地发挥特区“观察”、“学习”、“试验”这三个作用，并从中找出能用之于全国的带共性的东西，加以推广和介绍，为四化建设服务。同时，办好经济特区，对于稳定港澳人心和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特区的模式和经营发展方向是什么？鉴于深圳特区同国际贸易、金融、旅游和运输都很发达的香港毗邻，有利于吸引港澳同胞、华侨资金和外国人资金，珠海特区与澳门陆地相连，距香港仅三十六浬，出入境和交通都较方便，作为长远目标，这两个特区（首先是深圳特区）可以建成以办工业为主，兼办农牧、旅游、商业服务、住宅以及科学教育事业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汕头是个老港口，特区有老城区作依托，老城区电子工业、轻工业、手工艺比较发达，又是重要的侨乡，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条件很好，可以建设成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同时发展旅游等行业的特区。

第三，特区将来的得失如何？会不会带来什么危险？因为特区主动“放”外资进来，人们自然要考虑到它有没有变成新殖民地的可能。我们认为，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产物，是殖民主义对弱小民族和国家进行弱肉强食的结果，是领土被侵占，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丧失了独立和自由，人民处于受奴役、无任何主权地位的国家或地区。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试办特区，这是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是我国对主权的运用，是不允许变成新的殖民地的。人们也可能会担心，我们的经济特区将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特区那样，失去社会主义的特点。我们认为，我国试办的经济特区，同当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办的各种类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关税区”和“自由港”，虽然在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却又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的特区实行与国内和省内各地不同的更加特殊的政策和更加灵活的措施，但也必须是在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基础上的特殊，必须是在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前提下的灵活。特区的党组织和政府，在政治上，必须毫无例外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巩固祖国神圣边疆，维护我国主权和社会主义法制；在思想文化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上，特区将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吸引外资进来，但正如列宁指出的，这种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4页）它必须服从于我们国家的有关法律、法令和条例。因此，我们的特区容许外资的活动，显然不象旧中国那样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而是以我国掌握国家主

权为前提的。我们虽然现在经济上还不发达，但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强大的，是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一切利用外资的优惠条款是根据我国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的，所有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合同或协议是遵从我国法律和国家意向来签订的。特区范围内的外资企业所享受的优惠待遇尽管较多，但必须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保障外资企业的合法经营及正当收益为限。特区在行政管理上有别于内地，但是其目的仍在于使特区的经济活动更加方便有效，利于吸引外资，而不能有损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经济特区的设置，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主权为前提，以十亿人民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后盾的。当然，特区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又处于试办阶段，带有很大的探索性和试验性。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新矛盾，甚至可能发生一些挫折，或吃亏上当。实行对外开放，试办经济特区，是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这里既有合作，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斗争。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拒绝同国际资本交往的思想是错误的。同时，在同国际资本交往中，任何忽视和放弃斗争的思想和行为也是错误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一方面肯定要搞租让制，同时又强调租让制并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是“战争”在经济范围的继续，不过是另一种对我们更加有利的“战争”。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指导思想出了偏差，工作上存在严重失误，特区的建设就将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的。因此，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大胆试验，又要谨慎小心，摸着石头过河，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做好。

综上所述，对我们试办的特区，可以归纳成几句话：

- 特区悬挂的是五星红旗；
- 特区内执行国家权力的是特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
- 特区的法院、警察和一切专政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 设在特区各口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 在边境上站岗放哨和巡逻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 特区引进的外资在我法律和总体规划容许范围内活动；
- 特区的宣传舆论工具都是我们的；
- 特区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基于这样的考虑，原来提出的“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显得不能准确地概括我国特区的特点和要求了。为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准确地反映我国特区的性质和特点，一九八〇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确定把“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后来，又明确地写进了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去。这就鲜明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办的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这几块特区，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的几个经济性特殊地区。

二、试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的路子。中央把试办经济特区作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经济特区，这是一件全新的事物。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大胆的、有远见的，同时又是符合客观需要的。

自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破了国家的界限，商品流通在国际范围展开以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的局面。其范围日益扩大，程度日益增强。这是社会化大生产从国内交换扩大到国际交换的必然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共产党宣言》第27页）后来，斯大林更进一步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前一世纪就呈现出一种趋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国际化，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上接近，广大领土逐渐联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敷设和资本的输输出等等，更加强了这种趋向，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既然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既然它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那末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过程，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49页）世界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不但劳动、资金是国际性的，生产设备、科学技术也是国际性的；不但发展中国家急需利用外国资本，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方法，摆脱本国社会经济落后的面貌，就是发达国家也是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当时俄国是一个生产力很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落后国家，曾经十分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甚至是迂回曲折的过渡办法，其中包括实行著名的“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列宁主张苏维埃国家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经验，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认为这是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列宁明确提出：“已经夺到政权的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6页）列宁在这方面的首创性论述，成为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研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有用的经

营管理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多年前也曾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我国今天的情况，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际环境上，都同当时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国现在用试办经济区的特殊办法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学习外国先进经营管理经验，促进经济繁荣，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其客观必要性。首先，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相类似，不是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而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取得的，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十分贫困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因此，在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当落后的，离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还很远。我们是在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划出特定的小块地区，更广泛更集中地引进外资，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特区的诸种经济成分中占居相当主要的位置，这是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伟大尝试；但若从当前我们经济发展状况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这点来说，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又是相同的。其次，建国以后，我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六十年代后，社会帝国主义又想方设法孤立我们，限制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再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左倾”指导思想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片面理解自力更生，搞闭关自守。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内乱期间，把同外国正当的经济交往统统污蔑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造成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外处于经济上的隔离状态，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越拉越大。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党的指导思想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以及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为我们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打开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中全会确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我国四化建设需要的正确决策。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家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把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通过平等互利的交换，以天下之长，补我们之短，以便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长处。设置经济特区，正是服从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个总战略，是加快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决策。

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试办经济特区，面临着十分有利的形势。我国被封锁、被包围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加上当前国际上大量资金和设备技术急于寻找新的出路，这对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设置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仍然闭关自守，墨守成规，不敢和不善于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条

件，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加快四化建设，那就要犯时代的错误。

试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经验，充分估计其客观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为尽快摆脱我国经济上的落后地位，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郑重决策，它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思想的产物，而不是一项随意决定的政策。战略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也必须坚持。将近三年的实践，已经为试办经济特区决策的正确性提供了不少证明。我们坚信经济特区能够越办越好。

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特区的“特”与“不特”

资本主义国家办加工出口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的特区，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强化资本主义，与它的制度本身没有性质不同的矛盾。我国试办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划出若干小块，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与外资进行经济合作。它既有别于国内其他地方，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地区，但又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政策轨道。它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之间既合作又充满矛盾斗争的状态中存在和发展的，是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试验基地。试办经济特区，能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指导思想，是成败的关键。只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与资本主义国家办特区的区别，正确处理国家、经济特区和外资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敢于同外来的投资者打交道、进行合作，又能保持我们原则的坚定性，经济特区就一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这就是说，我们试办经济特区，必须具有两个方面的坚定的、同时又是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经济特区就是要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这点上真正“特”得起来，要为特区建设者与外资合作提供活动的舞台；这是为了加速我国四化建设而进行的必要试验，决策既定，就要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特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因而在有关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决做到“不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这个根本点。如何正确掌握 and 处理好这个“特”和“不特”的辩证关系，是观察和处理经济特区建设全部问题的一个根本之点。没有第一个方面的“特”，那就否定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没有第二个方面的“不特”，经济特区的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出现有损国家主权的事，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对这“特”和“不特”两个方面，全面地、辩证地加以运用，贯彻到特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就将使我们的经济特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点而又不同于国内其他地方，是经济上充满独特色彩的地区。

第一，建设经济特区，主要靠引进和利用外资。这种与外来投资者的经济合作，是相当长时期的。因此，经济特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将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绝对优

势，而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成分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当然，引进外资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设置经济特区的初期，由于特区的基础设施缺乏，各种立法也不健全，这时引进的外资多数是比较低级形式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等，这是合乎实际的；随着各项吸引外资的条件逐步具备，比较高级的形式和能容纳大量投资的合资、合作经营等就将大量发展，取代来料加工等低级形式而占居主要地位。这种合营的企业，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外来投资者合作投资和共同经营的，它们在企业内部发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通过我方担任董事会董事长等形式掌握企业的领导权，因而这种企业明显地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从比较更能正常体现互利原则，或者从对我更为有利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对发展这种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比如联合成片开发土地，就是在我方资金缺乏的情况下，从兴建基础设施开始，就利用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人的投资，双方合作开发。这种引进外资的形式，在国家处于调整时期，拿不出很多资金投资搞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更有其可取之处。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特别是充分调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特区建设的积极性所摸索出来的路子，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有利于解决特区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二是有利于学习和吸收国外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好经验；三是有利于利用外来投资者在世界上的广泛经济联系，一揽子引进资金、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沟通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通过成片开发，把自然土地变为城建用地，并最终建成为现代化的新兴城市。至于外来投资者独资经营，也是引进外资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企业，虽然是我们同外来投资者在企业外部发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它只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特区的有关法律、法令和条例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经营，要服从特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要交纳营业税、房地产税和利润所得税等，并在经营范围上受到一定的必要的限制，不能为所欲为，因而同样带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还有外汇贷款，纯属向外资的一种借贷关系，不算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受偿还能力的制约，这种外汇贷款在特区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利用外资形式。总的说来，在经济特区如果不是以利用外资为主，那就同办特区的本来目的相背离。设置经济特区而吸引不进外资，那不是特区的成功，而是失败。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经济特区，既然是以利用外资为主，那么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就无足轻重了呢？其实，在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经济与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着，企业的劳动者和绝大多数管理人员，是我们的职工，各种经济杠杆，如税收、信贷、利率以及各种费用价格等，也都主要是掌握在我们手上，只要运用得好，就能左右特区的经济活动，使外资在我们规定的活动范围进行经营，取得合法利润。

第二，经济特区引进外资企业的产品原则上都是外销，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因而这部分的生产和供销主要是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价值规律在产供销各个方面起着支配的作用。这些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价值必需在国际市场的交换中得到承认，否则

就没有竞争能力，甚至无法进入国际市场。由于引进外资企业将成为特区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特区比内地、比非特区更要注意市场调节，价值规律、国际资本活动的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都更大。因此，不断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特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特区也确实具有许多国内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有利条件。首先，经济特区与外来投资者合作办企业，这些外来投资者与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来往渠道比较多，科技经济情报和市场信息比较灵通，这就有可能不断采用新技术，比较好地做到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作出灵活反应，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其次，由于特区的土地使用费较低和劳动力比较便宜，生产成本也相应地比较低，可以使外来投资者有可能获得高于国际平均利润率的收入，从而充分发挥其经营积极性。虽然经济特区的土地使用费和劳动工资不可能一成不变，但这种变动只有伴随着土地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劳动力素质和熟练程度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因而并不影响企业的经营效果。至于经济特区需要不断引进先进技术装备，需要培养训练越来越多的掌握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这种与提高特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直接相关的做法，同外来投资者谋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愿望也是一致的。只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善于处理好同外来投资者的关系，经济特区企业的设备更新，引进新技术，采用现代化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比其他地方的条件更为有利。再次，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愿为振兴中华作出努力的积极性，也要给予应有的估计，并把它作为搞好引进外资和合作办企业的有利因素而自觉地加以运用，广东在海外的华侨大约超过一千万人。港、澳两地的广东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上我省地处祖国南大门和毗邻港澳的地理条件，这些情况决定了我省三个经济特区以至全省，在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具有内地省分所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总之，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努力提高经济特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至于经济特区产品内销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一般都应当严格控制。但如果属于内地技术上需要，国内市场紧缺，必须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其质量、价钱又合适的，那就应当允许经济特区的产品在照章纳税后内销（当然，购货单位应事先取得上级有关部门的进口许可，纳入国家调拨计划），目前有些产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想利用经济特区出口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外来投资者却想借此打入我国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很尖锐的矛盾，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政策。经济特区引进外资企业的产品，无论如何不能以内销为主；同时在指导思想上要防止和纠正轻生产、重流通，忙于做生意，赚内地的钱的偏向。否则，就会使内地成为外资商品的倾销市场，打击民族工业，搞乱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经济特区的产品变成以内销为主，那同样不是特区的成功，而是特区的失败。

经济特区的引进外资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基本上受市场经济调节，并不是计划经济就无能为力或可有可无了。相反，我们必须运用计划调节的方法和手段，去限制这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防止冲击国家计划。从宏观方面来说，经济特区是全省、全

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其经济地位、作用是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特区的经济，在总体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在计划经济指导下进行活动。而且，在总体规划、行业布局、引进规模、资金投放、物资供应、劳力安排、智力开发等方面，国家计划在特区事实上是起作用的。我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我们在考察特区的经济活动时，要充分估计到这一点；同时，我们又要考虑到在经济特区里国家资本主义将成为主要经济成分这一特点，从而妥善地处理经济特区内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看到计划经济对特区经济的指导作用，又要在计划体制和管理办法上照顾到特区的特点，对于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应当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调节。特区经济要纳入全省、全国计划经济的轨道，但又不能要求特区经济全部纳入国家计划，有的应当纳入，有的只能部分或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有的不能纳入，要根据不同的经济成分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我省三个经济特区，作为整体，都应当同全省、全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尽可能衔接起来。至于经济特区的商业经营、生活必需品供应、价格政策、工资制度等，继续沿用内地的办法已不适应，但又不能完全搬用港澳的一套，都应当有同经济特区体制相适应的妥善解决办法。

第三，经济特区既然是以利用外资为主，特区引进外资企业的产品以外销为主，那末对外就必须更加开放，要从各方面造成经济特区的吸引力，才能同别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有效的竞争。前面说过，我省的经济特区毗邻港澳，是引进外资的有利条件，但投资者还会考虑到，我们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一套适应引进外资需要的经济法规，并切实付诸实施，他们就会观望不前；同时外来投资者往往注意投资环境，除政局稳定这个基本条件外，还有电讯、交通、银行、保险、咨询手段、关税减免、出入境手续和办事效率等等条件如何，也会对投资者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资本家总是资本家，他们总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在目前世界金融、贸易活动中实行高利率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获取一定的利润，他们是不会来的。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投资者赚钱的问题。外来投资者前来经济特区投资办企业，我们容许他们获取合法利润，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赎买。但外来投资者在经济特区赚取利润，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作用。这些企业里的工人的劳动成果，一部分属于他自己的工资福利，一部分是为国家作出贡献，还有一部分则是被外来投资者作为利润分成拿走了。对于特区工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可能比内地工人还要高些，但从实质上来看，外来投资者获得的利润，除了他们确实参加管理所应得的报酬外，其余主要部分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经济特区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同外资合作，向外来投资者“领教”所付出的报酬或“贡献”。这种合作，资本家赚了钱，我们也得了利，从长远来说，应当对我们有更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采取对外更加开放的政策，给外来投资者优惠的待遇和方便的条件，就会没有吸引力，也就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当然，所

有这些都必须是在我国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合法经营和确实为开展正当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我们既要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要限制其违法和非分的要求。如果有人钻这种更加开放的政策空子，从事走私、贩毒、行贿、欺骗和蓄意传播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管是谁，都将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

第四，经济特区不是脱离社会主义体系的孤立的经济实体，必须处理好经济特区同全省、全国的关系。我国的经济特区，始终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我们的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特区有根本的不同。这是应当十分清醒，丝毫不能含糊的。不能认为既然是经济特区，就可以不考虑同全省、全国的统一计划相衔接，或者认为就应当一切都按照国外那一套来办。即使是在经济上，特区也仍然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经济特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引进的项目，不仅应当从建设新兴的现代化边防城市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应当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口的需要这个宏观角度紧密联系起来考虑。这就是说，经济特区的经济活动，是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个新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只要引进了经济特区，并经过消化、仿制、推广，也就意味着可以引进到全省以至全国。我们如果把经济特区比作一座通往国内其他地方的“桥”，那么，这座“桥”就应当为全省、全国输送对四化建设有用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这就要求经济特区既要搞好“外引”，又必须搞好“内联”。内联是为了取得全省、全国的广泛支持，增强经济特区的开发力量，增强吸引外资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同时又不断向全省、全国输送经过观察和试验证明是可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及在实践中成长的建设人才。能不能做到为全国作出贡献，这是衡量办经济特区成功与否或者成效大小的主要标志。现在内地各部门各地区到特区（特别是深圳）投资的积极性很高，这种积极性首先不能突破国家计划，同时也要纳入特区总体规划和计划管理的轨道，避免它们利用特区的更加开放政策以及关税优惠等条件搞盲目引进、盲目进口，以致冲击国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第五，在主要同国际资本打交道和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特殊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经济特区同样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必须根据经济特区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把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到特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经济特区在政治上要坚持行使国家主权，不允许存在丧权辱国的事。要尽快健全经济特区的各项立法，使特区的各种活动都置于我法律监督之下。我们要正视开放政策将会带来的副作用。省委一再强调，在经济特区要做到纪律更严、执法更严、管理更严；特区的干部和党员不许特殊化，不许有特权，不做不遵守党规党法的特殊党员。要本着这个精神，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特别要着重进行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的重大意义和严格要求的教育，使正确处理“特”与“不特”的关系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普遍了解和掌握；要进行关于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的教育，做到既要交往、又有斗争，既有

引进、又有抵制；要进行两个社会、两种制度对比的教育，有针对性地回答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澄清各种糊涂思想，克服错误观点，有效地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和腐蚀；要进行基本的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史的教育，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凡是以正当的手段来同我们做生意的，一律采取欢迎态度，待之以礼，凡是蓄意侵犯我们国家主权，干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就要坚决抵制，有的还要根据法律提起诉讼，依法制裁。至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使特区和广州变为香港的卫星城市，也就是“香港化”的阴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经济特区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各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抵制各种不良影响，防止干部腐化变质，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文明健康。在物质生活逐步富裕的时候，如果精神生活却相对或绝对地贫困下去，也会导致经济特区建设的失败。繁荣的特区经济必须有健康的精神文明与之相适应，否则，这个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破坏。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同资本主义合作，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绝不能接受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相反要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同资产阶级那一套进行深入持久的较量和斗争。在经济特区，因为容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大量存在，又要与国际资本频繁交往，这种客观现实的复杂情况，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上来，这就决定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不带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足够估计到工作的难度，但又不能丧失信心。只要我们的说服教育、启发引导和管理工作做得好，特别是特区的各级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区的共产党员能够真正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就可以取得主动，使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在经济特区同样可以日益巩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过去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多少先驱者和坚强的战士，他们在极其复杂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工作、斗争，甚至面对着极端强暴狡诈的敌人而孤身奋斗，却能够做到一尘不染，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这些大量事实，很可以说明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的生动表现。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把经济特区建设成为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橱窗，又到处充满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风貌。

四、认真总结经验，保证特区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广东三个经济特区，除汕头起步较晚外，深圳、珠海都已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试办经济特区，是一件全新的工作，开始时是完全陌生的，现在路子逐步明确了。已经制订了经济特区条例和一些单行法规，建立了比较精干的领导班子，制订了特区党政干部守则，拟出了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引进了一批外资和技术设备，展开了一批建设项目，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积累了一些与外来投资者打交道的经验，发展了经济，安定了边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步子迈开了，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由于经济活起来了，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深圳市过去劳动力外流现象十

分严重，现在已经开始有一部分人自动返回家园，安居乐业。

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越来越多，投资户主和投资数额也越来越大。深圳市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引进外资项目有效协议一千二百多项，计划投资金额八十六亿港元，已经使用十二亿港元。在这些引进的外资中，有六十一亿港元的合同是去年一年内签订的，说明投资者已从最初时期的中小厂商，转向巨商财团。其中有深圳特区与香港合和公司签订的开发福田新市区三十平方公里的协议；与香港联城公司签订的开发建设后海湾科学文化区六平方公里的协议和开发文锦渡发展区二十六万平方米的协议。去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三亿六千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二点四倍。新增的固定资产九千三百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约十五倍。地方财政收入一亿一千八百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三点七倍；地方外汇收入五千三百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二倍。招商局兴办的蛇口工业区，引进合资、独资项目三十三个，其中工厂二十一个，合计投资七亿港元，已经投产的工厂五间。工业区的码头、公路和微波通讯设备已建成投入使用。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区正在原来一片荒芜的海滨逐步形成，并且取得被称为“蛇口方式”的先进开发管理经验。

珠海市的发展也很快，三年来引进项目达二百七十多项，计划投资十二亿八千多万美元，其中经济特区引进十三项，共十一亿美元。他们从发展旅游业和住宅业开始，并逐步发展工业项目。去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一亿二千多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五。最近，珠海特区也与香港一家财团达成协议，联合开发三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和湾仔住宅区。

汕头市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引进外资工作刚刚开始。最近，已同外来投资者达成初步协议，拟兴建年处理能力七百到一千万吨的炼油厂，外来投资者自备能源、油源，计划投资五亿美元。

随着经济特区建设逐步展开，其吸引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以深圳为例，三年来，前来考察经济业务和洽谈投资的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界、政界人士二千五百多人。海外的评论认为，中国办特区，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日本的一位评论家说：中国决定在香港附近办深圳特区，在澳门附近办珠海特区，在台湾海峡对岸办厦门、汕头特区，对于影响港澳和台湾的未来是极为重要的。

经济特区在试办和建设过程中，道路是不平坦的。由于我们是在思想、理论、干部、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的，加上国内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病，给战斗在建设经济特区第一线的同志带来许多困难。从经济特区本身来说，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摸索中前进，缺乏经验，因此，也就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和预见不足的事情。最明显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和各项管理工作跟不上，给经济犯罪活动和传播精神毒素的活动有可乘之隙。一些经不起糖衣炮弹袭击或者是本来就想乘机捞一把的人，钻开放政策的空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诈骗勒索，中饱私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是因为经过十年动乱，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受到严重破坏，基层组织不健全或缺乏战斗力，干部群众中的混乱思想尚未认真清理和整

顿，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思想认识不足，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够，打击不力，以致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狂，则是工作上的主观原因。

经济特区需要认真总结经验。经过一段实践，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把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得到的许多不完全、不系统的感性认识，通过加工整理，分析研究，使之比较全面、比较系统，逐步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越做越好。总结经验应当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应当记取的教训，都应当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实践中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这也如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一样，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就会逐步地聪明能干起来，学到真本领。

正在试办和正在前进中的经济特区，肩负着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正因为它意义重大，必须严格要求，同时又要热情帮助。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无缺的；指出它的存在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里同样有个分清主流和支流的问题。同时，当前特区建设中存在和遇到的，毕竟是前进中发生的问题，相信在经过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之后，是可以得到纠正，越办越好的。我们应当鼓励革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当新事物还是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芽状态时，我们应当象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

现在广东三个经济特区都还未正式形成，应当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把思想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提高一步，继续前进。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思考要周密，工作要细致。特别是对大的引进项目，更要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从现在情况看来，经济特区正式形成的基本条件，恐怕至少应当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特区的整个体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适应特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改变办事难的局面；二是建立和健全经济特区的法制，才能使到与外来投资者交往不仅仅建立在信誉上，而且依法可依；三是要建好特区与非特区的分界线，才能实行前松后紧，即对外方便、对内严格的管理；四是要解决好现代国际经济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发达的电讯、交通等设施；五是要研究制订出符合经济特区实际的物资供应、劳动工资、市场物价、金融货币等政策和管理制度；六是要尽可能配备好有才干、懂业务的干部队伍，特别要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并切实改进各级办事机构的作风。如果不具备比较全面的成熟条件，最好不要急于宣布特区形成。就是在特区与非特区的有效隔离线建成以后，经济特区内部管理上遇到的新问题也会不少。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们不是主张越慢越好，而是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强调条件要成熟。

我们相信，经过一番认真总结经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经济特区的发展将更加健康，并将为我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经济特区，将以崭新的面目，屹立在亚洲的东方，为全世界所瞩目。

一九八二年六月

从战略意义谈经济特区的作用和建设

孙 孺

广东试办经济特区已经有两年多的历史。在这不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它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吸取有效的科学管理方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设置经济特区是一件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没有直接论述这方面问题；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虽然有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但还没有具体谈到经济特区的形式。因而要把特区建设好，就得靠我们自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同时，新的事物就会有新的矛盾，会碰到许多新问题和困难，也得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妥善地加以解决。这里，仅从其战略意义来谈一谈经济特区的作用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一、对外经济联系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左”的观点，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体系的对立和斗争，没有辩证地看待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发生各方面联系的必然性。因而在实践中，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除了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小的国际贸易之外，不应当有其它进一步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否则，社会主义就要染上资本主义瘟疫，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一提对外经济联系和合作，“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要给扣上“崇洋媚外”、“奴才哲学”等等帽子，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把“闭关锁国”政策误解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质上，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允许利用国外资金，采用各种方式同资本主义企业合作，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样做，有没有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我以为应当从下面几方面来认识：

（一）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孤岛。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世

界体系中,世界经济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也不论是经济发达的或是发展中的国家,都必然要发生各方面的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毫不相关的。当前,我们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的世界体系中,必然要产生各方面的经济联系,想人为地用“闭关锁国”政策将两者隔绝起来是不行的,它会阻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人类从一个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都是从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新社会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旧社会,都必然有一个继承与批判的关系,要“继往开来”,对旧社会加以扬弃。例如,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因为它是造成剩余价值剥削制度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先进技术、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则要继承和发展。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往的社会毫不相关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

(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条件下的预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会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它们将利用已达到的巨大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一个共产主义新社会。但是,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力量的差别,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而是在本国还存在大量小农经济,尚缺乏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物质基础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有必要利用现代世界国民经济体系中已经造成的巨大生产力、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其中包括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经验也已经告诉我们,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就已经强调了要利用外国资金,提出苏维埃政权要“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财政资本”实行经济合作。他还指出,如果不把外国资本引进来,“那就表明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1页)

从上述几个方面说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当无产阶级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度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利用外国资本来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容许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必要的。在经济愈不发达的条件下,这种利用外国资本的政策就愈有必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借助于外国资本来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监督和指导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政治的、经济的主权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并把经济上的借助制约在一定的限度内,就不会有蜕化变质的危险。目前广东试办的三个经济特区,总共面积加起来也不超过三百五十平方公里,即使是在经济特区内作各方面的试验,也只不过是 在一个很小范围内进行,不会出现影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

二、经济特区的作用

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我认为,这是指在条件合适的地点,划出若干面积的地区,采取比其它地区更为开放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更集中地吸引外资,用各种方式同外商、华侨以及港澳同胞的资本进行经济合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各方面的试验的特殊管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是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内容。

当前,对试办经济特区,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评价,对它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也还不一致。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就会导致在实践上,对于要办成一个怎么样的特区,它将起着什么作用,也各有不同的看法。

在评价经济特区作用的问题上,一般地把它归纳为五方面: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吸收外国的科学管理方法作为借鉴;为国家多创造外汇;安排一定数量的就业人员;训练技术和管理人才。

有人说,这五个方面的作用,在特区以外地区的对外经济合作的多种形式中也可以起到,为什么要办特区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中央是不是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对外开放的一种形式试办一下呢?还是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我们不能为特区而办特区。这就是说,试办经济特区有它的战略意义,必须把它同我国四化建设的全局联系起来。只有从它的战略意义出发来理解试办经济特区的作用,才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同时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决策,把经济特区办好。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下面三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能够更快更集中地吸收外资、获得外汇;可以更集中地作为引进先进技术的桥梁,培养掌握先进技术人才和学习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的课堂。

当然,在国内其他地区的中外经济合作中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但在经济特区中却可以更集中地、更快地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目前,我国几个经济特区都还处在初创阶段,各方面的作用还不可能更多地发挥出来。然而,我们放眼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区,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特区,就可以看出,特区面积虽小,但能量很大。

以我国台湾省的出口加工区为例:高雄、楠梓、台中三个出口加工区的总面积不过182.8公顷(不足二平方公里),但据1975年10月底的统计,共吸收外资1.2亿美元,平均每公顷土地吸收外资达65.6万美元;吸收工人共约6.4万名,平均每个企业的雇佣规模为246人,每一工人所占的外资投资额为1,879美元。又据调查,出口加工区在1966年到1974年间,收入工资、税收、地租以及公共事业等非贸易外汇达10亿美元。

在我国经济特区中,外来投资者的投资才开始,许多企业还未建成投产,对于吸收外资的能量还不可能下结论。但仅从深圳市来看,从1979年到1981年底,外资实际投资额的

12亿港元中,在特区内投资的占85.2%;1981年收入的外汇比1978年增加了44.5%,其中贸易外汇约占收汇总额的16%,非贸易外汇(包括加工费、工资、土地使用费等)约占84%;旅游业的外汇收入,1981年比1979年增加了约4.8倍。以蛇口工业区的初期投资情况来看,目前吸收外资约为四亿多港元,平均每公顷土地吸收外资已达34.5万美元左右。从这些初步的简单数字,也可以看出它的趋向,证明经济特区在吸收外资,创造外汇等方面都显示了具有较大的能量。

(二)将在试验体制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改革),学会现代化技术和科学管理等方面对全国作出贡献。

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旧的一套行政的和经济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必须进行改革。但是,改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国三十多年来形成的一套体制是相当牢固的,上下左右互相牵连,动一点就会影响许多方面,不能掉以轻心,轻率从事,必须经过试点,稳妥小心,有步骤地进行,因而需要较长的时间。

办经济特区有它的特点,中央给了它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摆脱许多条条框框的制约,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各种试验,为全国的体制改革作出贡献。

我国经济特区还在初创阶段,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还只能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来努力。但是,在特区的建设上,在一些已经投产和开业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上,都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打破过去旧的一套管理体制的办法,收到了较显著的效果。

以在深圳经济特区内起步较早,取得了较显著成效的蛇口工业区来看,它的建设速度快,吸收外资合作的成效也很好。在被人们称为“蛇口方式”的经验中,有几条是对全国各地都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是将建设权力下放给招商局以后,对于管理机构 settings,打破了国内其它地区那种处、科、室林立,机构重叠的体制,只设立了办公室、总工程师室和总会计师室和十三个专业公司,各个专业公司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业务上的事情由企业的董事会及其聘用的经理决定。打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在行政管理上也打破了事无大小层层上报、互相扯皮的官僚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二、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科学方法来进行建设和经济管理,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有效的东西。在人事管理制度上,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体制,试行干部公开招考,职工采取劳动合同制,择优录取,改革工资,逐步向职务工资制过渡。

第三、在建设工作上,首先制定全区的总体规划,根据总体规划先从基础工程(即我们通称的“五通一平”)做起,为外来投资者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四、制定和公布各种保护外资正当利益的法规和优惠办法。重合同,守信用,积极吸收外资和引进符合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

这些经验概括、形成起来的“蛇口方式”，实际上是将来整个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一个缩影。整个经济特区的建设，也要为全国行政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先走一步，创造出可行的模式，供全国各地参考。

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特区要成为一座桥梁，将特区引进的先进技术，传播到内地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我们知道，日本在战后六十年代的做法是：引进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经过研究，再超过引进的技术。这样，从七十年代开始，它就逐渐居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前列，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应当说，这也是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深圳经济特区这两年多来引进的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如电子工业的技术，现在已经开始引入到内地其它地区就是很好的说明。

(三)作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特殊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代化城市的试验，将对争取台湾回归起积极的作用。

我国经济特区，特别是在综合性的如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从各个企业的性质来说，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而且将是国家投资很少，主要靠引进外资和特区的地方收入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

从近三年来建设的经验来看，要建设好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支柱，通过各种经济杠杆领导特区的市场，而且国营银行将在特区内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尽管可以允许外资银行在特区内开业经营，但国营银行必须掌握特区的金融领导权。

由于特区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吸收外资来进行，因而在特区内的合资经营企业（包括股份公司形式的合营和契约合同式的合作形式）和外来投资者（包括华侨商人和港澳同胞）独资经营企业两者所占的比重将会相当大。这些合资经营企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同资本主义联系和合作的一种形式。外来投资者独资经营企业，本身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已不同于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存在于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受特区所在地政府的管理，要遵守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法令和规定，它们的合法利益将受到保护，但其经营范围又受到我国政府一定的制约。所以它是受到无产阶级国家制约和管理的特殊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在特区内，还将存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经营的商业和服务行业。

这样，经济特区就将成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管辖下的特殊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代化城市。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成功，将对台湾回归起着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殊作用，即是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建设经济特区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些战略意义出发，把我们办经济特区的思想统一起来，许多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三、经济特区建设的几个问题

试办经济特区三年来，到底成效如何？在国内，有人认为成绩很大；有人则认为

“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走私、投机倒把猖獗，物价上涨，干部被腐蚀的多了。

如何评价经济特区的效果？我以为还是我国的一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們到特区认真看一看，和过去未建特区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实事求是地分清主流和支流，就会得出公正的评价的。

经济特区的第一个任务是吸收外资，利用外来投资者的资金和技术，平地起家，建设新城市。深圳经济特区从开始建设到一九八二年三月底止，与外来投资者谈妥的合作的协议或合同共1200多个，外来投资者计划投资总额约86亿港元，已投入使用的资金到一九八一年年底止已达12亿港元。其中投资额在1亿港元以上的项目12个，1亿港元以下，1,000万港元以上的项目44个；已引进的各种机械设备约10,000台（套）。在已投入使用的12亿港元投资中，工业投资占49.4%，农业投资占6.2%，商业投资占8.7%，房产投资占16.5%，旅游投资占2.7%，基础工程投资占14.1%，交通运输投资占1.3%，其它投资1.1%。这些数字说明：（一）深圳特区在创建初期就已经吸收外来投资者的计划投资约15亿美元，其中已动用的资金达2亿美元左右，吸收外资是比较集中和迅速的。（二）在外来投资者的实际投资中，投入工业的约占已投资金的一半。（三）这些合作项目中一亿港元以上的项目占总的计划投资总额的75.8%，可见大项目还是占大多数，投资是比较集中的。今天我们到深圳特区参观考察，只见到处是一片兴旺景象。蛇口工业区，罗湖的商业、住宅区，上埗的工业区都在繁忙地进行基本建设，特区的建设已略具规模，在中央没有多少投资的情况下，不到两年时间能有这样的规模，应当说，成效是显著的。当然，由于缺乏经验，在与外来投资者合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对外实行开放，也带来了资本主义腐朽的意识形态，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甚至有极少数的干部、职工，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蜕化变质，这些都是意想得到的，但这不是主流，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坚决与经济领域中严重的犯罪活动作必要斗争，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深圳经济特区已在加紧制定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同时正在制定各种单行法规和实施细则，这对整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吸收外资都是根本性的措施，这里不再赘述。现在仅从它的战略意义出发，提出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经济特区的规模问题。广东省的珠海经济特区和汕头经济特区，规模都比较小，前者6.8平方公里。后者包括加工区、港口区、农业区和住宅区的规模面积共约13.8平方公里。福建厦门的经济特区规模也很小。只有深圳经济特区（包括蛇口工业区）规模较大，共327.5平方公里，其中能够建设的地区有98平方公里。到底深圳经济特区的规模是不是太大了？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从我们还缺经验以及管理上的困难出发，认为不如把规模划得小一些为好，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其战略意义出发，要建立起一个存在各种经济成分的现代化城市，要为台湾回归做出榜样，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能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模式。因此，我个人认为，规模大一点还是可行的。

当然在建设经济特区时，又必须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其它特区的规模太小了。必须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来考虑。

（二）根据两年多来特区建设的经验，要建设一个达到上述战略目标的特区城市，必须扩大特区行政管理机构的自主权，使它独立于现行管理体制之外，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首先是对特区建设，只要总的建设规划经过国家批准之后，特区的管理权必须集中于特区政府，对与外来投资者签订的合同，内地来特区办企业，必须经特区政府批准，不能象过去那样，各个条条都可在特区自设机构，自行对外签订各种合同。

其次，各个条条的管理规章制度，如果不适于特区的建设，得由特区政府根据全国或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的各项条例、规定加以修订，使它适合于特区建设的需要，否则特区是“特”不起来的。而这些特殊的管理措施，只能限于特区范围之内，不论货物或人员进入内地，又必须受各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管理，不得违反。

再则在建设“后防线”的同时，必须对过去各部门单位来深圳设立的办事处或机构进行清理，没有必要在特区内设立的机构一律撤离，以减少流弊，便于特区管理。

（三）试办经济特区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建设必须服从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开这个前提，就没有设置经济特区的必要。因此，特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规划中，要有全局观点，一切工作都要从加速我国四化建设出发，注意各方面的协调关系。所谓协调，首先是考虑特区建设和发展中的前方联系效果和后方联系效果的问题，不能单纯考虑特区本身的利益。

考虑前方联系效果方面，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1）在国际市场的贸易竞争中，必须和全国的战略部署统一步调，不能因局部的利益而损害全国性的利益。例如对于规定全国统一安排出口的重要商品和全国统一进口的商品，特区必须注意到不可成为全国管理的漏洞。在进行补偿贸易方式合作时，必须注意不允许到内地采购全国统一出口的商品来进行补偿。特区在对外贸易中不应成为内地进行正常对外贸易的中转站。特区对内地的贸易，必须按照国家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2）特区企业的产品，将以国外市场为主要销售地，因而在引进项目中必须考虑生产商品在世界市场的销售可能性和竞争能力，同时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些特区内的企业产品（如电子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销售发生了困难，这是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

考虑后方联系效果方面，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1）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必须考虑我国当前的国情和消化能力，不能不分时期，不分项目，认为越先进越好。特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要作为桥梁，能够很快地加以消化，传播到内地，使它真正成为我国自己的生产力。

(2)特区产品向内地销售的问题，也是建设特区吸收外资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当前在特区吸收外资兴建的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其产品要以出口外销为主，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外来投资者所以到我国特区来投资设厂，有一个战略考虑，即最终目标是我国潜在的广阔市场。今后，凡是我国需要进口的商品，如果特区能够生产供应，质量和价格都合适的情况下，应尽量从特区作为进口贸易购买，这对吸收外资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在引进外资设厂时也要注意，不能多搞与国内重复生产的工业，更应考虑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致受到冲击。

(3)对于特区的建设和特区内工业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如果国内能供应的，应尽量使用我国的原料、材料和部件，这才对促进本国的工业生产起积极作用。

(4)特区城市对周围的郊区和内地城乡的依赖是很多的，没有他们的支持，经济特区是办不好的，因而建设特区必须考虑和郊区、内地的协调关系。首先是粮食问题。假定深圳特区将来建成之后，要发展成为100万人口的话，每年就需要20万吨粮食。其次是副食品的供应，我们以香港1981年平均每天的副食消费水平为例：蔬菜约1,500公吨，生猪屠宰数约9,500头，牛的屠宰量约650头，鱼类消费量约400公吨，鸡蛋消费量约200万只。100万人口的特区城市加上流动人口的消费量需要多少？如何解决？这些单靠特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在建设时加以考虑。如果没有较强大、稳固的后方基地支持是不可能解决的。

(四)发挥优势，注意经济效益。这是建设特区必须经常考虑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在批准前先作可行性的研究。其标准就是考虑能有多大的经济效益。从目前的条件来看，我们最能吸引外来投资者到特区来投资的优越条件：一是土地费用较为低廉，二是劳动者的工资较为低廉。因此，如何利用我们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许多同外资合作经营项目中，我方投入的大多是土地和劳动力，在土地投资方面，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按照原有的管理体制，能向国家多要土地就上算，可以不交土地使用费，因此造成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土地价格的概念，也没有级差地租的概念。在与外资合作经营中，对土地投入非常大方，一个企业，往往占用很大面积的土地，动辄数万平方米。今后必须总结这个经验教训，要考虑最有效益地利用我们土地资源的优势，以收到较大的经济效益。

对于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从全国、全省来说，资源是充足的，但从特区本身来说，资源又是不足的。在计划建设特区时，就必须考虑劳动力的来源和培养，不但使数量上能适应特区的发展需要，在质量上也要适应特区的要求，在特区建设中，必须把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的开发的投资，提到重要的地位。

(五)对于特区本身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也要有全盘的考虑。例如，作为第一次产业的农业应如何布局？如果特区内不可能发展相应的农业，又如何利用郊区和内地？

又如，作为第三次产业中主要行业的商业和服务业，应当有多大的比重？当前在发达的工业国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据统计，美国目前就业于第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已占就业总人数的60—70%。在日本，据1980年底的统计，仅仅商业和服务行业就业的人数就占总就业人数的41.5%，全国平均差不多五个人中就有一人从事商业和服务行业，即每100个居民中有20人从事商业和服务行业。在东京都，每80个居民就有一家零售商店，每100个居民有一家饮食店。我国的情况如何？没有得到具体的数字。但据1952年北京市的统计材料：那时全市人口为278.3万人，商业服务业网点有75,757个，从业人员15.42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19.7%，即每100个居民中有网点2.7个，5.5个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当然，我国与外国情况不同，不能照搬，但是，我们将要建设起来的特区现代化城市，对于第三次产业的布局 and 劳动力的安排，必须有所规划；要在吸收外资的项目中加以考虑，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致陷于被动。

(六)在建设特区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济特区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特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特点，就是必须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腐朽的意识形态作斗争。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开展，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必然同时会带进来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不足为怪。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文化、教育、艺术各方面的投资，一定不能忽视，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蚀，才能建设起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

上面提出来的建设特区的一些问题，是从其战略意义出发的，当然还有不少要注意的问题，这里不过是挂一漏万地提出一些课题，以供共同探讨而已。

一九八二年六月

主 流 · 问 题 · 建 议

曾牧野

去年以来，我们到深圳特区、珠海特区跑了几趟，现把我们看到和想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在深圳市、珠海市试办经济特区，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央的决定。经济特区这个名称，是从世界各国设置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自由关税区、自由工业区、加工出口区演化而来的。一九八一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编印的一份资料，作出如下的解释：“经济特区这个名称，目前只有我们中国采用。但是，在一国之内，划出一定的地区，在区内实行以减免进出口关税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其他政策，以达到吸引外资，增收外汇，发展本区域或本国经济之目的，这在世界上是常见的。这些地区的具体特点和名称尽管多种多样，然而有其共同点，即都是经济性的特殊区域。因此，我国采用‘经济特区’这一名称，可能更具有概括性。”我同意这样的解释。

引述这段文字，目的是（1）为了“正名”。名不正，言不顺。通过“正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2）为了解放思想，使不了解特区的人们知道办特区乃是世界上“常见的”，早已有之。根据有关资料的介绍，世界上最早的特区，是一五四七年意大利设置的里窝那自由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世界上已有二十六个国家在试办出口特区，搞了七十五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搞，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试办，目的是以优惠的条件，吸收外资，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到一九八〇年，世界上已有七十五个国家（地区），设置了一百五十个以上的特区。多

数特区办得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然也有失败的，但这是个别的。我的想法是，为了加快“四化”建设，不妨打开“窗户”，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是怎样把生产力搞上去的。根据我国国情，有用的，吸收进来，加以运用。

二

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从一九七九年七月起，到今天仅两年多的时间。这短暂的时间，按照外国出口加工区成长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属于决策准备和施工阶段。我估计，大概还得经过几年的努力，譬如说，深圳特区到一九八五年才能进入“特区的形成阶段”。因为深圳特区的面积大，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约7公里，全区面积宽达327.5平方公里，可供城市建设的面积也有98平方公里。形成特区，我看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1）“七通一平”或“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已基本搞好。即是说通过土地开发，使土地的自然形态转化为土地的商品形态。这个时候，外来投资者可以进来投资设厂了。

（2）经济特区的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比较完善、健全，使特区内部的各方面的工作、管理，有法可依。这是外来投资者普遍的强烈的要求。

（3）对复杂的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已走上正轨。

（4）二线建设基本完成。深圳特区与内地的分界线较长，二线建设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根据外国建设出口加工区的经验，从决策准备到形成特区，一般需用七、八年的时间，甚至九年、十年。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主观的努力，缩短这段时间，力争早点形成，但也必须估计到某些困难：（1）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第一次试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如

何办才符合要求，我们还缺乏自己的实践经验。

(2) 国内存在配套资金、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不足等方面的困难。(3) 建设过程中还会遇到来自旧的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阻力，而解决这方面的矛盾，排除这方面的阻力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要对形成特区的一些最起码的条件，作出比较正确的估价，以及哪些事情是在特区形成以后才能做到的、哪些作用是在特区形成之后才能显示出来的，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才不致操之过急。

三

对深圳、珠海特区两年多来的工作、建设如何评价，我认为是研究、探讨特区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两个特区，我们在决策准备和施工阶段是采取了边决策、边引进、边施工、边规划的方针，决策准备做的不够，上马时间比较匆促，这是事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相应产生的管理工作、立法工作未能及时跟上，因而近年来被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诸如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的发生，同时在引进工作上出现了一些缺点，例如少数引进项目，我方上当受骗，或吃亏较大，等等。如何看待这些消极因素？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完全是危害国家利益、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决不容许，必须狠狠打击；引进工作上的缺点，不利于特区和国家的建设，必须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改进。这些消极的因素，同整个特区的建设事业比较起来，是属于支流的东西；而且，这些消极因素的产生，也是我国在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新的社会问题。

两年多来，深圳、珠海特区建设的主流是好的，引进工作的成就是显著的。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到一九八二年三月底，深圳特区引进的外资项目有1200多个，投资总额86亿港元，已投入使用的资金达12亿多港元。其中，投资金额在一千万港元以上的项目有44个，投资一亿港元以上的项目12个。珠海市与珠海特区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底引进的项目278个，投资总额2.417亿美元；一九八二年二月，侨商财团计划成片开发珠海特区的投资额达十亿多美元，双方已经签发了合作的意向书。有一情况值得提出的是，深

圳特区一九八一年下半年以后的引进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巨额投资、成片开发。据统计，深圳特区投资总额中约占百分之七、八十，是在一九八一年引进的。珠海特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并非偶然，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1)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取得港澳同胞、华侨以及外国商人、外国朋友的信赖；(2) 我国政府以及特区政府陆续公布了一些法案以及有关的管理条例，使外来投资者开始产生了安全感；(3) 特区干部、人民的努力以及全国、全省人民的支援。

引进工作，促进特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一九八一年深圳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3.4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82.74%，比一九七九年增长一倍多；一九八一年地方财政收入1.3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二倍；一九八一年地方外汇收入6100万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28.5%，工人、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珠海市也发生类似的变化。过去宝安县、珠海县长期难以解决的人员外流，近年来基本上制止了。这对于建设一个巩固的安定的祖国边防，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这两年多来两个特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的，效益是好的。

特区建设的初步成就，证实了列宁思想的正确性：“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392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下，争取必要的外援，是可行的。必要的外援，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国家的建设进程。这一切，说明了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当然，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指望于特区，设置特区只是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吸收外资，赚取外汇，加快经济、技术发展的渠道之一。自力更生才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此其一。其二，对设置经济特区的意义要有正确的认识：除多创外汇、安排就业、引进技术这些作用外，特区在改革经济体制、改善企业管理方面还可总结。处在决策准备和施工阶段的深圳、珠海特区，在这方面尚未或尚未充分显示出它的作用，这是事实。但强调它，明确指出这一战略意义是完全必要的。

四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要把特区办好,根据两年多来的实践经验,特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于特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同时抓,两手抓。两大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这好比车子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车子才能均衡地有节奏地前进。根据这个精神,有几个重大的原则、方针问题,亦即涉及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决策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

(一)分清主次、主次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

首先的问题是制订好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的内容很多,但是总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中央的方针,体现中央对特区建设的要求。中央的要求是,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要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深圳特区宽达三百多平方公里,其建设布局、安排,要贯彻中央的要求,可能好办一些;珠海特区初划仅6.8平方公里,而且分割成三小块,各自一角,没有连成一片;兼之,三小块特区区域要不要搞“封闭式”的围墙建设?若要,特区内部兼营农、牧、商可能会发生一些困难。如果中央对珠海特区的建设要求,包括珠海市在内的区域,要制订符合中央要求的总体规划,事情好办一些。据我理解,这两个综合性的特区,当然要符合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要求;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也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风貌。

其二,综合性特区各项事业要按比例发展,这中间有主次之分。主体的东西是什么?是现代化的工业。这两年多来深圳特区引进的资金,其中属于房地产与旅游业方面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珠海市与珠海特区也有类似情况。特区建设处在决策准备和施工阶段,引进的外资多投放于房地产与旅游业方面,据我看来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通过制订正确的总体规划并付之实施,这个现象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说特区政府想通过经营这些事业,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从而增加特区建设的自筹资金,也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今后的引进,要通过总体规划确定正确的投资方向:主体是工业,其他行业(农、商、牧、住宅、旅游等)也要跟上来。这就是主次结

合,搞好综合平衡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什么要求?一是扩大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要求;二是深圳特区到二〇〇〇年养活一百万人口的要求。农业是特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深圳特区和宝安县),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与布局如何安排、规划,值得专门研究。深圳特区到二〇〇〇年如果发展到一百万人口,珠海特区与珠海市到二〇〇〇年发展到三十万人口,其粮油以及其他农副产品、水产品的供应如何解决,粮油可以安排多大的进口比例,等等,要算算帐。

(二)“公”、“私”兼顾,统筹全局,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形成一个适应特区要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这里说的“公”,是指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私”是指引进外资开设的企业(包括外资独资企业和合营企业),以及某些个体经营的经济成分。从发展来看,特区将形成一个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体系。这与内地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公”的比重该占多少,“私”的比重该占多少,是否应该作出必要的规划与设想。此其一。

其二,哪些行业应以“私”营经济为主,哪些行业应以“公”营经济为主,看来也值得研究。在特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将占较大的比重。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应以外资独资企业还是以合营企业(包括合作经营与合资经营)为主要的经营方式呢?我的主张是后者。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办的经济特区。国家对特区内部的经济活动,理所当然地要考虑掌握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与控制权。多搞些合营企业,可能更符合这个要求。特区内部的外资独资企业,虽然也可说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但这是以外国资本为核心的、为主导的,发展多了,可能不易控制、管理。何况,我们设置经济特区的意义,不仅是引进外资、技术,赚取外汇收入,除此之外,还要通过特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吸收外国对我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通过引进企业、与外来投资者合作,打进国际市场,掌握国际市场信息,了解供销环节,等等。这要求,在外资独资企业中是难以得到的。

至于具体行业发展何种经济成分、经济形式比较适宜,我个人以为:①农、牧、商这些行业应以发展“公”营经济为主,适当发展合营企业;②工业、住宅、旅游这些行业可以多搞合营企业,适当发展“公”营经济成分;③旅游业不宜搞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其他行业可以允许发展一些独资经营企业;④市政公用设施、文教卫生与科研等公共事业,社会主义“公”营部分应占绝对优势,以利于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争取侨商合办一些企业事业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掌握适当的比重;⑤海关、边防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控制的事业、设施,这是不言自明的;⑥为了方便群众生活,扩大就业,特区内部允许某些个体经营(如小商小贩)的经济形式,也是肯定无疑的。

(三)外引与内联相结合,通过特区的引进、建设,促进内地以至全国经济、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深圳、珠海已明确提出“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相结合的方针,并付诸实施,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其经济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

“对内联合”这个方针如何理解?

首先是经济上的联合。这就是说,经济特区通过与广州市以及其他省市的经济联合,获得内地资金以及技术力量的支援;内地到特区联合举办各项企事业,协助特区本身解决旅游商品、建筑材料以及农副产品、高档工业消费品的供应问题。这样的联合正在进行,而且搞了一些项目,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

其次是技术上的联合,即把特区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引向内地,引向全国。这是一个涉及引进的先进技术如何消化、应用与推广的重大政策、措施问题。这样的联合,总的说来还未进行。一是因为近年来特区建设尚处于决策准备和施工阶段,引进的技术、设备的先进性尚不理想;有的先进一些,但也是个别项目(例如香洲毛纺厂的毛纺机器设备)。二是因为先进技术的消化、应用与推广,固然要靠特区本身的努力——例如在特区内设置拥有一定技术力量的工程技术研究机构;但有些事情必须靠省、中央有关部门的协助、指导才能进行。比方说,省里或某一个省外地区或中央有关部门需要什么样的先进技术、设备,特区本身难于了解,即使了解了,要推广出去引向内地,也不是特区

政府力所能及的。省或中央哪个部门出来牵头、指导、管理,以及如何牵头、如何指导、如何管理,互利问题如何解决等等,似有研究的必要。这件事情,当特区建设进入形成阶段以后,估计会日益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件事做好了,人们就会看到经济特区对于促进全省、全国技术、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特殊贡献。

再次是旅游事业的联合。发展旅游事业,无论是从特区来说,还是从全国来说,都是重要的行业。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通过特区引进的游客,导向内地,将为国家赢得一大笔外汇收入,并增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故此,特区与内地之间组织旅游事业的联合、联营,不可小视,更不可设置人为的屏障加以阻隔。

(四)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逐步建立、形成一个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商品经济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同内地、同全国一般地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特区照搬内地的经济体制,行不通,而且将会失去设置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实行新的经济体制,目下还做不到,因为经济特区尚未形成。我的设想是,由决策准备、施工阶段,过渡到特区的形成阶段,也就是从目前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局面,过渡到未来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新的管理体制。当然,也并不是说当特区一进入形成阶段,这个新的管理体制就很完善了、全面了。那个时候,仅是施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开端。我们只能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探索,才能使新的体制臻之完善。

这个体制过渡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此必须进行计划管理体制的研究,价格体制的研究,外贸体制的研究,财政体制的研究,银行货币体制的研究,劳动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的研究,等等。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勉强去做,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但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某些改革的试验,现在就要做,有些事情(例如劳动工资体制的改革,某些建筑工程采用招标方式承包的革新,房租制度的改革,等等)还要大胆去试验,否则,老是故步自封,新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由特区形成之日突然从天而降的。特区政府以及其他的权力决策机构,听听专家们的建议,是不无裨益的。

(五)宽严结合的原则,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又要狠狠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显示出党纪国法的威慑力量,维护特区声誉与国家利益。

(六)联合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这主要是对外来投资者来说的。与外来投资者合作,要讲平等互利,要给合理的利润与其他权益;应该说:大多数的外来投资者,特别是侨商、港澳商人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守法的,绝大多数华侨、港澳同胞是爱祖国的,是关心、支持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的。但是对于少数外来投资者的诈骗、盗窃、走私等不法行为必须给予必要的斗争,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姑息养奸。内地某些单位与特区实行经济联合,若发生不法行为,也应是如是处理。

五

针对特区本身存在的、需要研究的重大原则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见解,这事情本身就是

提了建议。但除此之外,我还想就管理机构精简、革新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①有些行政管理机构,例如特区政府的统计机构、对外经济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劳动工资管理机构、司法权力机构,要适当加强,人太少了,办不成事。

②加强智力、咨询机构,例如深圳市委研究机构就必须扩大编制,六、七个人除应付人来人往的接待工作外,难于开展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加强研究、指导引进技术的消化、应用、推广,我在上面提到要成立一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外,建议特区政府建立一个市场信息、经济咨询中心。

③经济特区目下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若要加强上述机构而本身又缺力量的话,建议各机构从省内外聘请若干顾问,包括经济顾问与法律顾问。顾问,要有顾问的工作制度。建议可在市委研究室设置一个顾问工作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



“嚼杨木”辨

易名

金圣叹在伪作施耐庵序中,曾经谈起“嚼杨木”一事。什么叫“嚼杨木”呢?刘逸生同志认为清人程穆衡之说很有道理,“这可以说把‘嚼杨木’的来历找出来了”。(《金圣叹伪造施耐庵序显证》,刊《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对于程说,尚有疑焉,为了说明问题,兹将原文引出:

余雍正初,始见施耐庵序,翁首以此句为询。余对曰:“忆得《大唐西域记》云:罗婆路山北岩泉,是佛受山神饭处。饭已,嗽口,嚼杨枝,因生。今为茂林,专号杨枝,盖佛时未有茗饮,故于嗽口后嚼杨木以代茗耳。”翁大称赏,叹为渊博,余因此发意欲注此书。(据赠翁云,此句问过学士大夫数十人,从无知者。)——中华书局《水浒资料汇编》第272页

程穆衡将“嚼杨木”解释为“嗽口后嚼杨木”,人齿非同牛马,怎能咬烂杨木?金圣叹在《和李颀长寿寺禅公院新凿井之作(拟唐王维)》诗中说:“手巾寻白苧,齿木有垂杨。”(《沉吟楼诗选》第42页)又王维《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诗有:“斋时不乞食,定应空嗽口。”清乾隆人赵松谷注云:“释氏法,每食后必以杨枝漱刷牙齿。”(四部备要本《王右丞集笺注》卷三)据此,嚼杨木并非喝茶,而是以杨枝漱刷牙齿。杨木,即齿木,即今之牙刷是也。

试论发展广州与深圳、珠海 特区的经济联合

林滨 江永泰 李惠琴

广州是华南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的南方枢纽，有责任支援特区建设，广州与经济特区建立经济联合是广州支援特区的一种主要形式。作为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是重要的，然而特区的经济建设也不能离开内地中心城市的支援和帮助。因此，广州与经济特区实行广泛的经济联合是客观的必然。

一、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是两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发展广州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经济联合，完全符合双方的根本经济利益，对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促进双方经济发展，都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可以扬长避短，相互补充。广州与特区因所处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不同，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广州市历史悠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工商业发达。目前市属工矿企业三千多个，职工一百多万人，拥有一支善于仿制、创新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队伍，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科学技术较为先进，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经营管理经验也较为丰富。但是，工业集中，人口膨胀，用地紧张，原料不足，能源短缺，经济发展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广州没有实行优惠税率，外来投资者投资办企业要缴纳33%（合资经营）或22%—44%（独资和合作经营）的所得税，比香港17%的税率高得多；同时信息不灵，国际市场商业情报不及时，亦都影响对外贸易的扩大。

深圳、珠海接壤港澳，来往交通方便，并且对外资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对外来

投资更有吸引力；有大片尚未开垦的土地，土地使用费较便宜，工业原料可以以进养出，发展工业生产大有可为；香港是一个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容易及时了解、掌握国际经济动态和金融、商业信息。然而，深圳、珠海也有不足之处，建市前都是以渔业、农业生产为主的边防小镇，经济落后，企业管理与工艺技术水平低，要大量吸收大规模的技术先进的投资，困难不少。目前，外来投资者对特区投资最大宗的是房地产和旅游业，而对工业投资不多，规模大、技术先进的项目更少。据一九八一年统计，珠海吸收的外资总额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合作经营房地产和旅游业的投资，对工农渔业方面的投资不到百分之八。在深圳引进的外资项目中，工业项目占引进总项目66.2%，而投资额只占投资总额的7.3%，引进的一般是港澳五、六十年代的工艺技术，有个别项目甚至是三十年代的手工操作的陈旧设备。只有少数项目技术较先进、规模较大、投资较多。

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更好地发挥双方的优势。对广州来说，可以把特区发展为第二个基地，通过举办联合企业，解决厂房不足，原料不够，经济信息不灵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这是取得广州经济稳定发展的一项重大措施。而对特区来说，则可以利用广州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真正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加快特区建设。

(2) 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可以互相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我们国家设立的特区是社会主义特区，我们利用外资要贯彻平等互利原则，并且要以维护我国的主权作为前提。在引进工作中主权地位除了政治、法律因素外，是通过经济实力体

现出来的。对一个引进企业来说,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三个方面。在这些方面谁有实力,谁就可以控制企业的命脉。如果我们一切依赖外资,企业就会受控于外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认为,技术购买者易为对方利用的弱点,就在于缺乏资本,缺乏熟练技术工人,缺乏管理人才及管理知识,以及对各种可供技术来源了解甚少等等。目前特区由于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外来投资者中有的人,利用我方不懂技术的弱点,加强对企业的控制,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不能停留在使用上,还要加以吸收、消化、复制、创新,才能逐渐缩短我国同外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但依靠特区目前的技术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件工作的,而培养训练又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一年半载便能奏效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一边培训,一边借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力量。而广州通过在特区的经济活动,也必然能够学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有效的管理经验,培养技术人才,促进经济的发展。

(3) 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符合双方的经济发展方向。广州是我国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轻纺工业行业齐全,生产能力较强,产品工艺精湛,质量优良,很有出口竞争能力,素有“广货”的美称。1981年全市轻纺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65.87%。轻工业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居第四位。针织品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远销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还是一个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历史名胜古迹很多,园林花卉别具特色,被国际友人赞誉的游览胜地。1981年到广州旅游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游客平均每天达二万三千多人次,据统计1981年旅游外汇收入达4190万美元。所以,广州市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同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

深圳、珠海在建市前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分别占82.8%和75.6%,比其他工业基础较好,但工艺简单落后,竞争能力差。发展广州中心城市与特区的经济联合,就可以充分利用广州的技术、设备、经验,促进特区的发展。

在旅游业方面,广州和深圳、珠海更有着自然形成的联系,每年大多数归国探亲、旅游的华侨、港澳同胞,以及相当部分的外国游客,都经深圳和珠海,往往先抵达广州然后再到其他地

方。特区设立后,出入的旅客更多。发展广州与特区在旅游业方面的联合,形成一个旅游网,也是发挥广州和特区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搞好经济联合工作,沟通与协调特区与广州的经济联系,广州有必要在特区设立办事机构。目前这项工作主要由各个部门、企业进行对口联系、洽谈,没有相应的办事机构。当然设立统一的办事机构,也不应包办部门企业之间的洽谈和签约,而仍应发挥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鼓励对口单位直接开展各项经济联合。办事机构的任务,就在于沟通情况,统一规划,协调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合,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

二、合理处理相互的经济利益关系,调动联合双方的积极性

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关键在于合理地处理好联合中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坚持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原则。因为参加联合的企业,其经济活动除了支援对方建设外,也要促进自身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推行了经济责任制,讲求经济效益,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考虑其经济利益。而联合企业的经济利益是通过投资、利润、分成等环节体现出来的。如果经济利益处理得不合理,联合一方不能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就会失去发展联合的动力。当前在这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内联与外引企业应区别对待。内联与外引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目的不同,在经济利益的处理上应区别对待。特区与外资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外来投资者投资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我们吸收外资则是为了利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与外来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中,一般规定合作年限,在合作期满后,企业全部设备和投资归我方所有,而内联企业不论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广州和内地去特区举办联合企业的目的同外来投资者投资根本不同,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对内联企业不应照搬外引企业的办法,而应采取鼓励投资,制定有利于两地经济长期发展的措施。在目前已实现的内联企业中,大多采取这样的措施,联合双方都比较满

意。但有些企业,所采取的措施也有不尽合理的,这须要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互助互利,充分发挥双方的积极性。

第二、合理负担投资,合理分配利润。进行经济联合,合理地分担投资和分配利润是十分重要的。广州和经济特区之间现在已经实行和正在洽谈的一些联合项目,利润分配有的是对半分成,有的是六四分成不等。利润的分配与投资大体是按比例的。但也有一些联合企业感到经济收益太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投资的计算不够合理。一般合作项目多数由深圳方面提供土地、厂房,广州方面提供设备和负责安装,有的还要单独负责提供经营资金。双方投入的土地、厂房、设备等均作投资入账。但由于特区的土地、厂房往往按与外资合营的标准作价,比香港的价格稍低,但比国内价格高得多,因此在投资总额比例中,深圳本来投资不多,但所占份额很大,利润分成比例也跟着提高。无形中增加了广州的投资负担,降低了利润分成比例。这种情况,必影响广州与特区发展经济联合的积极性。搞经济联合要按经济利益原则办事,只有在联合中平等互利,双方均有所得益,才能引起搞经济联合的兴趣。特别是那些特区工农业生产迫切需要,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联合项目,一般盈利不高,外汇收入不多,更需要合理地分配经济利益,以争取内地的经济合作。

第三、主动照顾对方经济利益,积极解决存在问题,为发展经济联合铺平道路。在实行经济联合中,有时虽然不存在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还是会有一方可能感到实行联营在经济上划不来。如广州郊区三元里、新滘、太和三个公社与深圳果菜公司签订合同,由广州派出菜农到深圳包种蔬菜近500亩,以解决深圳市场蔬菜供应的问题。深圳方面的给予条件很优厚,以每亩菜地六千斤产量计算,深圳保证每担菜平均价格不少于10元。组织质量好的蔬菜出口,所得外汇中地方分成部分全部交给广州方面,用于进口肥料、工具和部分生活用品,每亩地给150元开办费,供应化肥150斤,其他方面条件也很照顾,如解决广州菜农的口粮、住宿,搞好文化生活等等。按理,这里不存在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但是,由于广州近郊农村经济条件好,农民收入也比较高,其中如新滘公社凤和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每月收入达140

元,而到深圳种菜,每个劳动力每月最高收入90元左右。如果对这一方面经济损失不加考虑,合作当然很难维持下去,更难以继续扩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广州有关部门提出可否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在搞好蔬菜生产的同时,兼营工业和商业,以工补农,以商养农。这个建议照顾了双方的经济利益,是比较积极可行的办法。在实行经济联合中,一般应保证双方经济上都能受益,如果确实由于客观条件造成一方在经济上有所损失,应该尽可能多照顾对方的一些经济利益,积极寻找解决与补救的办法,使已经建立起的经济联合获得更大的活力。

三、多形式的经济联合和择优选择经济联合形式的原则

经济联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选择经济联合形式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两地的经济发展。

从目前情况看,经济联合的形式大体上有六种:(一)合资经营。合资经营又分两种,一种是广州与经济特区有关对口单位共同投资、共负盈亏,开办工矿企业和商业、服务业。另一种是广州、特区和外来投资者三方合资经营,由深圳、珠海提供劳力、生产用地,广州有关企业提供部分资金和技术力量,外来投资者引进其余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盈亏也由三方共同负担;(二)合作经营。特区参加联合的企业以地皮折价入股,其余一切投资由广州方面负责,利润按股或对半分成;(三)独资经营。这种形式主要集中在基建部门,广州有好几个建筑和设计部门到特区自行投标承包工程;(四)广州单独同外来投资者合作,到特区设厂办店,定期向特区交纳土地使用费、管理费和企业所得税;(五)提供劳务技术。对特区急需的各种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翻译、厨师、司机等,广州市从有关单位临时抽调去特区工作,或代为培训,收取劳务工资或培训费;(六)在特区设展销店,推销广州的产品等等。

上述各种经济联合的形式对支援特区建设和促进广州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广州与经济特区实行经济联合,选择那一种形式为佳,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五个原则来考虑:

一是要有利于利用外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不同于广州与

内地的经济联合，特区建设的目的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广州与特区的联合必须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特区的引进工作有个发展过程，在初办阶段，由于外来投资者对我们的政策和技术状况不了解，引进的大多数是技术简单、投资不多的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小型项目。这些项目引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先进的很少。所以，必须逐步从小型项目转移到搞投资多、技术性强的现代化大、中型项目。对这些项目，外来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确保盈利，一般要求同我们合资经营或独资经营。但特区原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薄弱，不能适应建设的需要。因而有必要以经济中心城市为依托，开办有广州、特区和外来投资者参加的三方或多方合资企业，联合和利用它们雄厚的资金、技术力量，以便增强吸收先进设备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开办这类企业好处很多：（1）可以充分发挥三方的长处，既利用了特区的地利和劳力，广州市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又可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2）这些企业的原材料、产品和生产设备可以按合同规定的品种、规格、数量直接报关进出口，不须层层审批，减少了工作层次，提高了工作效率，产品较易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需要；（3）产品、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可以免税进出口，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能力。这类企业因优越性较多，在今后广州与特区的联合企业中，有可能以这种形式为主，所以凡是有必要也有条件的联合企业，可尽量选择这种形式。但采用这种形式要符合外来投资者的要求，产品要能打进国际市场，原材料的供应也要有保证。对那些暂时不具备条件开办这种形式的联合企业，也可以先搞广州与特区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待联合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有了发展后，再吸引外来投资者参加。例如广州糖果厂第一步先同深圳市糖果厂合资搞内销糖果，在质量稳定后，第二步再争取外来投资者合资搞出口。而对那些外来投资者要求在特区开办，特区没有力量和不准备开办的技术先进企业，广州也可以在特区的统一规划下，单独同外来投资者合办。例如广州市化工局同港商合作在深圳蛇口、布吉等地兴建了三间化工和气体加工厂。

二是有利于扩大出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特区是出口加工区，产品以出口为主，内销一般

要严格控制，所以联合企业的生产发展方向是扩大出口贸易，特别是轻纺工业的出口贸易。深圳、珠海在建市前虽然轻工业比其它工业基础较好，但因工艺简单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而广州轻纺工业实力雄厚，可考虑把广州由于资金、技术、设备等原因暂时未能生产的高精尖的轻纺工业产品，通过合适的联合形式，到经济特区开辟新的生产领域。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我省的出口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外汇收入。

三是有利于发挥广州市科学技术特长。经济特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如在基建方面，仅珠海市基本建设投资七九、八〇两年就达七千多万元，八一年又投资六千五百万元。但珠海原有施工队伍只有一千多人，去年仅能承担市建筑施工任务的三分之一。而广州市有高层建筑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在农副业生产方面，特区的生产落后于发展的需要，农副产品十分短缺，而广州郊区的农民有丰富的种植瓜菜的经验，近郊的花农还有种植鲜花的丰富经验。在人才方面，特区需要工程技术、外语、会计、管理、法律等人才，而广州不但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有培训人才的师资力量。在这些方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提供劳务技术或举办联合企业的形式。例如派设计、施工队伍去特区投标承包工程，派菜农、花农去指导种花、种菜，派厨师去指导烹调，派教师去特区或在广州为特区开设专业训练班，培训人才。也可以与特区联合开办工程设计建筑联合公司、农工商联合公司、教育服务公司等等。

四是有利于发挥广州传统技艺的特长，满足特区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区近年来由于人口的激增和饮食服务对象的变化，急需增加和提高饮食服务项目及其质量。而广州无论在菜式烹调和点心制作上均久负盛名，在东南亚华侨和港澳同胞中都享有很高的信誉，可以让广州的老牌名店到特区设分店。在服务业方面，如一乐也理发，艳芳照相等，也可以到特区设分店。对这些食品加工、商业服务业等联合项目，一般可搞广州与特区的双方联营。这样既为广州老店提高声誉，又能扩大营业，支援特区建设。

五是有利于学习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面，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广州学习。在我们同外来投资者合

办企业中，也有不少经营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借鉴参考。为了便于学习这些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应优先选择广州、特区和外来投资者三方合资和广州与特区合资、合作的形式。

四、开辟多渠道资金筹集，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

发展广州与特区的经济联合，除提供劳务技术外，其余各种联合形式都需要投资。资金从何而来？我们认为可采取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公私结合的办法，广开财路，筹集资金。

（1）内外结合集资。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有大量游资要寻求出路，1981年九月底，仅香港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的存款总额就达1,590亿港元。把广州同特区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大力开办广州、特区与外来投资者三方合资企业，利用外资，可以解决部分资金。

（2）上下结合集资。要充分发挥省、市主管区、局的三个方面积极性，把省、市的地方财政拨款和企业自筹资金结合起来。

首先要发挥省、市的积极性。广州市同特区实行经济联合，不仅仅是广州市同深圳、珠海两市的经济建设问题，而且是一个带地区性的问题，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办好特区，带动全省，支援国家四化建设的问题。所以省应积极领导和支持广州与特区经济联合并及时地帮助解决在联合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对广州市来说，同特区联合虽然投资近期的经济效果不一定比在本市投资好。但从长远来看，有的放矢地向特区输出资金和技术，无论对特区建设或广州的经济发展，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资金再紧张也应挤出部分专款或发放优惠贷款，以支持企业同特区进行经济联合。

其次要发挥企业主管区、局的积极性。近年

来广州市同企业主管区、局之间大多实行划收分支，财政包干或利润留成的办法，随着生产的增长，不少区、局，特别是轻纺和财贸系统的一些局级单位，积累了一定的生产基金和机动财力。它们既有资金，又可以调动企业的技术、设备力量。例如，泮溪酒家在深圳设店是由广州市服务局出面组织和投资的，从泮溪酒家抽调一些厨师、楼面人员去深圳后，本店缺员，由服务局通过公司抽调下属单位的有关人员支援，可谓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再次，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企业也应克服依赖等待思想，尽量通过自筹资金搞联合。自筹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本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发展生产，积累资金；二是一个企业财力不足，可以由公司、局牵头，组织本系统、本行业的若干个企业集中投资。广州市化工局在深圳蛇口同外来投资者联合开办的广富合成材料厂，其资金就是由属下的几间工厂的利润留成部分自筹解决的。

（3）公私结合，充分发挥国家和群众的两个积极性。国家目前提供无偿投资有困难，但可通过银行信贷支援。这种贷款应同一般信贷有所区别，利息不宜定得太高，以扶持联合企业的发展。另外，现在广州市群众手上也有不少钱，去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有十三亿二千七百万元，如加上散存在群众中的现金，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如果能把这些钱集拢起来也可以解决不少问题。集拢的方法可以由银行举办特区联合企业股份公司，或由联合企业以股票形式收集，定期按股分红。但是在这些企业中，国家或者企业的投资必须占相当份量，以掌握和控制企业的命脉。

总之，我们要开辟多种渠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才能加快广州市与特区经济联合的步伐，为四化建设服务。

加强管理，加强立法

——再探经济特区立法问题

王致远

我国经济特区的立法工作，近年来已有较大进展。继《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发布之后，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特区条例》精神和实际需要，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又制定、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四个单行法规，这对于吸引客商投资，促进特区发展，进一步办好、管好特区，具有重大的意义，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从当前情况看，特区立法工作仍然不能适应特区发展的实际需要，一系列的法规，仍有待于及早拟订、公布、施行。这其中，既要继续贯彻特殊政策，用优惠条件来吸引外资，又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管理，把特区办好。本文拟着重从加强管理的角度，继续探讨经济特区的立法问题。

既要交往，又有斗争

试办经济特区，对外更加开放，用更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这是我国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二年多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十分英明的。以深圳特区为例，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引进项目及外来投资协议共达1200多项，计划投资86亿港元，实际投资到一九八一年底已达12亿港元。目前，罗湖小区正在成片建设，一幢幢高楼大厦正在耸起，整个工地显现出一片繁忙兴旺的景象。原来是一片荒滩野岭的蛇口，也已变成拥有15家工厂、企业（已签订协议共24项）、六百米顺岸码头，以及专用公路、电厂、水厂和微波通讯站的新工业区。通过办特区，深圳全市工农业产值和地方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局面已经打开，机构已经建立，干部队伍正在成长，并且已经摸索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在国家投资很少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这不能不归功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绝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和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而对党的这一政策表现动摇。当前的问题是，要在继续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吸引外资的同时，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管理，加强立法，堵塞漏洞，使经济特区更健康、更顺利地发展。

利用外资（包括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我国同国际资本交往、进行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这种经济合作不但必要，而且可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能关起门来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吸收全世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而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我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国家底薄，人口多，生产落后，国力有限，尤应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利用外资，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自力更生的力量，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特区以利用外资为主，外销为主，尤应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坚持特殊政策，突出一个“特”字。那种拒绝同国际资本交往，孤立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同国际资本交往，进行经济合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课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头脑清醒地去探索、研究。不能一谈合作，就抛弃原则，丧失立场，忘记了合作的目的。列宁在苏俄实行租让制时，一方面肯定同国际资本交往是完全必要的，不能动摇，一方面又强调指出这种交往同时包含着严重的斗争；交往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说：“……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1页）

同国际资本交往包含着什么严重的斗争呢？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同国际资本交往，同时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竞赛，两种力量的较量。自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资本帝国主义最初企图通过武装侵略和颠覆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经过反复较量，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妄图通过和平竞赛，通过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主要靠利用外资来建设，与外资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但这并不取消两种制度的较量。资本主义国家办出口加工区，发展资本主义，与外资性质一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外资存在着矛盾，这就是我们办特区更复杂、更困难的所在。究竟是我们利用外资，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呢？还是国际资本利用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使广东资本主义自由化？这就是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试办经济特区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对付的问题。

其次，利用外资具有两重性，在外资和技术、设备进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带进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等等坏东西。当然，对于用正当手段来同我们交往的客商，我们表示欢迎，待之以礼，在合作经营中，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用法律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中，必然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经受不住资本主义的腐蚀而腐化变质。因此，坚持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资本交往，对于我们干部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我们经受住这种考验，既坚持同国际资本交往，又能够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那我们就胜利达到目的；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只顾交往，忽视或放弃必要的斗争，那就会打败仗。

再次,外来投资者到特区来兴办各种企业、事业,要遵守我国法律、法令,受人民政府的管理,这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的所有者仍然是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不要利润的资本家。他们到社会主义特区来投资,目的仍然是利润。当然不能抹煞许多华侨、港澳工商业者是抱着爱国心来的,他们这种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嘉许、欢迎,但是,不能因此说,他们就不要利润。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同反对剥削的社会主义本来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可以统一起来。但对立的统一并不等于取消矛盾。出自资本的本性,它总要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总想控制竞争对手,垄断市场;总想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在利润驱使下,某些人还可能做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来。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丧失警惕,依赖外资,受制于人,那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试办特区以来,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不是已经不止一次地受骗上当,在经济上吃亏受损吗?

由此可见,在同国际资本交往中,我们不但要善于同外资合作,并依法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坚持原则,坚持必要的斗争,防止偏离正确的轨道。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国际资本交往,就忽视、放松或不敢进行必要的斗争;也不能因为交往中存在着斗争,就对实行开放政策,同国际资本交往发生动摇。我们必须坚决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更正确、更健康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为了坚持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必须加强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管理,就必须相应加强立法,在经济特区尤其如此。我们要引进外资,非完备法制不可;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进行必要的斗争,也应以法律为武器。不重视法制是不对的。

加强对利用外资的管理

加强对经济特区的管理,重要的一面是加强对利用外资的管理。在这方面,根据二年多来的情况,要考虑到如下几点:

第一,要以我为主,根据自己的条件,认真掌握利用外资的主动权和审批权。

经济特区的建设,主要靠利用外资,这是没有疑问的。为了办好特区,加快特区的建设,我们一定要积极努力,千方百计地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但是,对于利用外资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我为主,有所规划,积极引导,有所选择;一种是以客商为主,消极等待,来者不拒。我以为前一种态度是正确的,后一种态度是错误的。有的同志认为,客商到特区来投资,只能自愿,不能强迫,因而谁来谁不来,投资多少,兴办什么企业、事业,我方无能为力;特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不能受国家计划指导;特区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一切可以特殊、灵活,迁就一点也无妨。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试办特区,有着远大的目标,而不是仅仅为了赚取外汇。既然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试办经济特区,就必须拟订规划,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什么该引

进，什么不该引进，都应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有所选择，而不能放任自流。一般说，凡是有损国家主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影响民族工业，冲击国家计划，挤占出口配额，缺乏国际竞争力，污染环境，“污染”精神的投资，我们都不应接纳；谁想进来投资，我们也不批准。那么，我们希望来的他不来又怎么办？当然，外资不能由我们支配，但是，我们也决非无能为力。我们可以靠政策，靠优惠，靠宣传去努力吸引、争取；香港、澳门没有，我们还可以到世界其他各地去争取。只要有利可图，条件合适，加上我们积极争取，做好工作，国际资本总会来的。

特区经济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而以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为主，这就决定对特区经济的管理，不能照搬内地一套办法。合资企业或外资独营企业，其产品主要是出口外销，这就不能不由市场来调节。但是，我们必须认识，特区虽“特”，也是全国、全省的一个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利益，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而不能脱离全局，摆脱国家计划。从宏观方面来说，特区政府对于特区内各种企业，都应区别不同情况，适当管理，而不能放任自流。如果由于指导、管理失当，以致冲击国内市场，影响国家计划，损害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会偏离特区发展的轨道。当然，管理过多、过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也是不必要的。

特区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以比内地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对外更加开放，这是肯定的，今后还要继续这么办，不如此，就不能突出“特”字。但是，必须明确，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在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基础上的特殊，是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前提下的灵活，不是离开统一的特殊，离开原则的灵活。在政治上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上不能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计划；在思想文化上必须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否则，就违背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根本出发点。这就是说，特殊和灵活都不是没有限度的，超越一定限度就会出轨。这里顺便讲讲近来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在一些专门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的宾馆中，采取了一种“投其所好”的做法来多赚外汇，如在宾馆、旅社中，提供场所，出租赌具，让旅客在宾馆中赌博。这不但违反了我国法律，而且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有关部门提出要禁止，而有的主管部门则主张允许特殊。我认为，搞这种特殊，就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照此办理，岂不是给资本主义侵蚀大开方便之门？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第二，要学会做生意，签订好协议、合同，防止受骗吃亏。深圳特区二年多来共签订利用外资的协议一千多项。总的说来，签约和履约的情况是良好的。但由于缺乏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经济上遭受损失。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没有对对方资信进行调查，就贸然签订协议、合同。例如，深圳某胶花厂与某港商签订来料加工合同。合同上写有对方公司名称、地址、电话，但事先没有查明某港商是什么人，在香港的资产、信用如何，有没有能力履行合同，就签订了合同。后来对方拖欠工缴费，几经催款，不见回复，派人到香港调查，才发觉该公司并非某港商开

设的。结果，工缴费七万港元无法追回。

（二）合同内容不明确，不具体，被人钻空子。例如，有的协议书对引进设备的规格、型号、性能、产地等没有具体规定，客商就利用这点，在提供设备时，以劣充好，以旧代新，使我方遭受损失。

（三）合同中缺乏经济责任条款、担保条款、仲裁条款，使我方吃亏。例如某机械设备出口公司与香港某国际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利用外资创办某某汽车装配厂。由于协议中对双方经济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以致乙方违约，来料不足，造成工厂停工停产，我方损失人民币二百多万元，无法索赔。又如，深圳某服装厂与香港某制衣厂签订加工服装协议，因没有订明担保条款，港商提货已数月，而工缴费六万港元却一直拖欠不还，无法追索。又如，深圳某印刷制品厂与客商签订协议书，由于前后规定有矛盾，执行起来，双方争议不休，无法解决。协议书中没有解决争议的仲裁条款，结果客商不同意正式投资，造成工厂停工待料，靠国家贷款过日子，欠债人民币七十八万元。

第三，要对引进的项目进行必要的管理、监督，引导其向正确方向发展。特区的合营企业或外资独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其内部的经营管理，有其自主权，自然不能搬用内地那套管理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一般说，如果企业遵守我国的法律、法令，用正当的手段来经营，那么，我们的管理、监督，主要是从经济上进行，限制其攫取过高的利润；在劳动条件、劳动设施、工资福利等方面，保护职工的权益，调整劳资间的关系；督促其切实执行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防止污染，等等。如果客商藐视我国法律，利用漏洞钻空子，进行走私贩私、行贿收买、投机诈骗、套汇逃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等犯罪活动，那就要依法予以惩处。

上述几个方面的管理，有的已完成了立法工作，在已公布的法规、条例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现在主要是执行的问题。另外一些问题，则迄今尚无法可依或法律不够完备，这就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及早制订、公布有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如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专利法、商标法、公司法、对外经济合同法、仲裁法、房地产管理、外资银行管理等等，以利于运用法律来加强管理。

加强对特区建设的管理

加强对特区管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要对特区本身的建设加强管理，并相应地制订有关的法规。这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对城市建设的管理，把特区建设成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繁荣、文明、整洁、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建设现代化城市，首先要求有一个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确定城市的性质、发展方向、规模、功能分区和各项建设的总体布局。总体规划经批准后，就要切实执行。凡在城市规划范围内进行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都必须按照规划的统一布局和要求，进

行设计。可能有一些客商只顾自己图利，或力图获取更大限度利润，而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发生矛盾，为此，有关部门对于设计图纸必须认真审核，不合规定的，都要予以纠正。审核时特别要掌握如下几个方面：（一）合理的建筑系数。要求新建项目，在节约用地的原则下，尽可能满足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防火安全等方面的空间要求，并保证足够的道路、绿化和户外活动的用地。《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客商在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应依照市规划部门关于建筑楼比、园林绿化比的规定进行建设，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按国家城建总局规定，新建城市绿化面积应占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扩建和改建城市，不得少于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北京市规定，新建城市干道绿化宽度不得少于道路总宽度的百分之二十五。道路两侧有一定宽度的绿化带，这对于城市市容和防尘、防噪音等起着很大作用。特区土地很宝贵，建筑楼比、园林绿化比如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特区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规定，必须通过立法程序来解决。许多专家对罗湖小区高楼大厦过于密集有不同看法，这问题，现在只能尽量设法加以补救。（二）环境保护。《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客商用地范围内废渣、废气、废水的排放和处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排放标准和处理的要求，并接受市环境保护部门的检查监督，按规定缴纳处理费。”对这一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切实加强管理。对于整个特区的生态环境，应通过立法来加强保护和管理，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三）防火安全。《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客商在用地范围内的一切建筑，均应符合我国建筑规范和防火安全要求，违反规定者，不准投产、使用；擅自投产、使用，导致发生事故的，应赔偿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据公安部门的同志说，高楼大厦之间应有十三米的空间才能进消防车。目前深圳市的一些建筑，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只能在高楼大厦内部安装消防设备。（四）公共设施。《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条：“客商用地范围内按合同或协议书规定应承担建设的公共设施，须按城市规划要求修建。”第二十一条：“客商用地范围内的供电、供水、排水、下水道、煤气通管和电讯设备，均应自行修建，其衔接与用地范围外的各种干线的安装费和出装费应由客商支付。”（五）文明施工。对建筑现场的管理以及建筑机械、设备、建筑物资的安置、堆放，占用道路及周围空间的批准等等，都应加强管理，防止影响城市交通、市容和清洁卫生。

第二，加强对思想文化活动的管理，抵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防止精神上的“污染”。经济特区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根本说，精神文明主要靠正面进行积极的建设、创造，但是，加强管理，抵制外来的侵蚀，消除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风尚的影响，也是不能缺少的。特别要禁止淫书、淫画、反动和黄色书刊，以及一切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录音带、录像带的进口和传播。

第三，要加强城市治安管理，维护特区的社会秩序。要使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进入特区不但有安全感，而且健康愉快，赏心悦目。不但愿意来走走，而且愿意来定

居。如果城市治安不好，环境脏，秩序乱，服务差，甚至抢劫案、凶杀案、火警、交通事故频繁，人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那就会使一些投资者裹足不前。

第四，加强对特区与非特区分界线的管理，防止、打击利用特区进行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特区前门（边境）要更加开放，后门（特区与非特区的分界线或称二线）就得严密管理。要在特区与非特区的分界线设置检查站，防止特区免税产品和从香港进口的免税、减税商品大量流入内地。深圳特区与非特区分界线共达八十多公里，管好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事情。不但要围铁丝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完善合理的管理方法。与此有关，应同时加强对内联企业的管理，防止有人利用来走私贩私、投机倒把。

第五，加强对特区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把特区政府建设成革命的、精干的、廉洁的、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要制订一系列行政法，明确规定政府各部门的任务、职权、组织形式、活动方法和人员的配备、任免、考核、监督，等等，以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特别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防止利用职权谋私，腐化变质。发现违法犯罪者，就及时严肃处理。在这方面，特区应该有比内地更严格的要求。

一九八二年五月

本刊征求封面设计启事

本刊征求封面设计样式，请各地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参加设计。

凡经采用的封面设计样式，即发稿酬；未经采用的酌发资料费。

《学术研究》编辑部

特区经济条件的变化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新问题

吴群策 吴赤峰 郑伟标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要搞好经济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可不对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一个大致的分析。

我们的经济特区有别于国内其它经济建设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它将采取更为开放的办法，用各种方式同国外客商以及华侨、港澳同胞中的工商界进行经济合作，为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随着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活动的开展，特区经济的结构、体制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物质关系的这种变化，必然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影响，导致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这就给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精神文明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课题：特区经济的特殊条件给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哪些与内地不同的新特点、新问题？这些条件对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我们当前抓好特区精神文明建设要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本文试图着重从思想战线工作的角度对以上方面的问题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要看到特区经济的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

首先，应该充分看到经济特区的设置，不仅促进了特区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也给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经济特区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大大地鼓舞了特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忱，振奋了民族精神，坚定了广大群众建设四化的信心。

以深圳特区为例，这里原是一个边防小镇，

兴办经济特区前，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市政建设也很落后，群众生活比较贫穷。而与深圳山水相连的香港，近二十多年来却获得了经济起飞，成了一个畸形发展的繁华之地。有的人看见这种情形，不由渐渐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产生了怀疑，偷渡逃港之风一度越刮越炽。

自从兴办经济特区以后，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深圳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去年底止，已引进外资项目989项，计划投资额77亿多港元，已进口各种机械设备1万多台，安排了近2万人就业。一年收入的工缴费和利润分成近2亿港元。特区建设气魄之大，速度之快，为国内所罕见。人们清楚地看到，再过三五年、十来年，深圳将会以一座新型的社会主义城市的风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特区发展美好的未来，引起人们的向往，激发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家园的豪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充满希望，对四化建设充满信心。现在，不但逃港之风已基本刹住（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还不断地有人从香港回归深圳。特区建设，正是从根本上，从不断积累物质财富给人们带来的切身利益上，激发了人们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忱，这就给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特区企业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培养和锻炼了新一代具有无产阶级本色的工人阶级队伍，洗刷了在“大锅饭”、“铁饭碗”体制下养成的懒散习气，同时也冲击了官僚主义的恶习，推动了管理体制的改革。

随着特区建设的开展，引进了一大批企业，其中在电子、轻纺等项目中，都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生产水平。

由于特区企业一般都注意依靠经济杠杆管理生产,使工厂生产的好坏直接同每个职工的经济利益挂上钩,极大地调动了工人搞好生产、提高技术的积极性,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和技术熟练水平都比以前大大加强和提高。例如深圳特区的罗湖区属十五间工厂,完全取消基本工资,工资多少由工厂完成利润的经济成果来计算,对职工实行定额计件超产累进奖励制度,超得越多奖得越多。对新工人一反过去三年学徒,好坏都是一级工的做法,进厂后试用二、三个月,经技术考核合格就可进入按件计工,极大地调动了新工人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实行这些办法,打破了吃“大锅饭”的情况,以后特区所有企业都要实行合同制,偷懒的人就更吃不开。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支勤学向上、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先进工人队伍。

由于特区企业有不少是合资或由外资独营的,在企业的管理上引进了不少先进的管理方法,也促进了特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如罗湖区制订了“公司管理条例”和“工业管理章程”,明确了管理人员的职责,并对他们实行浮动的工资制,厂长每月工资等于全厂计件工人平均工资加职务补贴,盈利有奖亏损要罚,这就大大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我们特区企业要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迫使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我们高兴地看到,特区的领导机构经过前一段的整顿和精简,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3. 由于特区经济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为建设各种精神文明活动的设施提供了物质基础。

开展精神文明活动总是要通过一些相应的机构和设施来进行的。振兴科学,就要建立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发展教育,就要兴办各种学校、图书馆;繁荣文艺,就要建立文艺团体,出版书刊报纸,设置各种文娱活动场所;此外,还要建立电台、电视台等设施;建设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努力普及和提高特区群众的教育程度,满足人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需要,还要培养出特区自己的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授、学者及其它各种专门人才。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但是,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是投资很大,又不直接赚钱的事业。这就要求社会用它的物质文明的基础,来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设施服务。过去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发展这些事业却又拿不出多少钱来。由于特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现在可以办到了。特区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筹集资金兴办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批文化教育设施,为满足人们精神文明活动的需要而努力。

此外,特区还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依靠华侨和港澳同胞中热心的人士,投资兴办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目前在这方面已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深圳特区与香港联成企业公司在合作开发的深圳湾后海新城区,就是一例。这个新城区,将包括有一所大学和若干个中小学、幼儿园,一批供教授、科技人员使用的别墅,还有高级疗养院、度假村、剧院、运动场、大型会议厅、海滨公园和游泳场等。它建成之后,将会为特区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4. 随着特区经济活动的开展,在对外活动和人员交往中,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资本主义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人类进步的产物,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尽管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本质不同,但也可吸取资本主义文明中好的东西,为我所用。比如有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兴起的讲卫生、讲礼貌,服务态度热情,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等等,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经济特区的建设给特区的精神文明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可以预见,随着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些积极的因素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充满信心。

二、决不可低估特区的经济条件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副作用

经济特区也有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主要是指经济特区中某些特殊的经济条件,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消极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经济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支流的东西。在经济特区，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当然，一切腐朽的思想作风，都根源于剥削阶级，而不根源于我们党的政策。可是，这些腐朽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有它的市场，并在某种情况下泛滥起来，这不能说同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没有关系。我们必须敢于正视并认真分析这些经济条件，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取得主动权。

具体来说，特区中有那些经济条件会在思想方面给我们带来消极影响的呢？

1. 在所有制方面，特区有一大批与外来投资者合营的企业以及外来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资金投放、厂房设备、技术力量、经营管理以及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往往具有比国营企业或合作企业更为优越的条件。它们盈利较丰，职工待遇也较好。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的认识。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低工资、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行补贴的政策，外来投资者在给工人略高于当地工资水平的报酬后，仍然可以从廉价劳动力中取得额外的利润，这反过来又容易模糊了劳动者对资本剥削实质的认识，产生“资本家待我们还不薄”的错觉，甚至把国家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作的必要的扣除积累，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混为一谈。

合资和独资的企业，有很大的自主权，它们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按照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原则来调节企业的生产。企业的一切内外活动都是为了赚钱，正所谓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资本这种增殖的欲望，决不仅是个人的意图，它必然要贯注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影响所及，佣金、回扣、送礼、小费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润滑剂”也渗入社会的肌体，使得“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等腐朽观念占据了一些人的灵魂。

2.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外来投资者及其代理人在特区处于社会上层的地位，他们的意志和思想作风所具有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说明人们所处的地位对于他们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力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经济特区，外来投资者及其代理人并不是统治阶级，但又不是被统治者，也不是象五十年代民

族资本家那样的被改造对象。他们是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受欢迎的朋友，在交往中常常被尊为“上宾”，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地位。他们凭藉手中的钱财，过惯了优裕的物质生活，而我们为了利于经济合作，也在特区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住高级的宾馆、别墅，出入豪华的酒家、饭店，安排周到的生活服务等。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至衣著举止，往往成为一些人心目中向往和仿效的模式。这样，他们的吃喝玩乐的人生哲学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自然就在社会上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企业里，他们有权有职，对生产任务、职工的工作安排以及奖金待遇，都有权过问。个别独资经营的企业，还由外来投资者个人直接决定给每个职工多少奖金，并用红包的形式秘密发放，使得职工必须看资本家的脸色办事，以资本家的意志为意志。

当然，我们对到特区来办企业的外来投资者要有分析。应当看到，其中多数人是正派的，是愿意以正当手段同我们做生意的，并不有意识地要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腐蚀我们。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不怀好意的，他们运用各种非法的手段去谋取非法的利润，并且传播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青年职工。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3. 在流通领域，特区以市场调节为主，价值规律起着支配的作用。由于地处边防通道的特殊位置，在香港和内地的商品存在较大差价，海关关税对特区有某种优惠、边防管理又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搞转手买卖的歪风必然会蔓延起来。

拿深圳边防地区的小额贸易来说，本来，政策允许边境的农民、渔民将自己生产的农、渔、副产品直接拿到香港市场出售，并可适当购回部分生活日用品报关完税后供自己使用，这当然是对边境劳动人民的一种特殊照顾，可是执行时政策规定的界限往往被超过。有的高价收购附近地区的农副产品过境出售，换取外汇收入；有的买回大量工业用品转手卖到内地；有的甚至发展为走私贩私。这种情况曾经一度造成部分边境农民、渔民无心生产，靠转手买卖来发财致富。有的集体、甚至国营的单位，也用自己手中一些外汇，成批进口布匹、成衣，高价销往内地，取得高额利润，使这些单位的职工得到高额的奖金。这些对人们的思想有着腐蚀作用。

4.在分配方面,由于在合资和独资企业里剥削的合法存在,特区里分配所得最多的人并不是劳动者,而是投资的客商;同时,由于还存在着其他非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些善于钻营取巧的人往往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比别人更好的收入,这就降低了劳动的权威,滋长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投机思想。

此外,特区里的企业一般都把职工的收入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密切联系起来,这本来是有利于鼓励全体职工关心企业的正确措施,可是,由于存在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各部门、各行业的供销条件以及起点基数又不相同,企业盈利的情况很不一样,这就造成各企业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很不平衡。行业条件好的,劳动差些也可得到好收入;行业利润少的,劳动再好收入也不高。

5.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外来投资者要同我们做生意、签合同,总是希望能得到最优惠的条件,其中一些不正派的人还千方百计用小恩小惠来拉拢、腐蚀我方洽谈人员,以便付出小代价,占到大便宜。我方外事人员大多数是能够从党性出发、秉公办事、不谋私利的。但由于我们参加对外洽谈的干部一般只负行政责任而不直接负经济盈亏的责任,因而有可能发生私人受小贿,而国家、企业破大财的情况,少数贪污受贿分子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资本家施舍的一点私利。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上情况说明,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斗争。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的,我们既要深刻地理解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又要精心地注意我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环境的极端复杂性,及时发现和克服各种严重危害我们事业的消极现象。这就是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目的。

三、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两个社会、两种制度对比的教育

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是在经济特区建设精神文明中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只有全党、全体人民对这个问题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才能够使我们的特区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也才能够谈得上抵制资本

主义思想的侵袭,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在深圳特区,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同毗邻的港澳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就使两种社会制度谁优谁劣的本质容易被一些具体现象所掩盖,从而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外来投资者给的工资比国营企业还要多?边境人民究竟靠什么能够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特区建设的高速度发展,说明了哪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必须密切结合实际发动群众进行学习和讨论,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从设置深圳经济特区以来新碰到的思想认识问题来看,我们在社会主义教育中,除了强调要从根本上认清香港和内地这两种社会的不同本质之外,当前还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究竟是资本家对工人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好?

有些合资企业的职工提出:资本家给我们工人的工资,是按每人每月平均工资750元港币计算的,国家扣除了百分之二十(即150元港币),企业还要扣除近百分之十五(即约100港元)用作集体福利,剩下的约500港元还要按牌价折成人民币约150元发给工人,这不是说明资本家本来对我们还不错,而国家却一卡再卡我们的脖子吗?这种错误的认识如不认真加以解决,势必影响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模糊人民对资本剥削实质的认识,造成思想混乱。

我们首先要看到,资本家投资办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时刻都想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我们国家同外来投资者洽谈时,在作出低税、低地租的让步后,争得比国内工人工资高出许多而还低于先进国家劳动力价格的职工待遇。这是我们对外来投资者进行有理有节斗争的成果。我们不允许外来投资者在国内自由雇工,这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因为在雇佣劳动制下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价格(工资)只能相当于维持这种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国内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势必会大幅度压低工人的工资。我们坚持要通过国家劳动部门来安排职工,这就保障这些企业里职工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其次,国家从这些企业的工资总收入中提取一些积累和公益金,是十分必要的、完全合

理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提取的积累完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职工所享受的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事业的福利，职工所购置的低价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巨额补贴，都是由国家来开支。怎么能够把国家所作的必要扣除同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混为一谈呢？事实上，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里都是没有过的。我们国家实行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更需要有一笔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资金。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表现。

2. 特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外来投资者的赐与，还是党的政策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的成果？

这几年深圳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边境一带的农民、渔民通过小额贸易以及接受来料加工等，大幅度增加收入，生活迅速富裕起来，这是有目共见的。然而，对于这种富裕是从何而来的，人们却有不同的认识。有些人以为，富裕似乎是资本主义的香港给他们带来的。春节期间边境地区有的新屋贴着“财从外至、福自天来”的对联，就反映了这种认识。应该说，深圳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首先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无论是那里来的投资，都要经过人们的劳动才能转化为特区建设的成就。正是由于人们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劳动者才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收入。其次，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仅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且为劳动实现更大的效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拿小额贸易来说，边境地区的农民、渔民可以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渔产品直接拿到香港市场卖得较高的价格，并得到一定数量的外汇；又可以按规定买回小量的日用工业品供自己使用，这是国家对边境人民的特殊照顾。因为外贸本来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的，它的盈利归国家财政收入，现在把这部分盈利给了边境人民，而边境人民还照样享受国家举办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事业的福利，照样得到国家作了巨额补贴的低价基本生活必需品。这不正是党和国家给特区人民带来的“福气”么？

3. 特区建设的成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胜利，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外国报刊对深圳经济特区曾经发过这样的议论：“如果深圳基于吸取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取得成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受到挑战”。“特区

在经济上的成就越大，就越证明国内其他地区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缺乏优越性。”这些看法从根本上曲解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的性质。我们的经济特区，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之下，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以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并没有照搬资本主义制度。特区里的合营企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独资企业也受特区人民政府的管理，也要遵守我国的法律，要交纳企业管理费、土地使用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在经营范围上受我们的限制，因而也带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说，引进的外资和外国技术，都是在无产阶级国家领导和管理之下发挥作用的，并不是让资本主义在我国国家自由泛滥。我们能够成功地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这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容纳一切进步的、有用的因素，而又能够沿着自己的目标顽强奋进的巨大生命力。

总之，在经济特区，要更加重视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并且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去回答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提出的思想认识问题，使这一教育更有针对性，更有成效，为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四、要广泛进行劳动光荣、劳动致富的教育

怎样克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是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由于外来高级消费品的引诱，特区社会上讲钱、讲享受的风气很盛，它妨碍着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妨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必须抓住劳动教育这一主要环节，才能帮助人们划清一些界限，因势利导，把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它的要害，就是不走劳动致富的正道，而是不择手段地去攫取不义之财。我们要使人民富裕起来，当然也要讲盈利，也要积聚钱财；但是，我们决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劳动，靠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靠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而发财，这是我们必须划清的一条重要界限。

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除了允许外来投资者靠他们所投放的资金取得合法的利润之外，无论是国营企业、外资企业、集体企业的职工或个体劳动者，都应当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致富。劳动致富是劳动人民本色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劳动者通过为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劳动，通过在生产中创造更大的价值，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报酬而富裕起来，同时也为企业、国家、社会作了更多的贡献。这样去致富，必然同集体、国家的利益相一致，也必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社会公众的鼓励和支持。凡是劳动致富者，我们都要在政治上尊重他们，精神上鼓励他们，生产上帮助他们。

可是，也有些人划不清允许外来投资者获得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职工必须坚持劳动致富的界限。他们利用我们某些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密的情况，或者大搞进口货的转手买卖，进行投机倒把；或者拉关系、找门道，收取巨额的佣金、回扣；甚至猖狂进行走私贩私、大发横财。这些人只想致富而不愿付出劳动，只顾发财而不择手段，结果走到违法犯罪的邪路上去了。

在坚持劳动致富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划清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界限。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呢？从本质上看，资本家是以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生的，它的生活方式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劳而获，靠无偿地大量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使自己过着奢侈、豪华的物质生活。这种病态的、寄生的生活方式，必然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气息，伴随着花天酒地、寻求刺激、以至狂舞滥赌、奇装异服等畸形现象。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反对使用高级消费品，更不是反对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只是反对脱离自己劳动去追求超过社会生产水平和自己劳动收入水平的物质享受。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根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生产的许多高级消费品，我们不仅都要有，而且

还要造得比它们的更好。但是，我们所创造的这些物质生活条件，都应该是我们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的生活水平必须也只能同我们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他的生活水平还要同自己的劳动收入相适应，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区别。

当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仅表现为醉心于高级的物质享受，它还渗透着腐朽、没落的习气，这些也是要在端正劳动态度、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抵制和解决的。

五、要深入进行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

在经济特区的复杂环境中，在引进外资、同外来投资者实行经济合作的工作中，能否使我们的干部队伍保持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是搞好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首先，我们对保持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对待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历来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且强调要保持自己活动的独立性和自己队伍的纯洁性。现在我们在同国外资产阶级进行的长期斗争中，要着重防止自身队伍的腐化变质，更加注意党性、党风、党纪的建设。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丧失警惕，无原则地迁就外来投资者的一切要求。就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来说，要注意防止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极力仿效港澳以及国外资产阶级的倾向。当然，由于外面的物质生活水平一般比较高，我们在特区为外来的客商提供较好的生活设施，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一切不健康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迁就。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关门主义，反对笼统地把外来投资者都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保持党的纯洁性，并不是不要同资本家合作。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是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的，既包括实行开放政策后新带来的思想影响，也包括原来就在社会上以至我们队伍里存在的思想影响。至于来同我们做生意的外来投资者，只要是以正当手段来谋取合法利润的，就不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施放糖弹的腐蚀者。我们在同外来投资者打交道中，要尊重他们，不要无

根据地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质。

其次,要明确认识在特区环境下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区里有一大批与外来投资者合资和外来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企业,怎样认识党的基层组织在这些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特区建设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组织生产的大权不在党组织手里,党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因而党员、干部只顾埋头搞生产、多挣钱,党的组织生活很不正常,以至处于涣散、半涣散的状态。这是一种很有害的糊涂认识。应该说,正因为资本家在这些企业里的作用和影响大了,党组织在政治思想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任务也更加重了。在政治上,既要教育党员深刻理解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认识引进外资的意义和作用,使党员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又要对党员进行坚持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并通过他们去团结、教育广大职工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在生产中,既要支持外来投资者组织生产的正常活动,动员群众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又要对合同的履行、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的遵守起监督的作用。所以说,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党组织更要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

最后,在经济特区工作的全体党员和干部,还应当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特区的客观环境和工作任务都对共产党员的党性、党风、党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能够高瞻远瞩,认清特区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针对特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作出能够解开人们思想疙瘩的回答,我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为了正确地贯彻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断地研究和解决特区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更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干部系统的理论学习实际上停止了多年,更为严重的是,现在有一部分干部、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冷淡、不关心的态度,这是同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指导思想,只有紧紧抓住这个核心,才能搞好特区党的建设,才能搞好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九八二年六月



胡钟达教授在穗作学术报告

最近,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胡钟达教授应广东历史学会的邀请,在暨南大学作题为《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学术报告。

胡钟达教授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它既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或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它是东方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种具有本身特点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

胡钟达教授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是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再由阶级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历史上产生,也要在历史上消灭;社会主义是人类消灭阶级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共同远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于阶级社会这整个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究竟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只存在着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或者只有封建制(广义的)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假如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何,这些学术问题,可以进行探讨。

(思 彬)

试论社会生产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建设

柯 木 火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科学地提出和规定了物质生产的范畴，而且也科学地提出和规定了精神生产的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生命生产和精神生产，人们既是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者，自己的生命的生产者，也是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者。按照马克思这个思想，我们应该说，物质文明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精神文明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产物，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每一个社会都有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产生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研究和说明，应该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出发，应该到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当中去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产物。我们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问题，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和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去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问题，但主要的是应该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去研究它们；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问题，同样地也不能深刻地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

马克思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4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构成人类精神文明的那些东西，不外是社会生产的一些特殊形态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意识产品，但同物质产品一样同是社会生产的产物。因此，这些意识产品（科学、艺术、道德、伦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等等）的产生虽然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产生的特点，但却必然受到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从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出发，才能弄清楚意识产品的生产问题，因而也才能弄清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

当然，如何从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出发去深刻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按照马克思所指明的正确方向，我们应该努力去弄清以下三个关系：（1）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生命生产的关系。（2）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3）精神生产的各个部类之间的关系。下面，就这三个关系说一点粗浅的看法。

社会生产既然包括物质生产、生命生产和精神生产，它们之间就相互连结、相互作用。精神生产不仅有个同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而且有个同生命生产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物质生产是社会生产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形式，制约着生命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而它当然也是精神生产的深刻的基础和基本的条件，人们是在改变和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同时改变和发展着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产物的。从社会生产的历史上看，人类的精神生产最初是同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包含于物质生产之中，只是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出现之后，精神生产才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独立的形式。这种分离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巨大进步，既有力地促进了精神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时，这种分离也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变化。当然，物质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基础和条件，这无论在分离之前还是在分离之后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在分离之前，社会的意识产品是物质生产的直接产物的话，那么，在分离之后，社会的意识产品只是物质生产的间接产物，或者说，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作用具有间接性。这是由于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独立形式出现之后，它就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独立系统。例如，精神生产的“生产力系统”，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系统”（包括精神产品的分配和消费系统），精神生产的组织和管理系统，等等。精神生产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不仅受物质生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的制约，而且受精神生产自身这些独立系统的制约，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作用的程度也受到这些独立系统的状况的影响。因此，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之间就不是绝对的“同步”，而只是相对的“同步”，是会出现“不同步”的。历史上或现实中这种“不同步”现象的出现，应该从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从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作用具有间接性去得到说明。

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要着眼于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而且要着眼于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如何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要研究我国现有的精神生产的各种系统是否适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研究精神生产体制的改革问题，研究精神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此外，我们不仅应该弄清楚生命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关系，也应该研究生命生产、控制人口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和影响，因为精神生产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产品分配的状况同生命生产的水平和状况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独立的形式，同物质生产一样，具有自己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就是精神生产的生产过程中一切生产要素的总和，在这些要素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人类的（主要是精神生产者的）思维能力。这是人们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的能力，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们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不断得到改造和提高的。二是精神生产的生产资料。“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概念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精神生产资料就是人们的思维能力产生意识产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诸如科学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图书情报资料，各种智力机构及其设施，等等。人类的思维能力和精神生产资料的结合，就构成精神生产的生产力；不同水平的思维能力和精神生产资料的结合，就产生不同水平的精神生产力。同时，在精神生产中，同在物质生产中一样，人们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包括人们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社会精神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在精神产品的分配中的关系等。精神生产的管理体制是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的体现，属于精神生产生产关系的范围。一定的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就构成一定的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同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类型的划分是一致的，因为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和条件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应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的建设的道路和途径。

从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要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至少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必须努力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全体精神生产者的思维能力。这不仅要首先着眼于精神劳动者的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且也要着眼于物质劳动者的思维能力的提高，是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全体劳动者智力的发展。为此，最主要的首先是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教育事业落后的社会，其大多数成员是不可能成为有较高的思维能力和较发达的智力的。第二，必须努力发展物质生产，努力生产精神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为精神生产提供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水平的、丰富的生产资料。第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努力建立更为先进、合理的精神生产的管理体制。

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要着眼于精神生产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要着眼于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完善，不仅要着眼于精神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要着眼于全体社会成员智力的发展和提高，不仅要研究如何扩大精神生产的生产能力，而且要研究如何合理地分配和消费精神生产的产品，如何合理地满足各种社会成员对精神文化的不同需要等问题。

精神文明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科学、艺术、教育、出版、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心理习俗等等。这些内容如何归类，如何划分为不同方面和部分，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正如物质生产可以划分为不同部门或部类一样，精神生产也可以划分为不同部门或部类。比如说，科学、艺术、文化，可以看成主要是智慧的

产物，称为第一部类；伦理、道德、政治思想、心理习俗，可以看成属于社会思想道德的范围，称为第二部类；教育、出版和各种传播媒介，既可以看成精神文明活动的机构和设施，也可以看成是在社会成员中传播各种精神意识产物的工具和媒介，类似于物质生产中的运输、通讯、动力、供水等部门，可以称为第三部类。正如研究物质生产的各个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作用对于发展物质生产是极其重要的一样，研究精神生产的各个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作用，对于发展精神生产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说，首先是科学、艺术、文化，其次是教育、出版等事业，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更是要求对这些方面的精神文明有更为普遍、更为迅速的发展。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否则精神生产的内在结构就可能是不平衡的，甚至是畸形的。当然，轻视精神生产的第二个部类，贬低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也是十分错误的，是不利于精神生产的迅速发展的。我们当前之所以特别强调抓社会思想道德这个方面，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赵紫阳：《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这是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必须了解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这才能对各种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美国工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系统化、数学和电子计算机在管理中的应用

赵元浩

美国全国工业企业大小一百多万家，但都“组织”在二百家大公司(垄断资本)的周围，或与他们协作，或为他们提供服务，或在他们“统治网”的罅隙中找活干。统治美国的——从经济到政治，就是为数极少的庞大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资本雄厚，现代化技术水平很高，而且大多数是跨国公司，不仅在美国有他们的许多分支机构，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的分支机构或工厂。

现代化工业企业，由于技术和业务复杂，机构庞大，生产门类和分支机构繁多，如果没有相应的现代化管理技术、设备和方法，是无法控制和发展的。因此，管理、科学、技术三者，被视为现代化的“三鼎足”，管理摆在重要的地位。

那么，美国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据笔者的理解，最主要的是管理系统化及数学和电子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在分两点来谈谈。

一、企业管理系统化

一家小型企业，技术、组织、业务比较简单，供应、生产、销售、流通的牵涉面不广，出了问题，主管人员就可解决。但现代化大型企业，从供应、生产到销售，从本地到外地，技术、组织、业务异常复杂，怎样才能适应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的情况，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在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下，出现了系统化的管理方法。

什么是系统化的管理方法？就是按照企业管理工作的性质，或同性质的企业，分成若干系统来进行管理。一般现代化大企业，都分成以下一些系统：

(1) 信息系统。包括市场调查，供应状况，

技术动态，物价变动，销售状况，企业生产、经营、安全、质量、计划完成情况，职工动态，库存动态，在制品、协作件的存、供情况，成本变化、财务状况，产品及原料储运情况等等，这些资料 and 数据的收集、整理、交流、反馈及处理意见，都通过这个系统来负责。

(2) 决策和计划系统。根据信息提供的资料和意见，作出决策，又根据决策和长期计划编制当年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和作业计划，都由这个系统去完成。

(3) 组织与人事系统。负责研究解决管理组织和劳动组织，招聘职工、任用、升迁、培训、教育职工等问题。

(4) 安全和质量管理系统。负责安全生产，防止污染，环境保护，卫生及质量管理工作。目前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质量及解决公害(污染)问题。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提出“全面质量管理”(TQC)，引起世界的重视，争相仿效。所谓全面质量管理，就是全企业所有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和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包括市场调查、新产品研制、评价、试验、采购、外协、试产、正式投产、销售、包装、运输，直到为用户服务，都实行质量管理，取得良好的效果。

(5) 供应系统。包括原材料、能源、辅助材料、机器、设备、工具、量具、外协、外购、包装、交通工具等仓库管理亦归这个系统控制。

(6) 生产、技术系统。包括产品改革、新产品设计、试制、技术改造、技术管理、新技术研究、试验、代用品研究试验，节能技术研究试验，生产过程的管理调度与协调，固定资产管理与维修等等。

(7)销售系统。包括市场调查资料的供应和预测,新产品试销和推销,产品销售政策和计划的建议,销售网、点的建立,定货函电文件的管理,交货日期的监督,包装设计和运输,储存、保管,产品价格的建议等等。

(8)成本、财务系统。产品成本的控制和管理,降低成本计划措施的设计与监督;企业收支计划及流动资金计划的编制与管理,经济核算的设计、统计和监督,国家税收、利润、奖金、折旧基金的管理,计划外费用开支的控制和监督等等。

企业管理系统化是以系统管理学派的理论为基础,并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相适应的。实行系统化管理,管理人员必须专业化,从事某一系统工作的人,都要经受专门的教育和训练。业务精通,解决问题的效率提高,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但系统化管理并不是企业各部门各自为政,而是使各部门相互联系的网络更为清楚,因而加强联系、衔接、互相配合,以利于实现企业的总目标。

其实,企业管理系统化,企业管理人员专业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因为技术、业务日趋复杂,企业分支机构分布地区很多,情况变化和差异很大,不实行系统化管理,管理人员不专业化,是无法适应的。这是美国现代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数学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出现,但多用于作战和交通运输上。一九四六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世,也只用于武器研制、工程设计和天气预测上。从一九五二年起,开始进入商业的领域,当时美国大约拥有50多台,但由于体积太大,耗电太多,价格很高,易于损坏,未能广泛应用。自晶体管计算机出现,就开始用于生产控制和企业管理方面。六十年代以后,集成电路计算机问世,计算机不仅可以用于生产控制和管理方面,而且可以用作经营管理决策,制定战略和计划工作的工具,因而数学方法如运筹学,线性规划,作业研究,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等,亦因有了高速的运算工具,而得到广泛的应用。据统计,美国生产的电

子计算机用于各种管理工作的已达85%以上。不仅大型现代化企业应用计算机,中小型企业、商店用计算机的比重也很大,甚至家庭管理工作如记帐、备忘也都用上了。

美国企业使用计算机有两种形式,有的(大企业)自己购置专用,不少中小型企业则采取租用的办法,可以减少投资和维修费用,机器也易于掌握,更有利于机器的更新。

电子计算机能够为现代化企业做些什么工作呢?现在以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所生产的电子计算机柯皮斯(COPICS)为例,这种机器,包括十二个子系统,其功用:

(1)设计和生产数据子系统:可以收集产品数据,建立和维护材料表;从事图纸说明;建立零件目录,并做保管发放工作;可以辅助设计和制造工作。

(2)用户订货服务系统:包括合同分析与登记,对能否供应订货负责答复;监督各种合同的执行,提供合同信息。

(3)预测子系统:原始数据的检查和调查,预测模型的选择;预测将来各个时期对产品的需要量;对产品使用寿命的曲线进行长期预测;对使用判断因子进行意外事件的修整。

(4)主生产调度计划子系统:接受预测和合同任务;计算产品负荷;计算设备负荷;模拟计划的执行。

(5)库存资产管理子系统:登记需要量,计算保险库存和订货提前期;决定订货数量,开发订货定单。

(6)制造活动计划子系统:即比主计划较细的作业计划;包括减少在制品,减少和控制生产推前期;制定生产能力需求计划;订货单开发计划;制定工作次序。

(7)开发工作命令子系统:把每份订货单在适当的日期发出,把计划变成行动;检查材料及零件配给车间;发出外购件清单。

(8)工厂监督子系统:接受车间反馈的数据;调整计划,减少、延迟等工时间;制订出勤报告;及时供送原材料;车间凭证管理;定工、派工、生产报告;工资计算。

(9)工厂维护子系统:预防性维修工时定额的制订;自动安排机器设备维修计划;报告维修活动;发放维修命令及计算维修费用。

(10)采购及收料子系统:按质、按量及时

收料, 采购、进货质量检查。

(11) 仓库安排子系统: 根据物料体积、重量、易损性决定存放地点, 减少乱放、乱搬; 提高仓库利用率; 配合填写申请单和自动化仓库协调。

(12) 成本计划及管理子系统: 每种产品应花多少成本, 花了多少成本; 怎样减少差额? 如何规划基建及流动资金, 执行会计任务, 提供计算结果。

采用这样的电子计算机管理企业, 明显地有如下的好处:

第一、统一和减少全厂报表及技术经济数据并保证其完整性, 便于作出正确的决策; 同时编制和调整生产、经营计划快, 易于预测生产成果, 减少盲目生产的风险。

第二、由于电子计算机计算效率高, 使经济数学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 为生产经营提供多方案进行择优比较, 大大减少管理工作的主观主义, 使生产经营活动容易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保证企业管理中解决问题的及时性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整体性。主要原因是收集、整理

信息准确快捷, 预测和决策迅速, 并通过电子计算机计算协调各个方面(包括部门、车间、工序)的关系, 使互相配合与衔接。

第四、不仅大大地节约管理人员, 而且可以大大地减少浪费, 从而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同时, 可保证准时交货, 并为顾客及时提供良好的服务, 从而提高企业的信誉。

系统化管理和数学、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是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广泛采用的现代化管理方法, 而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种管理工具和方法, 也是不可少的。但要用这些现代化管理工具和方法, 就必须在目前打好科学管理的基础, 如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 科学的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 准确、及时和全面的原始记录统计工作, 完善的技术文件和技术经济定额及产品结构数据, 准确的计量工作、库存及在制品情报数据, 健全的生产、工作岗位责任制等等。没有这些基础, 即使采用这些先进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 也难有良好效果。“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现在必须认真做好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



广东省社联举行 庆祝“七一”座谈会

“七一”上午, 省社联所属十九个学会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 在广东迎宾馆宴会厅欢聚一堂, 举行广州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一周年座谈会。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省社会科学事业, 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问题进行座谈。

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社联主席陈越平等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并讲了话。座谈会由省社联常务副主席王致远主持。会议开得热烈、活跃而又严肃认真, 发言的同志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对进一步密切党和学术界的联系, 促进我省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决心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任仲夷同志在讲话中说, 各级党委应当重视社会科学工作。现在, 我国已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历史时期, 有大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回答。因此, 各级党委的领导必须进一步认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切实加强领导。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认识自己任务的重大、艰巨和光荣, 把工作做得更好, 争取出更多的成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三中全会的方针,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不同学派,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应提倡自由讨论, 百家争鸣, 做到不抓辫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任仲夷同志最后强调, 发展社会科学, 必须注重人才。有了人才, 才能出成果, 才能有社会科学的繁荣。现在知识分子, 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遇到不少实际困难。各级党委都要重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帮助他们加以解决。

刘田夫同志在讲话中, 要求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通过各种方式紧密结合起来, 共同努力, 搞出成果, 为四化作出贡献。

陈越平同志在讲话中, 充分肯定了我省社会科学战线近几年所取得的成果和贡献, 并着重阐明了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 以及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战线领导的问题。 (京辑)

实证主义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

罗克汀

坚持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相结合，这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但是，有的同志往往不自觉地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对立起来；在反对简单化、公式化、贴标签、粗暴化等“左”的干扰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忽视甚至背离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例如，在讨论现代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性质或倾向时，有的同志认为把唯心主义哲学看作是“敌对”流派，不过是唯物主义者的一种主观捏造。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列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具有党派性这一基本原理。

我认为，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将会证明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相抗衡。因此，马列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党性的原则并没有过时；坚持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本身是统一的。

本文的意图，是通过分析实证主义运动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的这一侧面来阐明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质。

一

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主要思潮的实证主义运动，产生于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实证主义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实证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法国的A·孔德（1798—1857）；实证主义运动

第二阶段是列宁所批判过的马赫主义，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E·马赫（1838—1916）；实证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它形成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逻辑实证主义的前驱是英国的B·罗素（1872—1970）和奥地利的L·维特根斯坦（1889—1951）。逻辑实证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中被称为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M·石里克（1882—1936）、德国的R·卡尔纳普（1891—1970）和英国的A·J·艾耶尔（1910— ）等人。

实证主义运动，从它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约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它的理论观点比较完备，影响也比较大，始终是现代流派之一。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是环绕着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它的基本观点的。它力图回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明确回答，企图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因此，列宁尖锐地指出，实证主义是“一种讨厌的烂泥”，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①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从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提出了作为实证主义运动基本特征的如下三个观点：

第一，力图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孔德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他称为“最初原因”或“最终原因”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他断言：“我们认为所谓最初原因或最终原因的研究是绝对不能办到，而且是毫无意义的。”②为了达到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目的，孔德扬言他发现了人类智慧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他断言，人类智慧的发展经历着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这是人类智慧的必然出发点。这个阶段“必然是神学的，所有各种思辨都明显地、自然地偏爱各种不能解决的问题，偏爱根本上不能达到的各种最后的研究……总之是偏爱各种绝对知识。”^⑤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它是神学阶段的改头换面，因为“形而上学阶段……占统治地位的各种思辨，仍然习惯保持倾向于认识绝对这个主要特点……应用各种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并经常把它们称为本体论。”^④到了形而上学阶段的最后阶段“各种等级从属关系的实体便特殊化，而被唯一的实体——自然所代替。”^⑤第三个阶段是所谓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在这阶段“人类精神承认不可能获得绝对概念，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终点，也不再去认识现象的原因，而只是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去发现它们的实际规律，也就是去发现这些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⑥

上述可见，孔德的批评是针对认为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的唯物主义哲学派别的。他把唯物主义看作是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即人类智慧不成熟阶段的产物，而同作为人类智慧发展成熟阶段的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相对立，这样一来，唯物主义便变成是反科学的一种虚构或抽象了。由此可见，孔德确实是把唯物主义看做是与实证哲学相“敌对”的一种反科学思潮。科学与反科学的根本对立，便表现为实证哲学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敌对”存在的两个基本哲学派别，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毕竟是历史的真实，而并不是唯物主义者的虚构。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集中表现在“反对形而上学”这一个基本口号中。孔德认为由于形而上学的反科学性，因此，当实证哲学一发生影响，形而上学便要消灭。他说：“没有一个可观察的现象会超出天文、物理、化学、生理、社会这五大类现象之外。当我们的全部基本观念成为一致的时候，哲学就将达到实证的阶段，它的性质将永久不变。”^⑦这样，实证主义哲学完成之日，也就是形而上学，特别是唯物主义消灭之时。不过，为了要取得超出两个哲学基本派别的外观，孔德也“貌似公允”地把以精神、意识作为世界本体的唯心主义哲学列入形而上学之内，避免公开地给哲学基本问题以唯心主义的解答。然而，孔德力图把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类社会历史、哲学史归结为人类智慧发展史，即所谓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彼此交替的发展史，这正是一种把精神看作是世界、历史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其次，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把人类智慧发展史归结为所谓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归结为科学战胜、代替形而上学的历史，并用来否定和代替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这种歪曲哲学史上真实图景的主观虚构，也应当说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具体表现。最后，孔德的实证主义否认识识具有任何绝对性。他说：“现象的研究，决不能变成绝对的东西，而总是把它看成是相对于我们的机体和地位的东西。”^⑧他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在认识论上也正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第三，孔德在把科学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之后，便以实证主义代表科学的资格宣称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实际上这是以否定作为世界观的哲理科学的独立存在的方法来否定哲学基本问题。这一观点也是环绕着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但也应当指出，这种观点出现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是有它的阶级根源和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的根源的。从阶级根源来看，实证主义运动的形成反映了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集团利益的七月王朝，法国资产阶级日益走向保守的历史实际。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最初的三十年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唯心主义受到了重大冲击，不得不寻求用新的理论形式、理论观点来代替某些旧的理论形式和观点。我们知道，实证主义运动从思想、理论来源上说，是渊源于贝克莱（英，1684—1753）和休谟（英1711—1776）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特别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但是也有更新。这是哲学史上哲学思潮发展的相对独立规律的体现。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思潮都形成于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自然科学发展的相对停滞时期（1690—1760）。因此，贝克莱和休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贬损自然科学的倾向，看不清楚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唯心主义理论基础的冲击和威胁。贝克莱不但公开地、直率地从唯心主义观点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而且公开抬出一个“上帝”来同自然科学相对抗。因此，列宁说他“直爽地议论，愚蠢地议论”^⑨。到了休谟主要著作出现的年代，西欧自然科学发展的相对停滞时期已接

近尾声。特别是十八世纪法国在数学上取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象欧勒(1707—1783)、达朗贝尔(1717—1783)、拉格朗日(1736—1813)这样一些卓越的数学家。在这种科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休谟觉察到贝克莱公开地、直率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并同自然科学相冲突是不明智的。因此,休谟便对贝克莱的哲学理论形式、理论观点实行更新。一是以走“第三条哲学路线”的不可知论来回避公开地、直率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二是在把自然科学贬损为不具备必然性和普遍性品格的知识的同时,避免公开肯定“上帝”的存在而同自然科学相冲突。三是顺应数学发展史的潮流,肯定数学为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品格的知识。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继承了休谟的不可知论走第三条哲学路线的思想,但也有更新。它是从人类智慧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人类智慧无力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来从根本上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从自然科学史上看,十九世纪的最初三十年,自然科学取得了齐头并进的迅猛发展,许多科学部门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化学,1808年出现了杜尔顿的原子论;生物学,1809年出现了拉马克的进化学说;有机化学(维勒)、电化学(法拉第)和地质学(赖尔)等科学部门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要求唯心主义不但不能同它相冲突,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对贝克莱和休谟的唯心主义理论形式、理论观点进行更新。实证主义运动出现后,“大受欢迎”。穆勒(1806—1873)把孔德吹捧为是“欧洲思想家占首位的思想家”。这正说明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出现是顺应自然科学史发展潮流的。

正因为十九世纪早期自然科学具有齐头并进的迅猛发展势头,因此,孔德才以自然科学代言人的资格宣布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哲学,并且在哲学体系上,采取把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等综合为一个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结构。

从上面分析可知,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观点都是环绕着哲学基本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它力图取得超出于两个哲学基本派别的外观,而用不可知论、反对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哲学、从自然科学来讲哲学的观点来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此可见,实证主义运动从第一阶段起就是具有明显的党派性的。

马赫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阶级根源来看是由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要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加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宣传。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来看,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物理学处于领先地位,与物理学发展密切相关联的数学也有重大发展。实证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发展来讲哲学的。但是,以斯宾塞(英,1820—1903)为代表人物的实证主义,忽视了物理学,背离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把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来讲哲学的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哲学,更新为从物理学方面来讲哲学的马赫主义,应当说是顺应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潮流的。

马赫主义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有继承,也有更新。

第一,马赫继承了孔德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思想;但更新了孔德过于露骨、不够明智的具体论点,办法是依据物理学的发展,提出“要素”(感觉)可以消除物理和心理的区别,从而取得超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从物理学方面来讲哲学的外观。即用“要素”论来走第三条哲学路线,而在“要素”(感觉)这一字眼底下宣扬感觉是唯一的实在的主观唯心主义。因此,马赫把感觉、经验看作是科学的基础。他说:“科学的职能,按照我们的意见,就是代替经验。这样一方面,科学必须停留在经验范围之内,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超出经验之外,经常地期待着证实,经常地期待着反驳……科学是在不完备的经验范围之内活动的,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活动。”^⑩

第二,马赫也继承了孔德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提出了“取消形而上学”的口号;但在具体内容、论点上也有更新。马赫从“要素”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在中立性的“要素”的基础上消除心物的对立,把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统一起来,从而把物理学和心理学统一起来。然后又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两端,把各种经验科学统一起来,从而达到科学统一,即各门科学都统一于以“要素”为基础的统一科学图景中。马赫进而认为科学统一是达到“思维经济”的手段,而思维经济则

是科学目的的组成部分。他说：“科学的目的是用思维中对事实的模写和预测来代替经验或节省经验”。①我们思维中的“模写永远是一些抽象。这里又有经济的倾向”。②这样，在马赫看来，取消形而上学和科学统一便变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了。如果不把所谓“形而上学”取消便不能把“要素”（感觉）作为世界和科学的基础。因为马赫主义的所谓形而上学是指承认有超感觉、经验的客观物质实在而言的。科学的统一以取消形而上学为前提。因此，当马赫论述到《力学的发展》一书的基本倾向时，他说：“这本书的倾向是说明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反形而上学的”。③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二版序言中又说：“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必须取消，因为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计划”。④由上面述评可见：马赫对孔德的观点的更新就在于着重从科学的统一，即思维的经济这一角度来讲“取消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当弗兰克认为“马赫的主要倾向可以用‘科学的统一’（即经济的表现）和‘取消形而上学’的口号描述出来”⑤的时候，他是如实地表达了在马赫主义中，这两个口号之间的密切联系的。

第三，在从自然科学本身来讲哲学这一问题上，马赫主义也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但也有更新。这主要表现在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的特征不同，马赫着重从物理学出发来讲知觉生理学的并进而讲“要素”论，更进而讲科学的统一和思维的经济，这就给人们以顺应着以物理学为先导学科的当时自然科学史发展潮流的外观。马赫在他的著作《感觉的分析》一书的第一章《反对形而上学的前言》中就是力图从物理学的进展来讲知觉生理学的。他说：“物理学的研究，在过去几百年间，不仅在自己的领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它的帮助，在其他各种科学的范围内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物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无论在哪里都是先进的，应用这些观点和方法是有极大的成功希望的。……知觉生理学如果不拒绝物理学的支持，不但可以促进自身的进展，而且可以对物理学本身提供有力的帮助。”⑥着重从物理学来宣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就是马赫对孔德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更新。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马赫主义对孔德的实证主义，有继承，也有更新。但两者同样具有党派性，这是一脉相承的。

逻辑实证主义形成和发展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这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从阶级根源上来看，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马赫主义由于受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受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以及来自符合于自然科学史发展潮流的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理论（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批评，便逐步衰落，走向死胡同。另一方面，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方面看，大约在二十世纪初，数理逻辑由于物理学和数学的迅速发展的推动出现了一幅大步前进的图景。皮阿诺（意，1858—1932）和弗雷格（德，1848—1925）的卓越工作，奠定了数理逻辑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基础。数理逻辑的建立反过来又大大地推动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更加重视思维、范畴、概念在科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并逐渐成为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潮流。轻视逻辑、思维、概念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吸收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顽固地坚持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所有这些都成为马赫主义的突出缺点，也是同数理逻辑发展的历史潮流背离的。因此，从实证主义运动本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来看，即从继承性与更新性的规律来看，对马赫主义的继承和更新，建立新的理论形式、理论观点，就成为一种迫切要求了。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唯心主义思潮出现的。

逻辑实证主义也是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取消形而上学、从自然科学本身来讲哲学这三个基本观点，但也有更新。

第一，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马赫主义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思想。但是它利用了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从逻辑、语言方面来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在维也纳派看来，哲学基本问题连同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范畴、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如艾耶尔认为只有当一个命题具有字义上的意义时才是可证实的，在逻辑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有两类命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所谓分析命题，是由这个命题包含着的符号的意义就可以

确定它的有效性，因此，它的有效性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逻辑必然性与普遍性的品格。逻辑和数学就是属于分析的知识。艾耶尔举例说：“某一种蚂蚁或者是寄生的或者不是寄生的”，这一命题是由符号的意义而确定其具有必然的有效性，因此是一个分析命题。所谓综合命题也就是关于经验或事实的命题，因此，这样一类命题必须有可证实性，即可以在经验中得到肯定或否定的证实。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在内的一般经验科学就属于这一类知识。经验知识一方面由于会被将来所揭露出来的新经验所修正，另一方面又由于证实某一经验命题时的经验本身还要另一经验来证实；这样类推以至无穷。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经验科学知识只能具有或然性的品格，而不可能具有必然性的品格。此外，还有一类“形而上学”的假命题。它是一种在逻辑上不能理解，别人听不懂，在经验上不能证实的无意义的空洞理论。卡尔纳普断言这样一类命题不过是类似于一种“啊”、“啊”的呼喊声，它只是表达某种感情，它“不具有判断的意义，不具有理论的意义，它不包含知识”。^①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如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世界的本体是精神之类的命题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假命题。由于这类命题承认有超越现象的实体，因此，它们是不能证实的，因而不是经验的命题。命题的意义在于它的证实方法，这一类命题由于不能证实，而又不是分析命题（因为它们不是逻辑或数学），因而没有意义的。从上面分析可知：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基本问题连同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范畴（如物质、本质、实在等等）都当作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加以否定。这样，我们能够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不是同唯物主义相“敌对”的哲学派别吗？能够说它没有党派性吗？

第二，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马赫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但也有更新。马赫主义是通过科学统一的观点来讲反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则是通过论述怎样巩固科学的基础来讲反对形而上学的。

早在1926年，维也纳小组便提出：哲学的目的：第一，是为科学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指出一切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如果有“形而上学”的假命题混杂于一门经验科学当中，这样科学的基础便不巩固、不坚

实。要使科学的基础巩固、坚实就必须使经验科学中的命题全部是由有意义的科学命题构成的。也就是必须把“形而上学”的假命题从经验科学中清除出去。清除形而上学命题是手段，使科学具有坚实的基础是目的，这两者是密切结合起来的。因此，逻辑实证主义从为科学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一要求出发，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并力图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把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假命题排除出去，从而达到为科学提供坚实基础的目的。通过上面的述评我们可知，为科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只是一种手法，目的实际上主要是在于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唯物主义，宣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第三，在从自然科学本身来讲哲学这个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也是继承了马赫主义的基本思想的，但是也有更新。这表现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但从物理学方面，而且也从数理逻辑方面来讲哲学。这是顺应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潮流的。还必须指出，当时的美国，实用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占有优势地位。但由于背离了自然科学史发展的历史潮流；不从物理学和数理逻辑方面，而只是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来讲哲学；因此，三十年代以后，其优势地位也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当然，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逻辑实证主义在本质上也是存在着根本缺陷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但由于坚持分析命题的观点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而且也由于坚持综合命题的观点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死胡同。作为逻辑实证主义陷入形式主义死胡同的反动，结果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存在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大发展。作为逻辑实证主义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的反动，是六十年代以后，以法国为中心，结构主义大发展。这些都使逻辑实证主义受到了重大冲击。

在上面我们概述、分析了实证主义运动发展的简史；三个阶段都是环绕着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各个阶段的基本论点的。在各个基本阶段之间既有继承性又有更新性。这体现了实证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独立规律性。而整个实证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地贯串着党派性的。这充分证明了列宁的如下论述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工作中的指针：“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

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⑩

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版本下同），第二卷第347页。

②孔德：《实证哲学教程》，法国加尼埃出版社编印，一卷本，法文版（版本下同），第27页。

③引同②书，第210—211页。

④引同②书，第226—227页。

⑤引同②书，第229页。

⑥引同②书，第8页。

⑦引同②书，第47页。

⑧引同②书，第241页。

⑨引同①书，第22页。

⑩马赫：《力学的发展》见1960年芝加哥，英文版（版本下同），第4章第2节。参考《西方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964年商务版，第46页。

⑪引同⑩书，参考同上书第41—42页。

⑫引同⑩书，参考同上书第43—44页。

⑬见P·弗兰克：《物理学与哲学之间》，194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版本下同），第215页。

⑭引同⑬书，参考《感觉的分析》商务版中译本第4页。

⑮引同⑬书，第216页。

⑯马赫：《感觉的分析》，第1章《反对形而上学的前言》，参考《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论著选辑》，第33页。

⑰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语法》，（1953），参考：《分析的时代》，1964年商务版，中译本第227—228页。

⑱引同①书，第365页。



兮

董志翹

《汉书·高帝纪》：“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按，《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司马贞索隐：“侯，语辞也，兮亦语辞，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即大风歌。”索隐说甚是。古时，“兮”“侯”当音同。《说文》：“兮，语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丂也。”段注：“胡鸡切，十六部。”十六部即“支”部。“支”“侯”两部乃旁对转关系。“兮”“侯”同属“匣”纽，为双声字，故“兮”“侯”可通。

《尚书》大传：“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仇。”而《史记·宋世家》作：“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可见，“不与我好仇”即“不与我好兮”。均与“油”韵。故“兮”当读“侯”声明矣。

又《增韵》：“兮，歌辞也。兮通作猗。”故《书·秦誓》：“断断猗。”《大学》引为“断断兮。”《说文》段注亦云：“有假猗为兮者，如诗‘河水清且涟猗’是也。”猗，《说文》：“从犬，奇声。”而“奇”又从“可”得声，亦与“侯”声近。《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猗”叶“于何切”，与“磋”、“磨”为韵。亦可证“兮”同“猗”声近于“侯”。

学 习 《实 践 论》

艾思奇（遗作）

说 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艾思奇同志先后在中央高级党校内部和校外许多单位，作过多次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这个稿子，是依据他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去中国文联、解放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海军正师级以上青岛学习班等单位的报告速记稿整理而成。我们整理的原则，是把几个稿子作综合比较，吸收各个稿子中好的东西，删去一些明显不合适或重复的段落，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不增加任何观点，力求保持原稿面目，反映出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观点。艾思奇同志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讲的，对于建国以来某些历史问题的解释，当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为准。艾思奇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很有见解的，但也只是他个人的体会。现在发表出来，仅供读者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参考。限于我们的水平，整理中难免有不当之处，诚挚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两篇文章写的时间不同，性质相同。

一、两条认识路线

这两篇文章都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政治有路线，认识也有路线。一定的认识路线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是联系着的。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政治路线的分歧，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说来，就在于认识路线的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科学的认识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是与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问题。《实践论》是毛主席在1937年写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十六年。《实践论》是对十六年来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认识论斗争的总结，是两条

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实践论》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又一次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民主革命时期，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再一次肯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我们学习这两篇著作，就是要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认识事物、做工作，要按这一条路线来处理，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走到唯心主义方面去。

讲《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就是要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了解这种认识路线，努力学会掌握这种认识路线。

在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之前，先简单说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什么区别，界限在哪里呢？

一般唯物主义在认识上都承认反映论，即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承认这一点。唯心主义否认、反对反映论。

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物质通过感觉变成思想。这就是物质变精神。先有物质，而后才有精神；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本二三十万字的书，就是反复讲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当时斗争的需要。那时，主观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很多人都糊涂了，所以，列宁写了这本书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心主义则相反，否认反映论，否认认识是客观的反映。认识从那里来的？毛主席有两句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这就是指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天降派”，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认识是脑子里生来就有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什么叫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有的，不过这个客观世界是精神的（是个大精神），不是物质的。这个精神有的叫上帝，或者是神；有的就叫世界精神。这一派的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是由世界精神的启发而得到的。这种思想和宗教迷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客观世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主观精神。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批判这种哲学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和这两派斗，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就把哲学史概括了。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有它的弱点，是不够科学的。从前的唯物主义有一种叫做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者叫做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反辩证法，免不了在这一个问题上或那一个问题上，变成唯心主义，所以与唯心主义斗争就没有力量，常常被唯心主义打败。以前的唯物主义，除形而上学缺陷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弱点是不懂实践。它们承认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

则——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是客观的反映、精神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承认反映这一点，它是正确的，是和唯心主义相反的。唯心主义不承认物质世界，因此也就不承认人的思想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过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而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唯物主义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它不了解人的主观反映客观需要通过实践。以前的唯物论根本不了解实践的作用、实践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路线。《实践论》就是在认识上坚持唯物主义路线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斯大林都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所谓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反映论——人的认识一定要反映客观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所反对的唯心主义，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都读过《毛泽东选集》，从哲学的眼光来看，每一篇文章都是坚持反映论。有时实际上坚持，不说出来；有时直接说出来：反对主观主义。比如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坚持反映论——正确反映敌我关系。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开宗明义就要分清敌友，反对陈独秀敌友不分的唯心主义（可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以后，革命每到一一个关头就直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的路线，就是客观第一，主观第二，主观是客观的反映。都是反映论，这一点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共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同以前的唯物主义又有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两篇著作，深刻透彻地阐明了这个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两篇著作中，许多关键的原则都是长期经验的总结。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这个根本原则，一方面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概括、新的发展。根本原则没有变，但有许多新东西。这同我们丰富的革命经验是分不开的。这些著作不是提起笔蘸一点墨就写出来的，而是千百万工人、农民、革命先烈流血流汗写成的活的历史。毛主席把这些活的历史写成文章，才有这两篇哲学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这样来的。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我们的革命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二、认识依赖于实践

实践的观点，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来说，是第一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其他唯物论不同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在唯物论里加上实践的观点，以实践的观点作为根本的观点。其他任何一种唯物论都不讲实践，都跟实践脱离，都是离开实践讲唯物主义。离开实践讲唯物主义，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甚

至只要对实践轻描淡写，不强调实践，这也会离开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因为“实践”这个名词几千年来就有，但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这个名词有自己的定义。中国在封建社会就有“实践”这个词，意思就是按照某种道德标准来行动。一般使用这个名词都是认为按照某些思想为指导来行动，或者把某种思想付诸行动叫实践，有时候资产阶级把个人冒险也叫实践。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讲“实践”这两个字，主要是讲个人活动、个人奋斗。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者，所以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用“实践”这个词，在《实践论》可以看出来，不是按封建道德标准行动，也不是搞什么个人活动，而是指社会实践。文章一开头就讲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当然也有个人的活动，但它是社会性的，因为任何人的行动都是社会性的，纯粹的个人活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的活动都带有社会性，所以实践是社会实践。

所谓实践，就是社会实践、人的社会活动。广义的实践就是社会活动。人是通过社会活动来认识世界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决定人的本质、人的一切。为什么说人有社会性？人的认识有社会性，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特点是由自然决定的，自然生就的。老虎，自然界生就它有很尖锐的爪牙，生就它有很强大的胃，能消化大量的肉，它的特点是吃肉，是食肉兽。但是人的特点不是由自然来决定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人在社会关系中间所处的地位不同，它的本性也就不同。阶级社会中有不同的阶级，它的社会地位不同，阶级地位不同，它的本性就不同。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本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本性。本性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自然界来的，不是从母胎里带来的，而是在进入社会以后，在社会的影响下得来的，是在社会实践当中、在社会活动当中，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和特点，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认识也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同，认识也会不同。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认识问题，便不了解人的社会地位能使人的认识发生区别，好象任何人的认识都是一样的，不会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有区别，不会因为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不同。抽象的人性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认为人人都是一样的，认识也是一样的，感情也是一样的。事实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抽象的人性。资产阶级的文艺总想表现抽象的人性，实际上，抽象的人性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般的人性，只有阶级性。

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分不开，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社会性，人的认识也就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马列主义的认识论，首先就指出人是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的，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来认识世界。所以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所谓不同地位，有先进的地位，有落后、反动的地位，通常是站在先进地位的人比较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要注意这个特点：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毛主席的著作，题目就叫《实践论》。

我想联系文艺上的问题也稍微提一下。文艺可不可以说也是一种认识？提出这个意见，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个人认为，文艺是一种认识，文艺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从哲学上看，就是一种认识。不过文艺和科学理论不同，不是根本实质不同，而是形式不同。科学是用理论，用概念、判断、推理，用逻辑系统来认识世界。文艺则是用形象来认识世界，是用从人民生活中间提炼出来的典型的形象来认识世界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文艺也是一种认识，只是形式和科学不同。既然是一种认识，所以也要通过实践来认识，也就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来认识。

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立场不同。社会地位就是实践立场，立场不同，对生活的认识就会不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他所注意的典型也不会相同的。为什么以前的那些文艺作品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因为作者都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使他们感兴趣的典型就是这些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也有他们的典型人物。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与西方古典资产阶级文学不同。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有个人主义的典型，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也是个人主义典型多。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是腐朽透顶了，所以他们在文艺中有兴趣的人物、典型，是杀人犯，强盗，海淫海盗。有的典型象疯子一样，英国的“硬壳虫”音乐，那典型不是疯子么？那是资产阶级没落的疯狂。我在一个影片上看到一个法国的现代芭蕾舞，从动作上看起来，人就象木偶，动作象机械，脸上毫无表情，就象是僵尸在跳舞。选择什么样的典型就表现作家的认识立场，文艺作家的认识是由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来决定的，所以，改造作者自己的实践立场是改造文艺的根本环节。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科学上，如果没有正确的概念，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文艺上，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典型，就不能有好的作品；如果不能正确的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阶级的典型，也不可能有反映我们时代的好的作品，就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文艺。

有一个临时提出的问题，先简单说明一下。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为什么高于认识？实践高于认识，主要是讲理性认识，这是把实践与理论比较起来讲的。理论有普遍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普遍应用，因为理论是反映规律的，凡是规律就带有普遍性。而理论是反映规律的，所以理论总是有普遍性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就叫实践。实践为什么高于理论？首先因为它有理论的普遍性，理论的普遍性都拿到行动当中去贯彻，所以实践本身就有理论本身所有的普遍性，但是在实践当中，又把理论变成现实。理论本身是没有现实性的，理论只书上写一写，脑子里想一想，比较抽象，实践就把抽象的东西，变成活的现实的，所以就有现实性。这个意思是说，实践比理论更确实，理论究竟对不对，终归要到实践中具体解决。比如实践可以创造典型经验，典型经验就比理论原则更具体，但是又表现了理论。实践里可以创造典型经验，理论本身

就只能原则。这是两者的区别，这区别也就说明高低有所不同。所以由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飞跃，向更高一级飞跃。实践又要产生理论，要证明理论，要再飞跃到实践。这一句话跟另一句话是一个意思，“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就是强调实践第一，强调实践的观点。

不了解实践观点，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不讲实践观点，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脱离了实践，就等于没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讲到实践，但讲得很简要。列宁的著作里发挥了关于实践的思想，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也讲得较少。毛主席就专用《实践论》作题目，突出了实践观点，深入系统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在《实践论》出版以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出这么一篇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系统的文章

强调认识依赖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特点。要正确处理认识，使认识走在正确的路线上，就要注意认识与实践的结合。这个问题跟主观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跟主观主义认识路线、旧唯物论是针锋相对的。旧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变成了主观主义。毛主席总结了多年的经验，简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作里，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有两种答复，一种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答复：是从天上来的，或是脑子里生就的。毛主席否定了这样的答复，提出了另外一个答复，人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大家不要看这话简单，这是概括了、总结了多年的经验，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根本的东西，既深刻又明瞭地指出来了。这好象很容易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做起来，往往很容易离开了这个原则，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毛主席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认识上，首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来的，或脑子里生出来的；还是从实践中来的？有一种人就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来的。大家也许觉得奇怪，共产党中还有这样的人？明白地这样讲，好象没有，从前陈独秀、王明没有公开讲，但实际上有人这样做。怎样来理解呢？天上本来不会掉下东西来，古代有人说掉下天书来，那是古代，现在没有这种人。但有这样一些人，他把某一个地方当做天堂，那里有他心目中的上帝；或者是历史上某一个时代有他的天堂、上帝。还有一种人，就是认为认识是脑子里生就的，做工作也不调查研究，凭自己脑子乱想，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过去我国革命历史上凡是机会主义，你研究它的认识路线，不外这两种：或者莫斯科来的，或是他自己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或是两种混合的。

毛主席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实践规定得很具体，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这个贡献，不是字面上的贡献，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过去

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观主义者虽有“左倾”、右倾的不同，但其共同特点，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认识脱离实践，是德波林主义，德波林思想。德波林在中国不是没有影响的。王明等人认为认识不是从实践中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轻视毛主席在农村创造的经验，瞧不起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挖苦这种经验，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说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左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都有这种特点，脱离群众，脱离广大群众的实践，自己也不深入阶级斗争实践。陈独秀从前根本不参加农村的斗争，住在城里；王明主要是在莫斯科，到国内苏区时间很短。

毛主席提出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来，这一点，在今天更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要使认识得到正确方向，就一定要参加实践，参加实践就是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实践”这个词涵义很广，包括一切社会活动，但不是一切社会活动都能得到正确认识，只有参加革命实践才能得到正确认识。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工农兵的活动，参加生产、阶级斗争，因此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只能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掌握。每一个时代，凡是比较先进的认识，都是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的人掌握。每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较好的，一般的讲，都是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才能创作出来。个别的例外是有的，哲学上也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一点，就是：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这个原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历史实践的总结。自从有人类以来，知识和生产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任何一个民族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和这个民族生产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比如，对天文的知识表现在历法上，不同的生产水平，就有不同水平的天文知识。比如游牧民族的历法和农业民族的历法就不一样。我们汉族是农业民族，所以从商朝起就是按照太阳的运动来计算年月日和二十四个节气。这个历法对农业有帮助，哪个节气该种什么东西很方便。游牧民族就不一样，他们不大重视太阳运动的规律，比如西藏的历法就不是太阳历，而是按月亮计算的，月亮圆一次就是一个月，圆十二次就是一年。所以，那个历法的新年没有一定的时候，有时在冬天，有时在夏天。维吾尔族历也是一样。这是说的古代天文。数学也是从生产斗争中来的，那是几千年、几万年的总结。这都证明自然知识首先发源于生产，是总结生产经验的结果。社会知识，一方面是从生产来的，一方面是从阶级斗争来的。在阶级社会里，革命的阶级对社会的认识，从来都比反动阶级的认识更正确一些。在统治阶级内又有不同的派别经常打架，有比较进步的，有比较反动的。进步一点的派别认识比较全面，反动腐朽的那一派思想必然是荒谬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就比封建地主阶级的认识要正确，眼界要宽些。所以，人的认识受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总是有一定的偏见，所以，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社会科学从来没有很好建立，没有一个系统的社会历史知识，只有对社会的某些问题有正确的观点。因为无产阶级出现以前，掌握知识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奴隶的文化太低，没有条件总结经验。剥削阶级因为专门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可以总结一些

自然经验、社会经验，可是他们是依靠剥削阶级的，是为它辩护的，所以从来没有全面的社会知识，没有一个象样的社会科学体系。十九世纪末，英国的经济学比较接近社会科学，但也不完全科学。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只有到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才有。无产阶级从事大生产，眼界很宽，他们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社会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能够创立社会科学，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所以，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要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搞阶级斗争。出身有一些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决定的东西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保证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毛主席不管在哪一篇文章里，绝不一般地讲实践保证我们正确认识，而是讲要保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剥削阶级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又不参加生产劳动，所以他們要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是很困难的。自然科学可以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实验室里搞；同时，由于剥削阶级本身的需要，他们可以掌握自然规律，比如美国帝国主义就可以掌握原子能等很多尖端科学知识。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资产阶级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来总结生产经验，进行科学试验，所以，他们也能搞改造自然的斗争，不过也受一定的限制。我们以前要搞民主革命，自然知识对我们的需要不是太大，当然战争也需要现代化的自然知识。但那时需要最大、最迫切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同了，我们在生产上、科学技术上，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自然知识的需要比过去大得多，因此参加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革命实践，当然阶级斗争是我们向来坚持的革命实践。

在《实践论》里，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特点，就是阶级性和实践性。阶级性就是党性，实践性就是革命性，而党性和革命性又是一个东西。

实践有两种，有革命的实践，也有反革命的实践。反动派的行动也可以说是实践，因为这也是阶级斗争，但那是反革命的实践。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从革命实践中来。革命的实践有两种：一种是对自然的革命，就是生产、自然科学的实验；另一种是对社会的革命，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阶级斗争。这里就有个立场问题。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有分析的，讲阶级斗争是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实践。从历史上看，剥削阶级是有偏见的。因此，剥削阶级不能帮助我们对社会取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有可能对社会取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在今天来说，我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参加革命实践才能做到。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思想在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充分发展了、具体化了，把这种思想变成实际工作中的武器；我们学习《实践论》，就要学会掌握这个武器。

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这个问题更清楚地说明了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个问题，在马克

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了一句话：人的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181页）列宁说了这句话，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把这句话写了一篇文章，具体地告诉我们如何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文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虽然讲的很简单，但有新的发展。

认识是从实践来的，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但是，认识怎样从实践来？认识怎样依赖于实践？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就是辩证关系，就是互相转化的关系。实践转化为认识，变为认识；认识又转化为实践，又变为实践。这就叫做互相转化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是两个飞跃的关系：就是由实践向认识飞跃，这是第一个飞跃；然后又由认识向实践飞跃，这是第二个飞跃。互相转化是由两个飞跃构成的。这个思想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文章中，又有了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加了一点东西，除由实践变为认识，由认识变为实践外，又加了两点：由物质变为精神，由精神变为物质；由存在变为思维，由思维变为存在。实际上，这种提法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从另外两个方面，把《实践论》里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展了。事情是一个事情，但是提法又从新的角度上展开了。为什么要有这种发展？为什么要进一步从另两个方面再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这不仅是字面上的问题，不仅是话多讲两句的问题，而是概括了一些新的经验、新的问题，从实践问题一直到理论问题。

我们讲的两个飞跃，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都是能动飞跃。《实践论》上有两句话：“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能动”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平常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包括这两个方面。人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能动和被动消极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叫做“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了这个名词。这个提法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这样提过。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叫反映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唯物论有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论没有注意到认识的能动性，他们不知道有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了解这一点的，但是没有使用这个名词，实际上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明确地用了这个名词。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是名词问题，但这是一个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突出地明确地指出了。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有能动性，他们总以为人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外界的东西，象镜子一样。镜子反映周围的东西，只能反映表面，有什么反映什么，是消极的，它自己对外界的东西不能有创造性。照相也是这样，有什么现象就照出什么现象，反映表面的现象。人类的认识不那样简单，不象镜子、照相机把表

面的东西反映就完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完全用镜子、照相机来做比方。但是从前的唯物论是这样了解的，认为人的主观象一面镜子。外国哲学家认为人的心象一张白纸一样，外界有什么影响，白纸上就有什么反映。事实上，人的认识不是这样简单。人的认识是能动地反映客观的，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所谓能动的飞跃，就是人的主观不是简单地把表面现象反映进来，不是看到什么反映什么。人的思想有一种能力，能动地把假象、不重要的东西丢掉，把本质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抓住。现象不一定暴露本质。我们眼睛看到的東西，耳朵听到的东西，是不是事实？不一定，有的是事实，又可能是表面的事实，不一定是本质。本质是靠感性认识抓不到的。在感性认识中，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真的假的都有，有一些现象就是不能反映本质。

讲一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能不能互相转化的问题，有没有存在变思维、思维变存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的问题。肯定思维和存在有这种相互转化关系的，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主张有同一性的人，就是承认有互相转化关系，因为同一性就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意思。辩证法讲同一性，不是讲两个东西完全一样，而是讲两个东西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承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要肯定思维与存在能够互相转化，肯定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思维和存在有这种同一性，有互相转化的关系。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在这理论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要不要承认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主义建设里，要不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要不要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客观规律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认识要反映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忽视客观规律，问题是我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就要充分利用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我们的认识变成行动、变成物质。这一点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更重要的。

一切革命斗争，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从前的社会，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封建社会中，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人脑子里先想到过有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先认识了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资本主义制度。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在封建社会中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这样子，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自发地产生，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国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广大的干部、群众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如果自觉性削弱了，如果一个国家无产阶级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放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放松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面的经济还可能回到资本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间，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应该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有一个发展的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篇幅虽短，但概括了重要的经验，回答了重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实践论》，研究毛主席关于实践的两篇哲学著作，要着重了解两个飞跃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两个飞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实践论》分三个部分讲，但其中的核心，就是两个飞跃问题。毛主席在这本著作中写得最多的，用篇幅最多的，也是两个飞跃问题。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变认识，实践向认识的飞跃，同时就是物质变精神、存在变思维的飞跃。飞跃的过程主要就是这样的内容：通过实践，对我们来讲，就是通过革命实践，通过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首先由我们的感觉器官对物质世界、客观世界，取得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直接由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五官得到的。

毛主席解释说，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睁开眼睛看一看，用耳朵去听一听，用鼻子嗅一嗅，用舌尝一尝，用自己的皮肤接触一下，认识必须首先通过五官得来的。通过五官，在实践当中，直接得到一些关于外界物质存在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并没有实现飞跃。感性认识只是初步的认识，要实现实践到认识的飞跃，就需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第一个飞跃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为什么感性认识不能算是实现的飞跃？其原因，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感性认识只能给我们对外界的表面的认识、局部的认识。感性认识有时是一些假象，有时感性认识是会骗我们的，因为它是表面的、局部的。单凭感性认识，对事情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比如我们参加革命斗争，最初的时候，革命力量总是比较小，总要碰到困难，甚至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单凭感性认识，不可能认识到敌人是一定要垮的，革命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单凭感性认识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甚至在感觉方面，还感觉到革命势力是站不住脚的。凡是在最艰苦的情况里，参加革命的人，会有这种感觉的。年轻一点的同志，就没有这种经验。年老一点的同志，参加过与反动派斗争的人，会有这种经验的。抗日战争，1941年最黑暗的时候，从感觉上看不出是可以胜利的。还有原子弹，单凭感觉来看，不能看出它是纸老虎。你看它那影片，原子弹爆炸之后，破坏力很大么！凭感觉来判断，你就不能说它是纸老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原子弹作出纸老虎的结论，单凭感性认识是不行的，那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有的同志问：经验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没有总结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经过总结的经验是理性认识。我们讲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就是经过总结了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总结了的经验，是理性认识。我们一般所讲的经验还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中有没有包含理性认识？有时候是交错的。我们平常做工作取得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但是我们工作中也有理性认识，因为我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来做工作的。所以，我们的经验当中包含了一些理性认识。事实上，纯粹的感性认识是没有的。我们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分开，是为了把这些关系弄清楚。要承认我们的经验基本上

是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总结才能变成理性认识。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最重要的内容，最根本的规律准确地找出来。

有的同志问，错误的认识算不算飞跃？我说错误的认识也可以说是飞跃的一种结果。错误有部分的错误，有完全的错误，有主要部分错误，有次要部分错误，所以错误的认识也是第一个飞跃的一种产物。不过，错误的认识没有完成飞跃的任务，没有实现飞跃的目的。第一个飞跃是要取得正确认识，可是，有时可能不正确。不正确的认识来源有种种，来源之一就是立场根本不对，那就会产生根本错误的认识。如果立场是对的，你也可能会出错误，这种错误有种种原因，或者是材料掌握的不够就作结论，或者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没有完全弄清楚等，但可以保证不犯根本的错误，可以保证会逐渐取得正确的认识。

我们研究认识论，要研究怎样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不要单凭一些片面的、表面的感觉，就对问题下结论，要避免这一点。学第一个飞跃，就要学会解决这个问题，要懂得实践变认识，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就达到了物质变精神，存在变思维。怎样才能实现这个飞跃？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讲得很清楚，主要的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不要抓住很少一点材料，就来分析问题。第二就是在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以后，对这些丰富的材料还要进行加工改造。所谓“加工改造”，毛主席指出了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四句话。 （下期待续）



关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问题

邓 超

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因而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还引经据典，说我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上述这种看法根本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反映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并没有违反一般规律，而是一般规律的具体体现，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合乎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要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就要正确认识 and 解决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特殊性的若干问题。本文试围绕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怎样看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是分析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特殊性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归根到底，要看在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认为我国现在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我国的生产力落后，不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如果断言是社会主义，就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忘掉了生产力的作用，而是仅仅以生产关系作为划分我国社会历史阶段的依据。这种看法还认为，只有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论述

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充分，有条件建立单一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是对经典著作和社会生产力问题的片面的、机械的理解。

我们知道，马、列以上著作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的情况而提出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预测。马、恩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然“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①他们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在英、法等当时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革命导师并没有具体规定社会化大生产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搞社会主义。他们特别强调：“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 and 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②可见，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必须从实际中去考察。既不能抽象地看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能认为是孤立地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由经济运动的规律得出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③诚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变革，尤其是对于新的社会形态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但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先有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才有生产关系的消极被动的变革，是不正确的。毫无疑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因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引起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比过去高得不可比拟的发展速度，是在

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建立，也有类似的情形。因而不能把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单纯归结为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关键是现存的生产关系是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马克思说：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所以，社会革命“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④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革命导师论述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而不是单纯看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第二，社会革命发生的物质条件，既包括已经存在的条件，也包括正在形成中的条件。

可见，在马、恩的著作中，并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早在1845年，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对于某一个国家内部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才来进行社会变革。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⑤后来，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这篇著名的晚期著作中将这个观点阐述得更加清楚：“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⑥

实践完全证明了马、恩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同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联系，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没有同先进生产力相

联系的无产阶级，没有工人运动，就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的物质前提。然而，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每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不同，并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标准。实践还表明，革命危机的成熟程度直接取决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条件和国际条件，直接取决于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和革命主观力量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而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同时，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往往是在帝国主义矛盾集中点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二十世纪初，在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后来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曾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是俄国和中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

马列主义一向认为，当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夺取政权。能够夺取政权而不去夺取，是完全错误的。“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⑦列宁在这里提出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那种认为只有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新鲜。第二国际考茨基、俄国的苏汉诺夫和中国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这样的。按照这种错误主张，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表面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坚持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但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和机会主义。

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列宁在病重期间口授的《论俄国革命》等五篇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深刻地总结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彻底批驳了考茨基和苏汉诺夫上述的错误观点，揭示了世界历史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顺序上存在着特殊性，揭示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是列宁关于一国首先取得

社会主义胜利理论的继续,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免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现在“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坚决丢掉考茨基式的教科书规定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机械看法,不应消极地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充分的时候才去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应当不失时机地首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发展经济文化的前提;然后,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努力发展经济文化,追上发达的国家。这就是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与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的特殊性。这并没有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没有违反社会形态依次发展更替的基本原理。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支配,大体上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总的历史发展顺序。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活生生地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个国家和民族,由于社会历史、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自然条件的不同,又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的发展规律。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普遍性是从许许多多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从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殊的发展中抽象出来。因而一般规律大体上概括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不能代替各国发展的特殊规律,也不排除每个国家和民族个别历史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存在着特殊性,反而是通过各个国家和民族各自发展的具体规律来表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的。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这是一部瑰丽多姿的历史,它既是有规律的社会历史运动,又有纷繁复杂和曲折交错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每个国家和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改变个别历史阶段的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的可能。如德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美国

没有经过封建社会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等。这种特殊性并不违反一般规律,恰恰是补充和丰富了一般规律。

事情十分清楚,那些指责我们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正如当年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是用“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死抱着“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⑨他们根本看不到、也不相信世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特殊规律。

列宁说:“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⑩列宁的以上论断和预见,已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已为俄国、中国和许多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证实,成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指南。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怎样反映了这条特殊规律呢?

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特殊性,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来源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⑪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取代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它具有落后的东方大国实践社会主义的独特的特点。这种特殊性对于经济落后国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民族,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中国没有象欧美国家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近代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我国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受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支配的。但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连绵不断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顺序,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而“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旧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现代的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革命实践和集体探索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建国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并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主义制度屹立在世界东方。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中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⑬

但是“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⑭我们党不论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还是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归根到底，都是我们党正确地掌握了我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特点，顺应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这又是我国实践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所体现的普遍性。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发生了缺点和错误，然而，纵观三十二年来，我们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我国工业化的伟大进程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仅以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就从1949年的32.1%上升到1980年的75.4%。这就充分说明，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逐步建立起来了。由此可见，那种轻视或看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有的物质基础，认为我国不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或者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作不切合实际的要求，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抱怀疑、否定和悲观的态度，显然都是不正确的。

三、关于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

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特殊性的又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马、恩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他们只能运用彻底的发展论去考察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未来共产主义的问题，推论未来新社会的一般原则。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具有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没有商品、货币，没有阶级，国家开始消亡等特征。但是，这并不是马、恩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论述。如前面所述，他们并没有排除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恩格斯说：这些国家“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⑮可见，马、恩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有单一的、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

列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在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贯彻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把发达的社会主义同消灭阶级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著名论断；提出了“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概念。^⑯列宁和马克思一样认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过渡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只有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才可以直接过渡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只能过渡到初级形式的、不完全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然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⑰列宁认为，从初级形式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发展到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新经济政策，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化等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他在逝世前的著作中，全面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力图规划初级形式社会主义发展的蓝图。

根据列宁的论述和我国的实践，所谓初级形

式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而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阶段。它除了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以外，又具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点：（1）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公有制已初步建立，但经济还不发达，社会化大生产和公有化程度较低。它虽然有一定现代化的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但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与多程度的公有制形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必要补充。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特殊的经济形式；（2）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初步实行了按劳分配，但还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实行按劳分配；（3）计划经济已经建立，并起主导作用，但市场调节还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4）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人民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待向前发展，使之逐步完善；（5）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对内镇压职能还没有消亡；（6）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初步建立，但教育科学文化还比较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还没有消失，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未形成。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些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的特点，决定了它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它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从不发达达到比较发达，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发展过程。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的斗争，就是这个伟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因此，如果看不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完

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差别，不从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照搬马列关于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就要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过去，我们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所有制变革的不断升级，几度主张取消商品生产，错误地批判按劳分配，过早地提倡缩小三大差别等，都同没有从实际出发，混淆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目前有些人又只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的挫折而缺乏信心，有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主张走回头路，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从而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置于现实的基础上。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左”的和右的倾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7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页
-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2页
- ⑦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 ⑧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2页
- ⑨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0页
- ⑩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 ⑪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 ⑫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1、641页
- 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⑭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页
- ⑯ 《列宁全集》第4卷第486页
- ⑰ 《列宁选集》第4卷第142页

对习惯力量的哲学探讨

王 锐 生

历史唯物主义应当研究习惯力量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习惯力量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研究课题。对它的研究，也是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的。

习惯，是个人心理现象。科学地说明这种心理的过程是心理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把习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力量来研究。它认为，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会形成共同的或类似的心理状态、民风习俗等等，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它们形成之后，由于时间的力量，就变成一种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产生巨大反作用的社会力量。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习惯力量（或称习惯势力）。

习惯力量作为社会心理的表现，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围。但是不能用简单重复社会存在第一性、社会意识第二性的这个众所周知的原理，来代替对习惯力量的专门研究。我们过去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中，忽视对各种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深入研究，正是造成“社会意识”这一章的讲授使人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习惯力量属于社会意识，但又不等于社会意识。因为第一，如同社会思潮是许多个人思想的汇合一样，习惯力量不是指单个人的意识、心理，而是许多个人在共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状态。这样的习惯力量就不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客观力量。正如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第二，在社会存在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社会意识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化为人们的牢固成见，才能以顽

强地支配人们行为的习惯力量表现出来。就是说，并不是任何社会意识都是习惯力量。例如，刚刚出现的国家观念对于业已解体的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成员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反映和调节旧时氏族成员之间关系的氏族习俗仍然支配着他们的头脑。无怪作为最早的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14—115页）

社会意识必须转化为一种习惯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它为社会存在服务，为产生它的那个经济基础服务的职能和作用。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在刚刚从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产生出来时，往往只是属于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还根本说不上是一种支配人们行为的习惯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它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力量是很小的。只有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或几百年的普遍传播，它才能成为国民的牢固成见，变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我们知道，在原始氏族社会里，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靠作为习俗的习惯力量来调节。例如几乎在一切原始公社里都盛行着“分肉”的习惯。这种习惯显然要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极端原始的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原始共产主义所有制来说明。在当时生产工具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每个社员很难保证自己经常都能猎得野兽。因此，这种“分肉”的习惯对每个社员来说，实际是一种免于饿死的保险。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分肉”之形成为一种支配一切氏族社员的牢固的成见，想必也是在悠久岁月中人们经验的总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如果在全体氏族社员那里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牢固支配每个人的习惯，就很难想象这个集体还能存在下去。

自然,有一“利”就有一“弊”。社会意识转化为习惯力量,固然可以借此充分发挥它为社会存在服务的作用。但在它借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时候,由于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力量,所以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不如此,就不叫作习惯力量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就是说,原来使意识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存在发展的那个因素,现在却反过来成为使它继续存在并长期对社会发生消极作用的因素了。

综上所述,习惯力量的反作用比起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个一般提法,更具体、更深刻、更复杂。我们要深入研究社会意识,就不应当停留于简单重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个基本观点上,而应当通过对习惯力量的研究来加深我们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阶级对抗下的习惯力量

习惯力量有它自己发展的历史。起初,在社会分裂为对立阶级以前,习惯力量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不过,对氏族公社的社员来说,“社会”的范围是十分狭小的,基本上就是他们所属的那个部落。阶级对抗出现之后,习惯力量就发生了变化。变化了的习惯力量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原来的原始社会的习俗在阶级社会里,变形为体现阶级压迫的陋俗。例如,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时,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就是群婚。在远古时,群婚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页)后来,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群婚失去了它的朴素的原始的性质,并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页)但群婚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力量。为了改变这种习俗,在某些民族那里,就只好采取一种披上宗教神秘外衣的“赎身”办法。例如有的民族让未婚姑娘在神庙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她们结婚。巴比伦的女子则每年须有一次在朱莉塔庙里献身给男子,这种新的习俗表明,妇女们借此“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页)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并无人压迫

人性质的习俗就转化为中世纪欧洲的贵族压迫农民的所谓“初夜权”。就是说,原来妇女为赎身而做出的“赎罪牺牲”,现在被迫只献身于“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的部落或氏族的首领、酋长和诸侯了。这种陋俗直到十五世纪才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被取消。为此,农民还付出了大量的赎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47页)

(二)在社会分裂为对立阶级的经济基础上形成阶级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体现某一阶级本质的习惯力量。例如墨守陈规,绝对平均主义等等,都是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支配小生产者、农民的习惯力量。直到今天,我国农村已经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也已经不再是小生产者,但这些习惯力量仍然不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流露出来。

资产阶级是资本的人格化,对他们来说,除现钱交易外,人和人之间便没有其他任何联系。金钱万能这种支配资产者的习惯力量,甚至在他们的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金钱确定人的价值。如果英国资产者想说,这个人拥有这样一笔钱,他就说: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近代平等观念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资产者的习惯力量经过几百年的普遍传播,资产阶级平等观念已经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国民的牢固的成见,一种顽固的习惯力量了。这种习惯力量不仅支配了资产者,也深深影响了缺乏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之所以有力量,部分地也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在思想上的统治。这种思想上的习惯力量的存在,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行动起来的巨大障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在转化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习惯力量之后,能够怎样强有力地发挥它为自己所属阶级与其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从而使这一阶级的统治地位更为巩固。这里显示出阶级的习惯力量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的作用。

一般说来,习惯力量首先是阶级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这种社会心理经过该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的加工和理论化,就创造出一整套集中表现这种社会心理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后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又反过来使某种社会心理越发成为

统治许多人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力量。

（三）民族心理和民族习惯——它们自身并非阶级的习惯力量。但有某种阶级因素渗入其中。

即使在阶级社会里，在一个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也会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文化素质。这些也是习惯力量的构成因素。但是民族又是划分为阶级的。本来不是阶级斗争产物的民族习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多数都程度不同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尊师、敬老这些优良道德品质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但又深深浸染了封建伦理关系，并且同体现宗法关系的烦琐礼节、礼仪混杂在一起。此外，在婚礼、丧葬方面也无不表现出民族习惯与剥削阶级的因素和影响交织在一起。例如，办婚事要送“彩礼”是我国民间的一种习惯。它来源于《礼记》里所说的“纳采”、“纳征”，原来可能只是男女结为夫妇时，男方给予女方的一种信物之意。后来，剥削阶级借办婚事以显阔气，就把彩礼弄得越来越挥霍无度了。习惯力量这种带有剥削阶级影响的东西迄今还支配着不少人的头脑。这就需要通过批判继承，把民族习俗与剥削阶级的影响细心地区分开来。自然，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爱国主义是在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一种民族传统。但同一民族中的各个阶级对于它的理解又都受自己阶级利益所制约。因前者而否定后者，就是无视客观存在的阶级划分的事实，因后者而否定前者，就会犯简单化的“左”的错误。而在实践中就会忽视在异族入侵时建立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团结战线。

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正确解决习惯力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把习惯力量的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考察的。马克思在总结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时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作为一种旧传统、旧习惯力量支配着巴黎的工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他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同上书，第606页）根据以往革

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同传统观念一类习惯力量的决裂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传统的观念，就是指一种观念已经形成支配人们的习惯力量。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决裂，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最难的莫过于同传统的观念即旧思想习惯力量的决裂了。当前，党中央及时提出两种文明一起抓，是十分正确十分必要的。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破除旧习惯力量和新习惯、新风俗、新道德的确立，是主要的内容之一。

说起破除旧的习惯力量，人们往往想起十月革命后初期列宁的有名的话：“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5页）有人误认为，习惯力量始终是同阶级斗争，甚至同资本主义复辟联系着的。这样把破除旧习惯同阶级斗争简单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其实，列宁所说的“习惯势力”是指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还未实现，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阶级。在当时存在着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小经济的自发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对刚刚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把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联系起来，把它叫作“最可怕的势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列宁在特定环境里关于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论断搬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业已完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我国，是完全错误的。

但这不等于说，目前的旧的习惯力量同现实阶级斗争就毫无联系了。我们近来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对于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这是一场坚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有的党员、干部堕落成为经济犯罪分子，就是因为思想上丧失警惕，在新形势下经不起考

验，贪图享乐，利令智昏。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各种剥削阶级习惯势力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对我们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进行拉拢、腐蚀。某诈骗犯就曾自书门联，上联是：“世路难行钱作马”。他就是要利用几千年私有制社会所形成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剥削阶级思想习惯对某些干部的毒害，来肆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就是在这种场合里，我们也要冷静地把作为经济领域内阶级斗争的经济犯罪活动同旧习惯力量本身区别开来。

在旧时代，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也往往会通过一种看起来无关重要的习惯表现出来。例如，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头发（辫子）的去留就同民族斗争息息相关。满族入关，强迫一切人留辫子，当时是留发能留头，不留发不留头。到了清末，一些留学生剪辫子，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种习惯的改变，那怕只是关系到不痛不痒的头发，由于它体现了民族的压迫和反压迫，斗争就十分尖锐、激烈。许多人甚至为之受苦，掉脑袋。但是，在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目前我国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对于旧习惯力量，大量的，或者说主要的问题是改造它们，消除其中渗透着的剥削阶级意识。例如，在养育子女、婚礼、丧葬、家庭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各种旧社会的习惯力量仍然左右着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和破坏。我们的任务是：小心地剔除民族习惯中的封建宗法关系和资产阶级庸俗腐朽影响，给它灌输进社会主义的新内容，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移风易俗，也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严重任务。

还必须指出，习惯力量的问题不应当仅仅归结为破除或改造起消极作用的旧习惯力量。任何一种习惯力量，在开始时总是适应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只有当它们借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业已崩溃，新的经济基础产生之后，它们当中某一些才会因同新的经济基础发生冲突而转化为消极的破坏力量。促使旧的习惯力量的消亡和新的习惯力量的形成即适合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新观念、新风尚之转化为人们的健康的习惯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它们之间

的关系，一方面是不破（旧的消极的习惯力量）不立（新的习俗）；另一方面又是不立不破。新的东西不能成为人们的习惯，旧的习惯就会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着。因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自觉树立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新风俗、新习惯。其中，有的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如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有些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出现的，如爱护社会公共财物和热爱劳动的习惯；前者同私有观念相对立，它只是适应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所有而产生的，后者也不可能存在于私有制社会，因为在那些社会里，劳动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因而自从奴隶制社会以来，鄙视生产劳动始终是一种顽固的习惯力量，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毒的刺”，只有在废除阶级剥削，生产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之后，才有可能开始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而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劳动将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说，劳动完全变成支配人们的一种习惯力量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旧习惯力量之消亡和新习惯力量的形成，通常是自发进行的。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却不可能走同样的道路。这是因为：（一）除了某些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建立的新习惯、新风俗是同一切私有制社会的旧习惯根本上对立的，加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特别多，所以，从后者不可能自发地转化为前者；（二）社会主义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的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引者）也是完全不依靠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248页）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的新风俗、新习惯的形成就不能靠事物的自发发展，而要靠灌输，就是说，要针对习惯力量的两个主要特点：群众性和牢固性，长期地、反复地、自觉地对群众进行耐心的宣传、说服和示范（树立榜样）。操之过急或简单地搞强迫命令，都是不行的。当然，在某种场合和范围内，也要辅之以群众自觉订立的乡规民约之类带约束性的办法，或借助于科学社会管理的手段等。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往一切私有制社会根本不同，它使人类第一次获得了按照自己科学地预定的设想来安排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习惯力量问题的解决也应当同以往不同。就是说，要由全社会的力量来干预、限

制旧时代遗留的习惯力量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自觉地、有组织地提倡、树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的新风尚，使之逐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新的、健康的习惯。



在我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上

经济学界就经济特区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广东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于六月六日在深圳市召开，会期八天。来自京、沪、闽、粤的经济学家就经济特区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问题。有人认为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人认为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也有人认为特区的性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二）关于经济特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问题。有人认为特区经济应是在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也有人认为，国家计划是由“条条”制定的指标体系，而特区则是以“块块”为主，所以，特区的计划，不能搞指令性计划，而是要搞指导性和预测性的计划。

（三）关于发行特区货币问题。有人主张应发行以外汇为储备的自由兑换的特区货币；但有人认为就目前特区的经济状况看，特区暂不适宜另发行一种货币。

（四）关于经济特区的土地使用费问题。有人认为特区的土地使用费，与资本主义地租的性质不同；也有人认为经济特区中的许多经济范畴都具有两重性质，即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性质，土地使用费，这一经济范畴也不例外。

此外，还就经济特区的作用、意义、立法原则和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

讨论会期间，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看望了参加会议的同志。省委书记、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南生，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李蒲弥）

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

——陈郁同志早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陈 慧 道 吴 然

陈郁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是我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他亲身参加了香港海员罢工、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又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本文主要叙述他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时期的革命活动。

（一）

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村人，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在外国轮船做工的海员。他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从小就跟母亲上山打柴，然后挑到市场上出卖，以维持贫困的生活。他九岁开始入学读书，十岁停学回家务农。十二岁时，他到香港机器厂当童工，因不堪老板的虐待，不到一年就跑回南头。十四岁时，又到香港一家汽车公司当学徒。在那里，他又受到老板和工头的剥削和压迫，最后愤然离开了汽车公司。十七岁时，他到南洋太平洋航线英国轮船公司当海员工人，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在这个期间，他看到在英国轮船公司做工的中国人不但生活待遇差，而且经常挨打受骂。他经常在国外航行，接触了许多外国工人，受到当时各国革命浪潮的影响，不断增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外国轮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反抗外国资本家、买办、工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在香港举行了中国第一次海员大罢工。从小就受到剥削和压迫，并具有反抗精神的陈郁，积极参加了这次大罢工，还在斗争中认识了当时著名的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同志。由于他在斗争中勇敢坚决，受到苏兆征的重视，鼓励他多联系群众，多做工作，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他的出色的工作，赢得了海员工人的信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由于海员工人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香港政府被迫让步，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海员罢工以后，陈郁参加了由苏兆征领导的中华全国海员工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他在一九二三年担任香港海员工会亚洲皇后号支部负责人；一九二四年担任香港海员总工会干事。当时，香港政府极力压制革命工会，并收买一些工贼组织黄色工会，以对抗革命工会。为了帮助失业的海员解决生活问题，为了更好地团结和教育工人群众

众，反对黄色工会领导人分裂工会的活动，陈郁在香港发起成立“工人同乡会”。“工人同乡会”在工人中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为了解决“工人同乡会”基金问题，他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捐献出来，并为募捐会费和发展会员而四处奔跑。陈郁通过这个组织冲破了香港政府对革命工会的各种限制，把一大批失业海员工人团结在以苏兆征为首的海员工会的周围。

（二）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六月十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罢工。当时，陈郁是香港海员工会主要领导者。当罢工命令发出以后，他带头坚决执行，积极领导本轮船及本航线轮船的工人罢工。当时太平洋航线轮船每艘有工人八百五十人至一千人。这些轮船的罢工能否发动起来和坚持下去，不仅是决定海员工人罢工的关键，而且是决定香港工人罢工的关键。陈郁不辞劳苦，深入各个基层工会，向工人群众传达和解释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命令，努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海员工人不仅积极参加罢工，而且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和旺盛的斗志。这次香港工人罢工首先由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人开始，在海员等工人罢工的带动下，洋务、起落货、煤炭、机器、船坞等各种工人也都举行罢工。

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后，香港工人更加愤怒，参加罢工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十五万人。党为了加强对省港罢工的领导，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陈郁奉罢工委员会命令回到宝安，组织同乡海员工人俱乐部，领导他们在宝安直接参加罢工。在宝安工作了很短时间，他又奉命回到广州，做海员工会的工作和负责香港罢工代表团的工作。根据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决定，在十多天中，香港的罢工工人十多万人回到广州。罢工委员会必须解决这批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陈郁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接待、安置罢工工人，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当时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既要做思想工作，鼓励工人克服现实的困难，不为困难动摇罢工的斗志，又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陈郁除向他们如实地说明实际困难，鼓励他们在困难面前不畏缩、不动摇之外，还经常跑到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食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例如，罢工工人的宿舍低温、潮湿，不少工人生病。陈郁设法找到一些床板，分给工人，同时与各家医院交涉，使患病的工人得到免费治疗。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促进了罢工工人对罢工委员会的信赖，加强了他们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罢工的斗志。

当时，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每周开会两次，所有关于罢工的政策、策略和其他重要事项，都经过代表们讨论通过，然后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去。陈郁很重视将罢工工人的意见和要求带到代表大会；会后，又把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带到工人群众中去，让大家开展民主讨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对某些问题作必要的解

释，因而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团结了更多的工人坚持罢工斗争，和保证了罢工的各项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

在罢工工人中，还有少数人搞赌博。陈郁认为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不仅会影响工人之间的团结，而且败坏工人的革命意志。在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大力支持禁绝赌博的决议。决议通过了之后，他又耐心地向工人进行思想教育，讲清不应该赌博的道理。这样，一部分罢工工人的赌博行为终于被制止，加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

由于陈郁在工作中注意发扬民主，注意解决不利于工人团结的消极因素，在生活上过着和罢工工人一样的十分艰苦的生活，使香港一部分受黄色工会领袖影响很深的工人也为他和其他同志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所感动，而逐渐接近和拥护他们。

这年八月，陈郁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除了继续做香港罢工代表团的工作之外，还担任广州海员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负责海员总工会的工作。

（三）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国民党反动军阀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封闭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省广州市职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并雇用打手、流氓，组织各工会的所谓“改组委员会”，霸占了工会会所，企图分裂和瓦解革命工会组织。工人阶级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取到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被剥夺净尽。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郁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海员工会主任，中国共产党海委书记，并负责罢工工人代表团的工作和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工人代表会的部分工作。当时，他和何潮（当时是广东省委候补委员，负责海员工作）等几位同志转入地下，住在河南龙导尾一间房子的二楼，进行秘密活动。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几天，在广州处于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困难环境下，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组织工人罢工，反对蒋介石、广东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反革命政变。在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罢工的有海员、汽车工人、人力车工人、印刷工人、渔业工人和一部分店员。其他各业的工人在二十四、二十五日也陆续罢工。罢工工人发布宣言，反对摧残工会。他们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雇主的进攻！”在这次罢工中，虽然工人被捕的有二三十人，因散发罢工宣言被杀的有六人，但它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了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头一棒。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陈郁又组织和领导了广州海员罢工，反对轮船公司开除参加省港罢工的海员。这一天，广州到香港、广州到澳门、澳门到香港、香港到江门等航线的轮船都停止航行，五千海员齐集在太平戏院前坪开会。所有革命的职工会和香港罢工工人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表示了对海员的同情和支援。大会通过了把“改组委员会”从工会赶出去，由工人自

已来办工会的决议。大会选出海员二十五人，组织一个维持委员会来执行大会的决议。群众大会开过以后，几万群众开始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全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以后，来到海员工会所在地，那时“改组委员会”的委员早已逃跑了。通过这次罢工，革命海员收复了广州以及江门、汕头等地的海员工会，把工会领导权从反革命手里夺回来。这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最大的一次群众斗争。海员的革命斗争给各业工人树立了榜样，纷纷起来驱逐“改组委员会”，并喊出了“准备为广州的苏维埃而战斗”的革命口号。通过武装起义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成为广东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了。

（四）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决定在湘、粤、赣、鄂四省发动武装起义。十一月十七日，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私人战争。”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作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随即成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担任总指挥。陈郁是“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一些负责同志积极参加起义的策划、发动和组织工作。“行动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后，即着手把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和“海员义勇团”等改编、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陈郁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杨殷、吴毅、邓发、季步等积极参加了工人赤卫队的组织领导工作。“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同志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郁主持训练工人赤卫队。工人赤卫队总数约三千人，共编七个联队，联队下分大队、中队、小队，设有联队长、党代表等领导职务。工人赤卫队的队员以省港罢工工人为骨干，包括有各种产业、手工业的工人和店员。这些赤卫队员受过斗争的锻炼，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较高，虽然当时的武器很少，但是他们斗志昂扬。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在广州起义前被捕。他被捕后装病，反动派便把他送入教育路一间很小的医院。陈郁和有关的同志认真地研究了营救周文雍的方案，布置了几位觉悟高而且胆大心细的工人，乘着警察换班的时候，迅速走进医院，把周文雍背出来，让他坐上事先在医院门口准备好的一辆汽车逃走。陈郁设法营救周文雍出狱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党的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对同志高度关怀和爱护，在斗争中的机智勇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广州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举行了武装起义。叶剑英同志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是这次起义的主力。教导团首先打响了起义的枪声，在张太雷同志带领下，高举红旗，誓师出发，向反动派猛烈开火。同时，在市内分头埋伏的工人赤卫队也在各联队长指挥下，一队队地按照预定地点出发，攻击预定的目标——国民党军警和政府机关。工人赤卫队一部，

在教导团第三营配合下，攻打广州市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陈郁亲自率领工人赤卫队的部分队伍，参加了攻打公安局的战斗。在教导团掩护下，工人赤卫队猛烈地进攻，很快就打垮敌人铁甲车和机枪阵地的顽抗，在十一日晨四时许全歼守敌保安队，击毙伪总队长，占领了公安局。接着，在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配合下，起义队伍又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陆续攻下了敌人的许多据点，红旗几乎插遍全市。

十一日上午六时，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原址成立了。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陈郁是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司法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一些重要决定。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陈郁与工农民主政府的其他同志首先组织青壮年扩大武装队伍，并组织群众参加运输、侦察、传递消息以及救护工作。为了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还组织群众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工贼头目，并且实行邮电检查。十二日中午，工农民主政府在西瓜园举行了工农兵大会，陈郁和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工农兵大会宣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发布告全国工农兵群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并发布各种命令。

广州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在帝国主义策动支持下，张发奎、李福林等连夜从江门、韶关各地调兵回广州镇压起义。从十二日晨起，各路敌军陆续进逼，从西、北、南三面向广州包围过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经过英勇奋战之后，决定把一部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其余来不及撤退的起义队伍，仍继续抗击来犯的数倍于我的敌人，浴血死战。陈郁指挥工人纠察队与敌人巷战，一直打到各路敌军进入市区，然后才和另一位同志向西关住宅区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进入了广州市区，对广州人民进行极端野蛮的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市。陈郁在李少石同志家里暂住几天，后来又搬进沙面租界住了几天。当他了解到省委负责同志到了香港之后，便通过海员工人的帮助，秘密回到香港，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震动世界的武装起义。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为了挽救革命、为了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的尝试。

陈郁同志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始终表现他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革命，为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朱 杰 勤

古语说：“国于大地，必有与立。”这就是说，在地球上建立国家，就必有其他国家和它一样建立起来。每一个国家不是孤立的，它总要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

从中外关系史来看，文化的交流主要以人为媒介，物质的传播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国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阻止人民对外交往的。两国人民可以采取个人或集体行动，通过旅行、贸易或移殖方式而互相接触，进行思想和物质的传播和交流。例如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是两国僧侣们努力传授和引进的结果。而中国丝绸的西传也是中外商人不远万里，不怕艰苦，用骆驼运入希腊罗马的。中外关系的建立，一定先从人民互相接触开始，两国官方的交聘一定在民间往来之后，等到历史把这件事纪录下来，又在数十年之后了。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曾派张骞出使月氏，目的在约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虏，监禁了十多年，终于逃出，继续西行到大夏（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当他到达目的地时，月氏人没有答应同汉朝夹击匈奴。张骞只得失意回国，回国后，上书给武帝汇报出使经过，其中提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详见《史记》卷一二三）

大夏在兴都库什山（阿富汗境内）及妫水之间，从大夏东南过了山就到身毒（即印度）。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所以四川的特产邛竹杖、蜀布，都可以由此运入印度。中国商人经常到印度贸易，可是官方完全不知道。由于张骞的建议，武帝曾派遣远征队去找寻通往大夏的途径，结果又因“费多，道不通，罢之。”张骞出使大约在公元前133年，而迟到公元前98年，司马迁的《史记》才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上面的历史事实可以充分说明，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建立，不是由两国政府首先发动起来，而是两国人民为着本身的经济利益，主动地友好往来和进行贸易。在他们行动的影响下，两国政府才开始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所以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应该以人民为主体。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中西交通自然以陆路为最早。因为从中国到西方，可以由玉门关出发，经过中亚、西亚各国到达伊朗，又由伊朗转到罗马帝国，这段漫长的路，后人称为“丝绸之路”。据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说：“第一个丝绸商队从中国到伊朗的时期是公元前106年。”他大概是从汉武帝用兵廓清西域道路的时期来推定的。我们认为中国丝绸运往伊朗还会比上述日期更早些。换句话说，张骞通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了。中外商人只要有有利可图，就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原大漠，就可以走到西方，从西方来的人，采取相反方向，也可走到东方，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路途遥远，大漠茫茫，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还是有办法前进的。何况由中国到中亚和西亚这条道路，秦汉以来，就有多种游牧民族往来，或者找到好的草原地带，他们（如塞种、月氏、乌孙等）就作长期的逗留，形成所谓“行国”。行国与行国之间，自然有可通的道路，由他们在自己国家范围内进行保养和管理。这些道路既分段而又衔接，不断地向前伸展。“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

有人认为汉初匈奴兵犯不止，阻塞了通西域的道路，张骞通西域后，还是时通时阻，直至汉武帝发兵大败匈奴，匈奴远遁，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才畅通无阻。其实并不尽然。我们认为：即使匈奴支配着丝绸之路，丝绸贸易还是可以进行的。匈奴虽然与汉朝政府为敌，并不蓄意同和平的商人作对。汉朝商人运货入匈奴管辖区，匈奴收了汉朝商人的礼品或过境费后，就可以让他们通过。而且匈奴也要同各地区进行贸易，必不会反对通商的。介乎中国和伊朗还有许多国家，商队都可以逐国停留，补充给养和交换商品。丝绸之路对来往客商基本上是开放的。不过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紧张和恶化，就会发生障碍或暂时中断的事情。

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早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商船已由南中国大港出发，沿途访问东南亚一些国家，最后到达印度和锡兰。但由于海上风波的险恶，又受到造船术和航海术的水平限制，海上交通似乎不及陆路交通的安全。我国东南沿海利于水上交通，西北边地又适宜于陆路运输。由于水陆交通的发达，中国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已经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

中国一旦和西方交通，就必然使一些人对外国有所认识，并推动我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中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关于中外关系史的就有《大宛传》等。司马迁自序说：“网罗天下旧闻，不敢缺。”他所谓天下，已超出华夏或中国本土的概念了。汉史家班固在《汉书》安息（今伊朗）传中，不仅标出它距离长安若干里，而且记载中国和安息交换使节，不厌求详，有声有色。我国学者对中外关系史作有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从汉代开端。

中国国号远播到西方还是在于汉代。古代西方人把中国称为“支那”（Chin、Sin、Sinae），据史地学者考证，“支那”就是“秦”的对音。春秋时代，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即日后与秦汉为敌的匈奴。秦始皇又却退匈奴七百余里，迫其西迁。后汉武帝加以打击，匈奴就进一步渗入欧洲。匈奴从东方跑到西方，自然会把秦的威名到处传播，使西方的人认为秦就是中国的国号，甚至汉朝取代秦朝之后一段时期，西方人还是把汉人称为秦人。“支那”一名就是这样来的。五

世纪罗马帝国的覆灭，主要是奴隶起义的结果，但“蛮族”的入侵，特别是匈奴的入侵也发生很大的作用。就是这些匈奴象波浪般把其他“蛮族”推到罗马帝国的门户，促使罗马帝国的崩溃。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十六世纪前，我国文化在世界史上占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而且对世界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良的产品，有些在汉代已经直接或间接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除丝绸外，还有钢铁和冶铁技术，养蚕技术，陶瓷和以后的制瓷技术，掘井法和制漆法等，一方面使别国人民的生活丰富起来，另一方面对别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人民在对外关系上一贯以“仁义”为宗旨，在文化交流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在唐、宋、元之际，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罗盘针和火药已相继由中亚、西亚而传入欧洲，这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亦不断从外国吸收有益的东西，加以改造来符合自己的需要。

国无论大小，都有长处和短处。文化交流就是要舍短取长，互相借鉴，互相调剂，达到互助互利的目的。中国和外国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交流，对各自的国家都发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双方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这里仅以中印文化交流为例：从印度传入的希腊式的键陀艺术对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就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隋唐时代，印度的音乐已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艺术界，《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都著录了天竺部的乐器和乐曲。另一方面，唐代初期流行的“秦王破阵乐”（按：唐太宗为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此曲，名“秦王破阵乐”。即位后，每逢宴会都奏此曲，后改名“七德舞”。此曲大约由西藏、尼泊尔传入印度的。）亦于七世纪传入印度，受到普遍热烈的欢迎。唐三藏法师玄奘，于七世纪游学印度十七年之久。他不仅把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供印度人参考，而且用梵文著书来阐述印度大乘佛法。他前后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余卷，不仅丰富了祖国灿烂的文化宝库，而且间接替印度保存许多印度珍贵典籍，使印度学者能够根据玄奘译本把已佚的梵文经典重新译出。玄奘访印，遍历一百一十国，又传闻而未至者二十八国，凡见闻各国的宗教、风俗、传说、异迹，都记于《大唐西域记》一书。这本书共十二卷，乃由其弟子辩机根据他的日记和口述编写出来。其中纪载可补印度中世纪史之缺。近代考古学家根据此书的纪载，把王舍城、鹿野苑、阿旃陀、那烂陀寺等地遗址，一一查探并发掘出来。印度人民对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玄奘及其著作非常热爱和推重。

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入仕元朝凡十七年，回国后著有一部《游记》，纪述中国和中国以外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情况和风俗习惯，受到全世界的重视。《马可·波罗游记》已成为世界名著，各种文字版本有数十种之多。最近中意两国合力摄制大型影片《马可·波罗》来纪念这位沟通中西文化的伟大使者。马可·波罗的《游记》是关于元代中国的珍贵史料，象征着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结晶品。从上面的例子看来，文化交流

对双方都有好处，由于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对整个人类社会也将会有好处。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是中西文化一场大接触。耶稣会本来是一个保守的宗教组织。其任务是对抗十六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他们传教东方的目的，不过是要用东方的宗教势力来弥补他们在西方威信的损失。由于它要与欧洲先进的科学思想作斗争，他们就必须具备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这些科学知识就成为他们进入中国的敲门砖。耶稣会士白晋曾于一六九七年写一份秘密报告给法国皇帝路易十四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使人认识到，要在中国引入和传播基督教，宣传科学是一切必由之途的主要一种。”这段话说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宣传科学的目的在于传教。因此他们传授给中国人的实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历法、铸炮术、望远镜原理等都不是最新式的和有系统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含有不少消极因素。但毕竟使中国知识分子知道欧洲科学的存在，并对欧洲科学有所接触，从而扩大了中国学者的科学视野，刺激了中国学者对欧洲近代科学发生兴趣。耶稣会士多通汉文和汉学，也把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文物制度介绍到欧洲，成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得力媒介。

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欧洲，受到欧洲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丝绸以及其他文物和典籍，都风靡一时，分别称为“罗柯柯艺术”、“启明时代”、“感情主义时代”。西方著名学者如莱布尼兹、服尔夫、伏尔泰、歌德和百科全书派以及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都在哲学上、文艺上和经济思想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大事，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国与国之间发生关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国与国的关系不是长期不变的，有时和平相处，有时爆发战争。我们研究对外关系史，应该包括和平与战争两方面的关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避而不谈。我们不能单方面宣扬在和平时期两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而绝口不谈在战争时期双方的敌对行动。不过，和平关系比战争关系长久得多。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长期的安定局面是不能立国于大地，而且各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的。因此，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目前，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是一门薄弱的科学部门。我们还没有一部内容丰富，符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问世。这和我们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是很不相称的。这种落后局面必须迅速扭转过来。



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曹松林

“正月”读音“征月”是不是秦代避讳所致？历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看法，但语焉不详。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则认为不是由秦讳而改音。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诞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关于这条记载，陈垣先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他在《史讳举例》卷五中引用了《集解》的徐广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诞生，故名正”，进而推断“政与正本通”，“避正非避嫌名”。陈先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纠正了个别学者以为避正为避嫌名的错误。第二，他在同书卷一中提出“正月”读音“征月”不是为秦讳。其理由是：“正字本有征音，《诗·齐风》：‘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终日射兮，不出正兮。’释文‘正音征’。《小雅·节南山》：正与平、宁为韵；《大雅·云汉》：正与星、羸为韵，其非为秦讳明矣。”然而，我认为这里的论据并不充分，结论也难予成立。

我们知道，《正义》所说的是特定的场合——“正月”。所谓“周正建子”之“正”，“后以始皇讳，故音征”，意为周历以仲冬月（即子月）为岁首，即为“正月”，始皇以周历正月诞生，故讳正而读征音。对于这一点，古人甚明。所以，宋人王观国说：“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读音征月。而史书释音皆音正月之正为征也”（《学林》卷三，《名讳》）。又周密说：“秦始皇讳政，乃呼正月为征月”（《齐东野语》卷四）。其它诸家也多本是说。都是肯定在“正月”读音“征月”时为秦讳。因此，要否定这一说法，不能笼统的说先秦正字有征音，而必须证明“正月”读音“征月”先秦早有。

然而，陈垣先生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虽

然，他例举了《诗·齐风》的释文“正音征”，又例举了《小雅·节南山》中正与平、宁为韵，《大雅·云汉》中，正与星、羸为韵，但是，这只是诗词中的叶韵，并不能作为先秦“正”字皆读“征”音的证明，因而就不能证明先秦的“正月”已读音为“征月”。恰恰相反，却有材料证明先秦时“正月”不读“征月”。检索陈垣先生引以为据的同一书——《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小雅·正月》），“正”字下赫然注曰：“音政”。这说明，“正月”在先秦读“政月”，至秦代则读“征月”，如果不是为秦讳，又是为什么呢？

陈垣先生所以持是说，还与他认为只有另创新音才算避讳有关。他在《史讳举例》卷一中，曾经引用了《宋史》如下的记载：礼部讨论避钦宗赵桓讳时，提出：桓字“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宋史·礼志》）。我认为，宋代另创新音避讳，只是避讳方法之一。宋人关于一字有两音或它音，不读本音而读其它的音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宋《绍熙重修文书令》载：“诸犯圣祖名、庙讳、旧讳（旧讳内二字连用为犯，若文虽连，而音不相属者非）、御名，改避。余字（谓式所有者）有它音（谓如角微之类）及经传子史有两音者许通用（谓如金作赎刑，其赎一作石欲切之类），正字皆避之。”这里还举了两个例子。微，一为知鹰切，蒸韵；一为知矣切，纸韵。赎，沃韵，一为石欲切；一为钺欲切，同续。是令明确规定，有两音者及有它音者，“许通用”。“许通用”为何意？意为读它音仍为避讳耳。就如“正”字有“征”音，不读本音，读“征”音亦为避讳义同。至于桓字欲改读为威、旋、植，那是因为桓字没有它音，宋儒又苦

于经籍的淆乱，希创是说，以救当时避讳之弊，且在改音避讳中也仅此一例，不能作为改音避讳一定要另创新音的证据。因而也就不能作为否定“正月”音“征月”为秦讳的依据。

再者，在陈垣先生确认为改音避讳的例子中，也有一字而用它音作为避讳方法的情况。《茶香室续钞》卷三，引叶名沅《桥西杂记》云：“雍正三年上谕：‘孔子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九卿议以凡系姓氏，俱加β为邱；凡系地名，皆改易他名；书写常用，则从古体作止。上谕：‘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止字，是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β为邱，地名亦不改

易，但加β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见《史讳举例》卷一）。这里，因丘字古有期音，以读如期作为避讳之法，陈垣先生也是首肯的。基于同样的道理，把“正月”读成“征月”也就是秦代改音避讳的方法。

要之，秦代之“正月”读音“征月”是避讳改音之始。诚然，改音避讳法很难施行，其影响不如改字避讳法大，但它毕竟在历史上出现过。

应该说明的是，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一书是避讳学方面带总结性的著作。这一点疏忽，与整个著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陈老先生永远是我们师法的榜样。



关于赵佶的死所

陈继礼

宋帝徽宗赵佶的死所是五国城，这是史家都同意的，但五国城属今何县治，则向无定说。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处：一是吉林的扶余县；二是黑龙江的依兰县；三是黑龙江的宁安县。翻开地图，这三处的距离远的千数里，近的也在几百里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它们都各有一定的史料或文物可资依傍。如持扶余说的，主要据昭桂《啸亭杂录》内载：“自乾隆中筑伯都讷城（按：即今吉林扶余），掘得碑碣，录徽宗日记云：‘天会十三年（一一三五年）寄迹于此。’知五国城即此地。”持依兰说的，则根据《东三省舆地图说·辽史营卫部志·五国部》内载：“今自三姓至乌苏里江口松花江两岸共有城基九处，是五国故址。”又说：“三姓当为五国头城。”满语依兰（依朗）为三，哈喇为姓，即三姓，属今依兰县治。持宁安说的是根据《清一统志》里说：“五国城在宁古塔（按：今黑龙江宁安县）东北。”等等。

我认为，扶余说史据不够充分。因为光据一椽碑碣出土处定论，本身就不很科学。而况自乾隆上去徽宗之死已历六个多世纪，这样一块引人注目的文物被好事者挟带迁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至于依兰和宁安两说，根据相同，两处均有五国城故址。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所撰之《契丹国志》云：“女贞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接大海。”《大金国志》云：“天会八年，宋二帝自韩州如五国城，在金国所都之东北千里。”这两条。金国所都为会宁，在今黑龙江阿城南，其正东为宁安，二者同处北纬44度。又据《明统志》云：“自此而东分为五国，故名。旧传徽宗葬于此。”又从地图看，由此往东，与日本海相接，同上引《契丹国志》所载符合。据此，宁安之说最为合理而有据。

五国城的故址，即宋徽宗赵佶的死所，以宁安之说较优。

宣德写本金钗记校后记

刘念兹

新发现的写本《金钗记》，是《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一书的手抄本，又简称《刘希必金钗记》。它是新近出土的明代宣德七年的抄写本，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物，它又是一部早已失传的著名的宋元南戏剧本，在戏曲文献宝库中，是罕见的海内孤本。这是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今拟定其名目为《宣德写本金钗记》。

一

宣德写本《金钗记》是1975年12月发现的，出土于广东省潮安县西山溪的一座明代墓葬中，现在珍藏于广东省潮安县博物馆。写本是用当时民间通用的无格麻纸抄写的，高39厘米，宽26厘米，共75页，每页两面，每面约八行，每行约二十至三十余字不等。全剧标名出数，共六十七出。经校订整理发现实际上只有六十三出戏文，写本原缺四出，即第36出、第37出、第38出及第48出。

宣德写本《金钗记》的剧情大意是：西汉元帝年间，南阳邓州书生刘希必表字文龙，娶妻三日，上京求取功名。临行时妻肖氏送他金钗半支、菱花镜半面、绣鞋一只，作为表记，并发下八大愿誓，望他高中后早日归家。状元及第后，曹丞相意欲以女妻之，他拒接丝鞭，触怒当朝宰相。他又上朝恳求辞官放归故里，圣旨不允，却命他为出使匈奴的使节，护送王昭君去西蕃和亲，单于把他招为驸马，赐以贤王的爵位，留住匈奴十八载，却时刻思念故国亲人。公主贤淑知礼，设计使他回归汉土。汉王嘉其节义，封为列侯，荣归故乡。剧本同时描写肖氏日夜思念丈夫，侍奉公婆，因文龙两次修书回家均被拦阻，家人以为他早已死亡，里中有无赖徒宋忠央托吉

公为媒，企图骗娶肖氏，公婆亦以刘家无后和生活困难，逼迫肖氏改嫁。肖氏抵死不从，守节二十一年。最后肖氏被逼投河，恰逢文龙归来，夫妻相认，钗合镜圆，全家团圆。剧情十分动人，情节也很曲折。剧本的无名氏作者借用王昭君和番的历史背景，没有用一点笔墨去描写昭君和番的悲切或者欢喜的情节。在这个剧本中，王昭君是个不出场的人物，它与元杂剧《汉宫秋》及以后的昭君和番戏曲的处理是迥然不同的。编剧者在这个剧本中，着力刻画刘文龙和肖氏夫妇感情始终不渝的坚贞性格，赋予两个主人公以浓厚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和爱国的思想。

“刘希必金钗记”这个名目，从来未见文献中有著录。但是，故事情节相同的南戏中，有题作“刘文龙”的戏文一种，见明代永乐大典卷13973，戏文9著录，可惜此书已散佚。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著录于“宋元旧篇”的南戏名目中，有“刘文龙菱花镜”剧本一种，亦无传本行世。在《汇纂南曲九宫正始》、《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及沈璟《南九宫谱》、沈自晋《南词新谱》等词谱曲谱中，残存有关“刘文龙”的佚曲计有二十二首，并注明是“元传奇”或“旧传奇”。从这些残存佚曲中，可以看出它的剧情大意与宣德写本《金钗记》是基本上相同的，仅在曲文字句上有所差异而已。宣德写本《金钗记》，标明“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当是宣德六、七年间或稍前的一种“新编”本。据此，宣德写本《金钗记》，尽管标名不同，实际上应当是永乐大典古南戏《刘文龙》本，和徐渭著录的“宋元旧篇”南戏《刘文龙菱花镜》本的一种明初地方演出的“新编”本。

宣德写本《金钗记》，是宋元时期南戏《刘文龙》在明初南方活动的一个实证。《寒山曲谱》中

载有《肖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剧本一种，原注云：“一名刘文龙传，雍熙乐府第一种，史敬德、马致远合著。”这种“祭坟重会”的剧本与宣德写本《金钗记》中的在洗马桥祭灵堂会的情节是不同的。说明在元代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情节的“刘文龙”戏曲的事实。也说明南戏《刘文龙》剧本创作的时间，当在南宋时代较早的时期出现的，到了元代，这个南戏剧本已经流传在各个地方，出现了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或演出不同的限制而有两种本子并存的局面。宣德写本在广东潮州地区古墓中出土，还标明有“正字”二字。现在仍然流行在粤东沿海一带的正字戏古老剧种，与此有很大关系，但是至今尚未发现广东正字戏的传统剧目中有此剧的痕迹，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但是在浙闽沿海的古老剧种中，这个剧本却一直在民间演出中流传下来。福建莆仙戏传统剧本发现《刘文龙》一本，是写刘文龙陪同王昭君和番的戏，与宣德写本上半部相近，但其中有王昭君的戏，是不同的地方。福建闽南七子班（现名梨园戏）传统剧目中，有《刘文良》一种（当地方言良、龙同音，当系龙字之误），保存了与宣德写本下半部相同的故事情节。特别是“洗马桥”一出的祭灵相会，“相认”一出的钗镜重合，故事、人物、情节基本上是相同的，现有建国初年老艺人何淑敏的口述本。1962年、1980年何淑敏与其他几位老艺人登台演出，我曾亲眼看过，并且有当时的录音录像保存下来。另外，在温州昆曲中也有这个戏曾经演出过的传说，但可惜尚未见到艺人口述本的记载。总之，《刘文龙》这个南戏，宋元以来是一直在浙、闽、粤沿海地区流传着的，这说明这个戏经过历史的考验，受到南方人们的普遍喜爱。宣德写本《金钗记》这件文物的出土，对研究古代南戏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实证，它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也就在此。

二

古代戏曲刊本时代最早而又传世至今的当算元代在大都和杭州刊印的民间坊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北杂剧最早的刊刻本。至于南戏剧本，在宋元时期尚未发现有刊刻本流传，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年）编纂的《永乐大典》卷13965至13991手抄的南戏剧本凡三十三本，算是南戏最早的剧本了，可惜散失无存，现在仅能见到的是嘉靖重写本中的《张协状元》、《宦门子

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宣德写本《金钗记》，写定于宣德六年至七年（1431至1432年）之间，就其文献价值来讲，可说是现存南戏剧本中时代仅次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本，应名列第四种。就其出土文物意义来讲，是迄今所发现的戏曲剧本中，无论是刊印本或手写本，都是时代最早的第一个古本。它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意义也就在此。

宣德写本《金钗记》的卷末标目，题名为“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据此可知当时还有一种刻有插图“全相”的刊印本，是宣德写本的底本。现在出土的宣德写本是根据一种有“全相”的刻本进行重写的。可惜这部“全相”刻本，在历史文献中未见著录，至今也未发现它的传世。我们从版本学历史来考察，宋、金、元时期是雕版画全面发展的时代。北宋的首都汴梁，南宋的都城杭州，以及四川的眉山、福建的建阳，都是雕版发达的中心地区。在金、元时代，北方的“平水”（今山西临汾）版，南方的杭州、建阳，雕版艺术更是显著的繁荣。元至治（1321至1323年）年间福建建安书林刊印“建安虞氏全相平话五种”，刻制精致附有“全相”插图的杰作。明初沿习旧制，在建安、金陵专为戏曲小说类的俗本绘绣象插图本多有出现，如现存的宣德乙卯刊本《金童玉女娇红记》，内作“全相”插图86幅，是金陵乐安积德堂的刊本。可以想见宣德写本《金钗记》所据为底本的“全相”插图刊本，可能是金陵、建安的书籍所刊刻。鉴于嘉靖丙寅刊本《荔镜记》，用泉、潮两部汇刻亦为建安书林刻本，“全相”本《金钗记》极有可能是福建建安的版本。现在提出这种推论，以待今后文物图书的发现和寻求。

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宋代以来各地方言乡音杂陈。金、元时期的北杂剧由于北方民族语言混杂，后人称之为夹以“胡语”，实际上是北方各民族多种语言融合的反应；宋、元时期兴盛起来的南戏，也是由于南方各地语言不同，竞相以方言乡音进行演唱。在这种情况下，因而有提倡用所谓的“正音”或“正字”语言规范的主张。元代中期的泰定年间，周德清著的《中原音韵》一书中，提出以中州的语言为准绳作为全国的正音。他在自序中说：“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自秦代以来，中国文字已经统一，但是方言语音却仍然是因地而异的。周

德清认为是可以划一的，他说：“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这样才能使得戏曲艺术“字畅语俊，韵促音调”以便“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到了明代初年，这种主张得到很大的提倡。明代沈宠绥在他的《度曲须知》中说：“明兴，乐惟式古，不祖夷风。程式则四书五经为式，选举则七义三场是较，而伪代填词往习，一扫去之。虽词人问踵其辙，然世换声移，作者渐寡，歌者寥寥，风声所变，北化为南，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竟以传奇鸣；曲海河山，于今为烈。而词既南，凡腔调与字面俱南，字则宗《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则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平之殊派。”他又说道：“至《洪武韵》虽合南方，而中间音路未清，比之《周韵》尤特甚焉，且其他别无南韵可遵，是以作南词者，从来俱借押北韵，初不谓句中字面，并应遵效《中州》也。”古代戏曲剧本创作中的曲文歌唱部分，大都以中州音为标准，民间称这种剧曲叫做“官腔”，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以闽南音系为主的地区，把这种以中州音系的戏曲叫做“正音戏”或叫做“正字戏”，至今在闽南、粤东一带地方还仍然保存着这种古老形态的剧种，而称本地方言乡音演唱的戏曲叫做“白字戏”，以示区别。宣德写本《金钗记》的书目标题“正字”，就是上述历史的证据。至于宣德写本《金钗记》标明“南北”二字的意义，亦由上述此种意义发凡，即是南北各地通行的正音正字的补充，不能作为南北曲或南北合套的意义去解释。宣德写本《金钗记》纯用南曲演唱而无北曲插入的事实，更是明白无误地证明这种道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戏曲刊本，往往以这种“正音”“正字”的曲文体制，作为“天下时尚”、“南北官腔”，并以这样的醒目标题，竞相称呼。比如：《新刊徽板合象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六卷、《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崑》四卷、《新选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二卷、《精选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二卷、《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谱大明春》六卷等等都没有南北曲合套的意思，而是沿习至迟宣德时期已普遍实用的南北各地通行的“官腔”，亦即以中州音系的“正字”为“正音”的戏曲剧本标准化而普遍流传各地。宣德写本《金钗记》既然是以“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标榜的刊本作为底本的重写本，由于闽南粤东的方言习俗所限，在它的艺人演出本中添加方言错杂乡音，自是难免的了。正如沈宠绥

在《弦索辨讹》序言中说的“南曲向多坊谱”的情况一样，就不足为怪了。

三

南戏剧本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抄写方式是连续不断的，均未标明出数场次。宣德写本《金钗记》却已明白无误地标明出数，每出戏文之前写有“第某出”三字，表示剧情变化的场次。由于写本出土时已有缺残，在校录整理工作中，为了便于检查阅读，在出数之后拟定四字或三字作为标目来表示剧情的内容。

列目如下：

第一出	家门大意	第二出	感怀述志
第三出	双亲庆寿	第四出	家人劝试
第五出	雇请伴当	第六出	刘公迫试
第七出	剖钗折镜	第八出	拜辞父母
第九出	伴当随从	第十出	洗马桥别
第十一出	登程上路	第十二出	停针思夫
第十三出	状元及第	第十四出	曹相遣媒
第十五出	肖氏问卜	第十六出	彩楼招亲
第十七出	文龙拒婚	第十八出	曹相怒斥
第十九出	肖氏忆夫	第二十出	太行山寨
第二十一出	曹女病懨	第二十二出	奉使单国
第二十三出	托人寄书	第二十四出	肖氏怨夫
第二十五出	送书被劫	第二十六出	山寨毁书
第二十七出	迷路问讯	第二十八出	公主赏春
第二十九出	公婆打	第三十出	到达单国
第三十一出	单于招亲	第三十二出	强配公主
第三十三出	文龙诉愁	第三十四出	僮婢戏耍
第三十五出	吉公说媒	第三十六出	缺
第三十七出	缺	第三十八出	缺
第三十九出	花亭备宴	第四十出	单于赏宴
第四十一出	刘公劝嫁	第四十二出	公主秘计
第四十三出	肖氏祭灵	第四十四出	文龙圆梦
第四十五出	公主放归	第四十六出	超荐亡魂
第四十七出	公主别	第四十八出	缺
第四十九出	乔装逃走	第五十出	单于追赶
第五十一出	公主忆	第五十二出	随从被捉
第五十三出	文龙蹉路	第五十四出	约定婚期
第五十五出	回到京城	第五十六出	肖氏守孝
第五十七出	朝廷赐爵	第五十八出	宋忠纳聘
第五十九出	公婆迫嫁	第六十出	肖氏投水
第六十一出	太白神救	第六十二出	内使赍救
第六十三出	洗马桥会	第六十四出	探访吉公

第六十五出 合钗相认 第六十六出 宋忠自尽
第六十七出 全家团圆

全剧共分六十七出，由副末开场报告剧情叙述家门大意起始，到大团圆终止，有始有终，故事完整，可以说是继永乐大典本《张协状元》之后的一部南戏足本。宣德写本《金钗记》删除了四出戏，但从故事的完整来看，是无关大局的，实存六十三出。在场次安排上，写本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第五十一出，内容写刘文龙的伴当被单于捉去了，但是在第五十五出回到京城的路途上及以后的情节，这个跟随他多年的随从伴当又出现了，是不是单于把他放了，剧本显然没有交代清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写本因舞台演出的需要，对原刊本进行删改时，留下的不应有的痕迹。在语言文字上，这种删改的迹象就更多了，最明显的地方，莫如第四十六出中出现了“今据邓州府福建布政司邓州府南阳县”的错误，把属于河南的南阳县，说成是福建布政司所辖的地方。这种文字的增加，是写本中最明显的错误。不过这种妄自增加的文字，却给我们考察这个戏的流传，透露出一些消息，它不仅在广东潮州演出过，而且可能在福建地区流传，可能这位无名的抄写者就是一位福建的人民。

此剧的改本还有两种，故事情节有了很大的差异。一种是张大复的《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六册抄本中载有的《肖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抄本云：“一名刘文龙传。雍熙乐府第一种史敬德、马致远合著。”赵景深先生在《元明南戏考略》一书中说到京剧《小上坟》与此剧有关的一些情况。这是一种将祭灵重会的情节改为“祭坟重会”的另一种剧本，后来又有将重会的情节改为在坟台上重会的故事，就如京剧《小上坟》，那就更加附会衍变成与原来的意义完全不同的剧本了。另外还有一种改本，见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一书中所述的：“近发现清初人所作《说唱刘文龙菱花记》四卷，当与之同题材。叙唐刘文龙娶肖贞娘为妻，夫妇爱好，为后母所嫉。文龙上京赶考，贞娘碎菱花镜为二，各执其半，为将来信物。文龙病误试期，在京与妓女云娇相恋，遂留京待下届试期。后母乃诬称文龙已死，逼贞娘改嫁其内侄元仲。贞娘誓死不从，元仲百计谋娶，复逼死贞娘之父。贞娘诉官不得直，遂祭父母坟，拟自缢林中。适文龙已中状元，又平南立功，封爵归里，道遇贞娘，才得获救。夫妇复圆，恶人遂获报

云。”这种说唱改本易汉为唐，故事情节与宣德写本大不相同，这是清初人的说唱改本的情况，也反映了刘文龙故事在各地不同时期流传的变化。但是至今仍在演出的福建梨园戏却是仍然沿习着宣德写本的路子，故事情节完全相同，当系宣德写本《金钗记》的一种活着的遗响。可惜的是梨园戏《刘文良》，仅存老艺人何淑敏的口述本，又是后半部的几出戏的残本，而且曲牌唱词均已失传，在曲文方面无从据以核校。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可以与宣德写本《金钗记》进行比较和校订的只有《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所收注明“元传奇”的《刘文龙》一种的佚曲了。

四

《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以下简称《正始》）等南曲官谱收有南戏剧本《刘文龙》佚曲二十二支。钱南扬先生在《宋元戏文辑佚》（以下简称《辑佚》）中合为佚曲二十一支并加注评语。今据《正始》与宣德写本比较，写作校记如下：

1. 《正始》册一“女冠子”二曲

《正始》：“〔女冠子〕听说文龙，总角时百事聪慧。汉朝一日，遍传科诏，四海书生，齐赴丹墀。囟囟辞父母，水宿风食，上国求试。正新婚肖氏，送别嘱咐，行行洒泪。

〔前腔换头〕二十一载离家去，奈光阴如箭，多少爹娘虑。忽然回里，衣冠容颜，言语举止，旧时皆异。天教回故里，毕竟是你姻缘，宋忠不是。忙郎都看，小二觑了，疑他是鬼。”

宣德写本全剧通篇仅有《女冠子》曲文一支。曲文是：“（生旦上唱）〔女冠子〕百事聪明，都是男儿情性。（旦）富贵荣华，皆□□□定。”这支曲文在第六十七出全剧最后大团圆中出现，《正始》二曲中叙述内容，亦在本出其他曲文中有所表现，分别作为全家各人回事之辞。《辑佚》将《正始》二曲合为一词之上下阙，并注称“以戏文开场，副末报告戏情大意之辞。”而写本开场第一出中，并无《女冠子》一词，它的家门大意是：“觑得刘希必金钗记，即见那邓州南阳县忠孝刘文龙，父母六旬，娶妻肖氏三日，背琴书赴选长安。一举手攀丹桂，奉使直下西番。单于以女妻之，一十八载不回还。公婆将肖氏改嫁，□□□夜泪偷弹。宋忠要与结情缘，□文龙□□复续弦。古公宋忠……。一时为胜事，今古万年传。”文字写得完整，有始有终，不象《正始》以“忙郎都看，小二

觑了，疑他是鬼。”作结，未将剧情本事说完全，显然有始有终，与一般开场词所述家门大意体例不合。《正始》《女冠子》二曲，疑为剧终之辞而不是开场文字。宣德写本此曲亦非全曲，当系写本根据实际舞台演出的调变有所减改的迹象。

2. 《正始》册十“海棠赚”等四曲

《正始》：“〔海棠赚〕小玉听得，便取过三物与东人把为记。亲付与，身荣千万早回归。剖金钗，破菱花每半留君，根底弓鞋儿各收一只。他日归来，再合团圆共成一对。幸勿忧虑。

〔前腔换头〕文龙谙读诗书，是则是男儿四方志。爹妈在高堂，那更有少年妻。妾和伊，堂前请出公婆至，辞别后共伊分袂。人在东风，点点桃花乱红雨。我儿将息。

〔赛红娘〕我儿离家去，求显迹。爹爹赠与你盘缠费，金共珠。去时休得恋歌妓，忘故里。文龙焉敢恋歌妓，忘故里。

〔双蝴蝶〕爹爹赠与你金共珠，妈妈□与你布裙儿。急急往长安去，做官时阿娘也惭愧。愿得做个状元郎及第归。解元，莫忘奴表记时。”

宣德写本第七出继《斗宝蟾》曲文之后，有：“（旦白）奴家有三般古记，教小玉捧来。（小玉捧古记上唱）。

〔入赚〕小玉听得要，取过三般物与东人把记，亲付与，身荣千万早回归。（旦执古记唱）剖金钗折菱花每半留君，根底弓鞋儿各收一只，他日归期团圆再成一对。（生唱）幸多忧虑。文龙谙读诗书，是则男儿四方志，爹娘在家中，那更有少年妻。”《正始》“海棠赚”，写本作“入赚”，曲文基本相同。《正始》有“剖金钗破菱花每半留君”，误。宜从写本“剖金钗折菱花，每半留君”，予以校正。而写本“幸多忧虑”。乃字形有误，宜从《正始》校正为“幸勿忧虑”。《正始》之《赛红娘》，《双蝴蝶》二曲，写本无此曲牌名，作《梁州序》，大意相近，但无赠金珠、恋歌妓的内容，而是“只愿你身荣衣锦早归期，休恋豪家人匹配，只念奴心夫唱妇随”。《海棠赚》曲属双调近词，而《入赚》曲乃系越调近词，曲辞句式有所不同。

3. 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下简称沈谱）卷二所载《杜韦娘》一曲

《沈谱》题作《刘文龙》，曲文是：“终朝没情绪，眉黛尽敛愁如织。怕楚馆秦楼迷恋在，尚未有归来消息。忆当初风帐鸾帏，漫得三宵，怎道轻离拆。一番思，泪眼但搵透鲛绡数尺。”

宣德写本第十五出曲文是：“〔杜韦娘〕（旦上唱）终朝忆念，虚算时，香腮瘦脸蹙双眉，夫妻一去音信绝，未知何日归期。”

此曲，《沈谱》列入《仙吕慢词》。考此曲原为唐代教坊曲名，刘禹锡诗有“春风一曲杜韦娘”句，宋人以旧曲名，另翻新词，调见宋杜安世寿域词，其词分上下两阙，共一百零九字，起首四句为“四、七、八、七”句式。杜词：“暮春天气，莺老燕子忙如织，间嫩叶题诗哨梅小，乍遍水新萍圆碧。……”用这首慢词相较，可知《沈谱》首句增一“没”字衬字，而写本首句与杜词同作四字，但在首次句之间，增衬字“虚算时”三字。《沈谱》以词调之上阙入曲，写本却摘词调之起首四句入曲，两种作法不同，亦即宋词入南曲的两种方式，均因南戏的舞台演出的限制所决定。在宫谱中往往按照散曲完整性定谱，而摘句式的入曲法，则又是南戏实际演出的常用通例，这可叫做灵活运用不拘词格的南戏唱法。如前面引证的《女冠子》词的法，也是如此。宋词入南曲，宋元间的南戏歌唱变化的形式，于此可见一斑。故未可完全用后世宫谱校正写本的正误。其实写本真正保存了宋元时南戏运用词调入曲的原来面貌。

4. 《正始》册六《梧桐花》一曲

《正始》：“〔梧桐花〕荡炎威，新秋至。忽听得一声雁嘹唳，此景如何守孤帏。是处砧声动情绪，又被风撼梧桐树。”

《新编南词定律》卷十，此曲作《梧桐叶》。

宣德写本第十九出作《二犯梧桐树》，曲文是：“暑渐消，新秋至，暮……雁□泪，对景恹恹怎生存济，日夜孤眠景物岑寂，风吹动梧叶飞，未知情人何日得归期。”为肖氏所唱之辞。

考《南词新谱》无《二犯梧桐树》一曲，有《梧桐树》与《梧桐树犯》二曲，均以“五、五”字句起始。按写本此曲句式，应是《梧叶儿》本曲。此曲在商调过曲中变体数种，写本作“二犯”可能是明初民间演唱中的一种变调，不载于宫谱。然曲文与《正始》基本一致，曲牌名目称为《梧桐花》或《梧桐叶》，也无定格于后世宫谱，故写本与《正始》本所载此曲，均系宋元旧曲之演变，其渊源或来自词调《梧桐影》或《梧叶儿》。

5. 《正始》册二“恋绣衾”等四曲

《正始》：“〔恋绣衾〕对酒当歌，问柳寻花，风流少年相宜。凤盞龙饼，捧劝共饮情舒。闲把琵琶自拨，管别是一般风味。全胜是三岛十洲，

且教无事繫系。

〔前腔换头〕携手，尊前共语，又何必剪发，说下盟誓。幸遇仙姿，相爱我们聪慧。两两鸳鸯意美，休便想巫峰十二。尘寰少依，约乘鸾共伊齐返天际。

〔薄媚衰〕春共赏，花坞柳堤，尽日挤沉醉。归院宇，如比翼效鸾俦。夏日凉亭，沉李浮瓜。双双鸳鸯共同戏水，绿盖盈盈，荷花解语。

〔不绝令煞〕才貌天然两相宜，姻缘到此情分美。爱惜似擎珠捧璧。

钱南扬《辑佚》注称：“这四曲同属一套。正始不绝令煞下注云：‘对酒当歌，是共过曲，’又，薄媚衰下注云：‘次曲同，不录。’此套恐怕就少引子和咏秋冬的薄媚衰一支，其他都全了。”

在宣德写本第四十出中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曲文，有引子，也有尾声，今摘录如下：“（生贴上唱）〔粉蝶儿〕天与荣华，生居帝王宫里，如花似玉芙蓉面，柳腰娇媚，奏乐笙歌深庭院里。（贴唱）

〔排歌〕晓来几阵、催花雨歇。园林景物添明媚，千红万紫斗芬菲，满目亭□锦绮名园□。（合）我与你，浅斟低唱泛金龟。双双醉，携手归，归来鸳帐效于飞。（生唱）

〔前腔〕把盏又见，石榴金焰。威盛时拆鬲柳，乍闻蝉声咽……又听□菱歌声韵美凉亭上。（合前）（外唱）

〔前腔〕到秋来，暑□收，渐觉……飞，牛女会佳期，木□花喷黄菊……碧天如下……蟾□似□高袖上。（合前）（众唱）

〔前腔〕小春时节气命催，四野□□雪花飞，朔风凛□送寒威，晓来江上景堪题，鱼人披带笠蓑归，江梅昨夜漏消息，料想偷闲三两枝红炉畔。（合前）

〔尾声〕四时景物堪欢会，暮乐朝欢镇假随，永远教人佐话题。”

这是单于赏宴百花亭的时候，刘文龙、公主与单于等分别所唱之辞。与《正始》佚曲四支相较，曲牌是不同的，但辞意是一致的。《九宫大成》卷四十三，题为《散曲》，入高大石调，或有所据。按宣德写本排歌四曲，据《南词新谱》卷一《仙吕过》曲有两种，一为四字起的《羽调排歌》，与宣德写本《排歌》之第一、第二支格调相同；一为三字起的《三叠排歌》，又名《道和排歌》，与宣德写本《排歌》之第三、四支格调相近。这两种排歌，

均为宣德写本中所用。又《正始》佚曲中有“全胜是三岛十洲”句，在宣德写本第三十九出中有“十州三岛”句，为百花亭排宴时之辞句，与第四十出之曲文连贯而下不可分离，俱是刘文龙在单于宫中饮宴时的写照。

6.《正始》册九、册四《得胜令》等六曲

《正始》册九：“〔得胜令〕细看取诸余风味，是文龙面目所为。当初是少年，想风霜万千尽历。爹悬望，共着媳妇，朝夕尽泪垂。且说如何，一去许多时，不念爹娘各年纪，你莫是胡称我儿。请出娘子相见，共他略相叙。各仔细，既同谐鱼水，岂不略相识。请出媳妇须教至，方知此事真端的。宋忠不信，死了重出人世。思量著怎么不呕气。千拜万拜，又复敢夺吾妻。

〔前腔换头〕告仁兄宁息，我和你在此怎知。今宵成宴席，怎知他外方自归。一双手，两眼鼻，头也有髻，嗅我孩儿作我气，宋忠目即，合口自出气。娘子出来别是非，甚人敢不识道理。上有苍天，人世亦有官司处。能求直，聘妻还吾妻。你好没巴臂，大拼一命直甚的，阎王殿下都立地。按下身心，大抵休出言语。便是官人也留住，不是东君，怎托与花为主。

〔鼓板赚〕奴在深闺，听得堂前甚鼎沸。丫鬟报道，儿夫果是早回归。嫂嫂觑，我儿文龙是不是。自别你三般为表记，千山万水但不离，随身带取。好也跷蹊。

〔前腔换头〕娘子幸有三般记，取出合合见端的，真的怎灭。夫妻岂是今生契。不怨你，土木之人也猜疑，看取三物便合知。三物这里果焦地，天教你归。断吾绝寄。”

这四支曲子写刘文龙回家正好赶上宋忠要骗娶肖氏之日，当众拿出三般古记作证，使宋忠奸计不能逞，夫妻卒以相认。宣德写本第六十五出正是以这段故事的情节开展的一场重头戏。《正始》曲文过简，而写本敷衍甚详，曲牌安排不一样，曲文说白自有略详之别。

《正始》册四：“〔念佛子〕自一到帝里，即得入试闱。试才毕灵祠求许，梦占的魁名及第。当时，得意归途，见使臣急至。亲染御书，说单于小国，愿求和议。迤迳，登山渡水，奉使直见虜主。留在彼，将女妻，封为左贤王职。当初去时，怎便不发一家书，遣仆人报取。事因如是。

〔前腔换头〕谁知，往番地，遣仆人家书与归。只说道名已高，便指望随即回归。谁知，此

处音信，杳然无至。时光荏苒，二十一载，离家不易。脱得单于那里，朝见吾王大喜。高显职，加爵位，西川甚般荣贵。心中未足，今父母家里岑寂。幸然到此，正逢今夕。”

此两曲写刘文龙回家相认后，与家人回顾往事，彼此对答的情景。宣德写本最后第六十七出大团圆，与此两曲文义相符。写本有《四边静》一曲，曲文是：“爹娘听拜启，当初去赴试，蒙恩进明姬，番王留为□，感蒙公主恩，放我回乡里，多谢贤孝妻，肯□我节义……。”无《正始》所载之《念佛子》曲牌，亦无“单于小国，愿求和议”等贬词，全剧均甚尊重单于，与此不同。想系《正始》为明人改纂进行修饰之文，写本根据当系元代南戏剧本原貌的迹象，于此可以概见。

7. 其他三支佚曲

《沈谱》卷二十：“〔元卜算〕文龙拜别登歧，爹妈休得过虑。孝顺公婆老，成名天下知，焉敢顿忘伊。”描写辞别父母登程上路之词，查宣德写本第八出，意有相似，而不载此曲。《九宫大成》卷三，此曲入仙吕，题作《散曲》。俟考。

《正始》册八：“〔元卜算〕天色晚日沉西，休得只管踟躇。试期将近也，离城已是迟，赶上迭恐虚费。”查宣德写本第十一出，有此意境，但无此曲。

《正始》册九：“〔牧羊关〕初相见如鱼似水，止三日共成姻契。只因这黄榜招贤，贤良到彼，便相别往长安试。远涉三千里，一去无消息，到如今不见归。”此曲当是肖氏思念文龙之辞，宣德写本中肖氏思夫屡见，意义多有相似，但无此《牧羊关》一曲。《九宫大成》卷十八，此曲入大石，题作《散曲》。俟考。

五

宣德写本第六十出有《罗江怨》曲四支，为肖氏与其婢小玉的对唱。其第一支曲文里：“□□□渐浓，谁来和哄。春思夏感秋睡冬，满怀愁闷分付与天公。天有何私，把我恩情送。恩多也是空，情多也是空，一事南柯梦。”考此曲为《沈谱》卷十二、《新谱》卷十二、《九宫大成》卷五十一俱载，题作《散曲》。《新谱》注称：“徐稿作林招得传奇。”钱南扬《辑佚》列入南戏《林招得》之佚曲，其按语云：“所谓徐稿，就是和钮少雅同编九宫正始的徐庆卿的稿件。当时徐有意编谱，收集了一批元朝的材料（见正始钮氏自序）。”说明此曲是徐庆

卿收集的元代南戏《林招得》的一支佚曲，《新谱》卷十二所载的曲文是：“〔香罗带〕恹恹病渐浓，谁来和哄。春思夏感秋又冬，满怀心事诉与天公也。〔一江风〕天有何私，把我恩情送，恩多也是空，情多也是空，都做了南柯梦。”其曲文与宣德写本完全一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此曲是《林招得》的还是《刘文龙》的？现在南戏《林招得》无原本可查，宣德写本确有此曲四支作为《金钗记》的一出戏，当系来源于《金钗记》，恐徐庆卿所收集的佚曲传误所致。但诸谱均称为“散曲”，又恐系《金钗记》亦据旧散曲而入南戏。即使不论上述两种情况孰是孰非，然而皆足以说明一点，即宣德写本《金钗记》确为元代的南戏剧本，殆无疑议。

宣德写本第二十二出有《水底鱼儿》一曲，曲文是：“得君恩旨，文龙朝圣捍。□使驾命，随即不敢违。赤心报国，龙颜须大喜。官高任选‘封妻得荫儿。’”曲文句式为四五言八句体式，与元代南戏旧制完全相符。《新谱》卷十六，注云：“此调，细查琵琶、拜月诸旧曲皆如此。……今人但知有四句，盖因唱者懒唱八句，故作词者亦只作四句以便之。遂认旧曲八句者为二曲矣。末后一句，可以俗重迭唱。”说明《水底鱼儿》一曲，在元代和以后的明代，在演唱作词上是有变化的，存在着八句与四句的区别，故可证明宣德写本当系习用元代南戏演唱旧制，直到宣德年间仍然如此，则四句式的演唱方式，当系宣德以后出现的新变化。

宣德写本第二十八出有《风入松慢》一曲，曲文是：“莺声初过小帘栊，花影□□，被他惊醒游仙梦，披衣起云鬓斜松。欲得寻花问柳，争奈怨绿愁红。”《新谱》列入双调引子，注云：“今人不知此调为引子，皆以不须提起蔡伯喈音调唱之谬甚矣……识曲者能几人哉。”又称此曲“与诗余同”，即与宋词一致。说明明代中期以后，已不知此曲为引子了。但在宣德写本中，却是遵照古南戏旧制的，此曲不仅句式字句与词相符，而且是贴旦上场的引子曲出现的，于此也可证明宣德写本为元代南戏的剧本，而没有明代以后演唱南戏的习俗，仍然保持元代时期南词演唱的风格特征。

宣德写本有残文载《黑麻序》曲四支附于剧本之后，咏唱春夏秋冬四季，可称为四季歌。按《黑麻序》亦即《黑嘛序》之误。春、秋、冬三曲残

其咏夏之第二支，曲文完整，曲文是：“榴火金焰，洪波滚浪龙舟闻唱菱歌。叹忠臣屈原投水汨罗，贬拙。青红五彩结，沉浮堕水波。应端午，共赏凉亭同饮蒲酒看新荷。”按此曲以四字句式起调，其法为早期南词体例，明中叶以后之南曲多用其二字换头，而不知其本调，亦足说明宣德写本保存宋元南曲的固有形态，是比较完整的也是难得可贵的。《新谱》卷二十三，列入仙吕入双调过曲，载有“旧传奇”《琵琶怨》之《黑蟒序》一曲，其曲文是：“习习东风，卖花声吹入小小帘栊。被流莺唤起绿窗幽梦。烟笼，萋萋芳草茸，苍苔乱红。（合）锦机空，为这东君昨夜横雨狂风。”与宣德写本比较甚相符合。《新谱》注云：“此曲起调与换头本不同，今人但知其换头，而不知其本调矣。旧谱误作斗虾蟆，且止录其换头一曲，何以称谱哉。”按旧传奇，即古南戏剧本《琵琶怨》，亦仅存此曲，其余皆失传。宣德写本录存此曲四支，乃为古南曲难得之佚曲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支“唱四季”的《黑蟒序》，应该看到

它与剧本演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南戏作为戏剧艺术，它的演出形式必须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然而在剧本中往往将演出时的艺术处理予以省略，但是在实际演出上是必需的，比如“断送”，就是戏剧进程中一个段落之间，即出与出之间，人物出场入场之间，往往有个时间的间隔，这时就用“断送”之曲予以补充。北宋的杂剧演出即是如此，据《武林旧事》一书的记载，用“唱四季”作为断送的例子有：“杂剧何晏喜已下，做杨饭，断送四时欢。”“勾杂剧色吴国宾等，做年年好，断送四时欢。”此种“四时欢”，即唱四季的曲子，在宋代南戏《张协状元》第二出中亦用断送，“生：后行子弟饶个烛影摇红断送。众：动乐器。”同一剧本中有：“出入须还诗断送，中间惟有笑偏饶。”的说法。断送，在《张协状元》中又叫“撺掇”，也作“撺断”。可见宣德写本《金钗记》中的“唱四季”乐曲和这种作为断送的演出形式，看来是与宋杂剧、宋南戏的演出形式是一脉相传的。



犊鼻褌考

董志翔

《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师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犊鼻，故以名云。”《史记》本传韦昭注：“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者矣，称此者，言其无耻也，今铜印言犊鼻。”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吴越春秋》，越王服犊鼻，
《广雅》松，褌褌也。《方言》无褌褌谓之褌。郭云：褌无跨者，即今犊鼻褌。褌亦褌字异耳。案《说文》褌，绔跨也，
《急就篇》颜注，褌之两股曰褌。《玉篇》褌，褌裆也。据此形制，但以蔽前，反系于后，而无褌裆，即吾楚俗所称围裙是也。”

王之说，新版《辞海》“犊鼻褌”条亦承之，意觉不妥，当以颜注、韦注为胜。“犊鼻褌”即内著之短裤。

一、褌应有裆。《释名》：“褌，贯也，贯两脚上系要中也。”《急就篇》“褌”下颜师古注：“褌合裆谓之褌，最亲身。”《广雅》：“褌无裆谓之褌。”《说文》段注：“今之套褌，古之褌也，今之满裆褌，古之褌也。”纵观之，王以“褌无裆”，实为无据。

二、褌又可分为有褌无褌。《方言》：“无褌之褌谓之褌。”郭注：“褌无跨者即今之犊鼻褌也。”《说文》段注曰：“《方言》曰：‘褌，齐鲁之间谓之褌，或谓之褌。’郭注：‘今俗呼褌跨为褌。’按，绔跨对下文绔上言，褌之近足狭处也。”又《方言》钱绎笺疏：“今吴俗谓褌管为褌，音如统，即褌字。”均以褌为褌管。

合上观之，犊鼻褌当为无褌管合裆的贴身短裤。

茅盾小说的语言艺术浅谈

庄 森

茅盾是中国现代一位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这里想就茅盾的小说中的描写语言、叙述语言、人物语言等方面谈些肤浅之见，以求抛砖引玉。

—

文学作品离不开描写，而不论是景物描写、环境描写还是人物描写，都是由描写语言构成的。

茅盾的小说极为注意描写人物的心理，常通过心理刻画，展示人物的内心和感情，揭示人物的个性，使人物表现完整、丰满、有血有肉。例如：

粘着她的人有这么多，真心爱她的有一个么？如果不事苛求，该早已有了恋人，该早已结了婚罢？然而不受指挥的倔强的男人，要行使夫权拘束她的男人，还是没有的好！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青春剩下的不多，该早打定了主意罢？但是有这般容易么？她觉得前途是一片灰色……“二十四岁了”！她心里反复说：“已经二十四岁了么？我已经走到生命的半路了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象飞一般过去，是快乐，还是伤心呀？”她努力想捉住过去的欢乐的片段，但是刚想起是快乐时，立即又变为伤心的黑影了。她发狂似的咬着被角，诅咒这人生，诅咒她的一切经验，诅咒她自己。（《茅盾文集》1卷27页）

这是一位不愿沉沦的小资产阶级女知识分子狂欢后的心理状态。作者依据人物的个性，拟摹人物的口吻，把人物的内心感受溶化在客观的叙述里。既是第三者简朴的叙述，又缜密地写出人物心底的思想，表现得明快、真实：她想有“恋人”，但又怕有“男人”；希望有人爱她，却又怕有人“拘束”她；不想有“男人”，可又怕“青春剩下的不多”。人物这种复杂的感情，在作者笔下表现得多么鲜明，淋漓尽致，给读者很深的印象。与此同时，作者还用自问的句式，让人物直吐内心感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半路”，“是快乐，还是伤心呀？”流露出惋惜、矛盾、悲观的感情。在这个基调上，作者进一步描述了人物内心波动引起的外在表现：“发疯似的咬着被角”，“诅咒自己”，这样就非常细腻、深刻地展示出人物的内心矛盾、表现出人物脆弱的个性。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茅盾是通过状写人物心理的变化波动，来刻画人物的个性，她好象钻到人物的心里去，缜密、真实、深刻地描述人物心理活动的产生、变化、

发展及结果，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层次鲜明地剖析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循着作者铺设的桥梁，进入人物的内心。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样的描写不是静止的，冗长的，而是变化的，简洁的，自有一种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例如：《子夜》中对灰色教授李玉亭的一段描写：

这小客厅另有一扇通到花园去的侧门。李玉亭很想悄悄地溜走了完事。但是一转念，他又觉得不辞而去也不妥。忽然一阵哄笑声从外边传来。那是大客厅里人们的笑声！仿佛那笑声就是这样的意思：“关在那里了，一个奸细！”李玉亭的心跳得卜卜的响，手指尖是冰冷。蓦地他咬紧了牙齿，心里说：“既然疑心我是侦探，我就做一回！”他慌忙走到那通连大客厅的门边，偻下了腰，正想把耳朵贴到那钥匙孔上去偷听，忽然又转了念头：“何苦呢！我以老赵的走狗自待，而老赵未必以走狗待我。”他倒抽一口气，挺直身体往后退一步，就颓然落在一张椅子上。（《茅盾文集》3卷290页）

李玉亭上门找吴荪甫，原是要给吴荪甫“忠告”，是满怀忠心的。可主人有事，让他“坐冷板凳”，于是他的心绪开始变化，先是“无聊”，继而变得不安，随后自疑主人对他“有了戒心”，他自想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于是觉得冤屈，归咎为自己“太热心”，加重了自疑的心情，上面的一段引文，就是描写他这种心理的继续和变化的。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通过写主人家的笑声对李玉亭的心理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形象地突出他的自疑心理，巧妙地点出触动他的心理继续变化的因素。因为他有自疑心理作怪，才把主人家与他无关的笑声疑为是讽刺和嘲笑他，可怜的自尊心才被深深刺痛，促使他的心理产生新变化：仇视主人，现出一种病态的倔强，要进行报复，做一回“侦探”，并且立即就动作，但还未侦探到什么，决心就动摇了，觉得替别人做侦探对他没什么好处，便“颓然落在一张椅子上”。这样的心理描写，把一位多心、软弱、自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景物描写方面，茅盾不是使用富有色彩的词语，直接去描写景物，展现景物的形状，而是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运用拟人、比喻的艺术手法，赋予景物某种活脱脱的动作形态，使景物表现得异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含有一种感情色彩。例如：

天空挤满了灰色的云块，呆滞滞地不动。淡黄色的太阳光偶然露一下脸，就又赶快躲过了。成群的青蜓在树梢飞舞，有时竟扑到绿色的铁纱窗上，那就惊动了爬在那里的苍蝇，嗡的一声，都飞起来，没有去路似的在窗前飞绕了一会儿，仍复爬在那铁纱上，伸出两只后脚，慢慢的搓着，好象心事很重。（《茅盾文集》3卷183页）

这里，作者运用“挤满”、“躲过”、“扑”、“搓”这四个动作强烈的动词和“呆滞滞”、“偶然露一脸”，“好象心事很重”这些神态鲜明的词语，描写没有生命的云块、太阳，没有心事的苍蝇，使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动态，活泼的神情，形神兼备，创造出明显的动感及浓烈的气氛，使环境表现得具体形象，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表现出一种沉郁的气氛，衬托出人物的心境。

莫泊桑说过：“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

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使对象的性质鲜明。”（莫泊桑，转引自《文艺理论学习资料》上册5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茅盾的小说非常注意“用一个动词”准确地描写人物的动作行态，表现人物的神情变化，使“对象生动。”例如：

老通宝忍不住也咽下一口唾沫，嘴角边也掠过一丝艳羡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沉了脸色，……
（《茅盾文集》7卷312页）

这是神态描写。因为闹饥荒，老通宝一家很久没充饥的食物了，烧饼当然更为奇罕，所以，老通宝看到孙子手中的烧饼，便忍不住想咬几口，但孙子已将烧饼塞进嘴里了，他只好“咽”下唾沫。孙子吃得那样香甜，他心里自然高兴，本能地又有些“艳羡”，嘴角便“掠”上欢喜交织着解嘲的微笑，可想到烧饼是他视为“白虎星”的荷花给孙子的，又不由得有些嫉恨，脸色“沉”了下来。“咽”、“掠”、“沉”这三个动词，不但象浓浓的彩墨，绘出人物的神态变化，现示给读者，而且勾勒出了人物的内心波动，使读者能从人物的神态变化中窥见人物的内心。

茅盾小说描写场面，也善于选“用一个动词”，“从几个角度”，“错综交叉地写”。（《茅盾评论文集》上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有平视，有鸟瞰，使场面表现得层次分明，生动逼真，有声有色，富有立体感，且寓有作者主观的贬褒感情。例如：

吴荪甫忽又暴躁起来，不等屠维岳的回话，就钻进了汽车。保镖的老关在司机旁边坐定，那汽车就慢慢地开出厂去。两扇方铁梗的厂门一齐开直了，李麻子在旁边照料，吆喝他的手下人。但是那汽车刚到了厂门中间，突然厂外发一声喊，无数女工拥上前来，挡住了去路。立刻沿这厂门四周一带，新的混乱又开始。警察、李麻子和他的手下人，都飞跑着来了；可是女工们也立刻增加了两倍，三倍，四倍，五倍，——把厂门前的马路挤断了交通，把吴荪甫连那汽车包围得一动也不能动。车里的吴荪甫卜卜地心跳。（《茅盾文集》3卷424页）

这是很成功的场面描写。“拥”、“挡”、“挤断”这几个有感触的动词，突出地描绘出女工奋勇冲击的情形，构成一幅如同现实的图象，使人读起来感染到一种激动的情绪。“钻”、“吆喝”、“飞跑”这几个有感触的动词组成的句子，表现的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慌乱的动作行为。整个场面的描写，有平视，有鸟瞰。开始平视，从纵的方面描写，观察点在汽车上；从写吴荪甫起笔，到写女工冲击厂门时止。后面是鸟瞰，从横的方面进一步描写，视线扩大，场面描写也随之扩大，写到了“厂门口四周一带”的情形。最后的落目点又是汽车。这样描写场面，既生动形象化，富有爱憎色彩，又层次分明，杂而不乱，首尾一致，给读者深刻的艺术感染。

二

叙述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粘合剂。它把作品中各色各样人物的截然不同的对话粘在一起；它又是具体地传达人物的各种感受，人物的复杂的纠葛关系，人物的“历史”，揭示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的重要手段。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它，流露作者的感受更离不开它。一般说来，叙述语言在极大程度上体现着作者的语言风格。

冷静中透射着鲜明的贬褒感情，这是茅盾小说叙述语言的突出特色。往往是这样：作者叙述某种事实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准确的表达，而在选词造句上，却包含着作者个人对事实和事实的创造者——人物的褒贬态度，使表现出来的事实富有或褒或贬的色彩，人物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更加深刻。例如：

自从四十岁上，他生了一位宝贝儿子以后，他那种贪财吝啬刻薄的天性就特别发挥。可惜他这位儿子虽名为“家驹”，实在还比不上一条“家狗”，因此早该是退休享福的曾沧海却还不能优游岁月，甚至柴米油盐等琐细，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茅盾文集》3卷95页）

作者把“家驹”说成“家狗”，对曾沧海的“宝贝儿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和嘲笑。“他老人家”“早该是退休”，但却“不能优游岁月”，还要操心“柴米油盐”，这些庄谐杂揉的句子，包含着极大的嬉嘲，用来叙述曾沧海，是对他的僵化守旧的尖锐讽刺。在造句上，作者表面似乎竭力装出一副严肃的脸孔，使用严肃的口吻，但实际上却精巧地运用复句关系，进行对比叙述，表现了嘲讽的感情，同时也揭露了曾沧海外强内弱，家庭腐朽及他可憎的老朽面目，使读者能准确地认识人物。

茅盾介绍人物的叙述语言，切合人物的身份、个性和经历，同时也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叙述，总是紧扣着作品的情节及人物的性格的变化发展。既发展情节，又精炼地表现人物的“历史”，人物的内心，突出人物的个性。例如：

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运命好象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家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也正象“陈老爷家”在镇上为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

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也有几分相信。（《茅盾文集》7卷281页）

这里，作用采用适合人物沉重心情的迂缓的语式，摹拟人物的口吻，借用老通宝的习惯词语，叙述了老通宝家的兴衰，揭示老通宝生活的家庭环境及影响他的性格形成的因素，使读者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人物的个性核心。

我国现代作家的小说介绍初次登场的人物，多是采用概括叙述的手法：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使用简炼的语言，对人物的经历、性情、习性以及他们和别人的关系，做一个扼要的、综合的说明和分析，让读者对人物有总的初步的印象。茅盾小说的人物介绍另辟蹊径，别具风格。他善于使用评议式的语言来叙述介绍人物，把客观的叙述和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剖析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叙述介绍人物的同时，剖析人物的心理，使读者不但知道人物的历史，而且由表及里，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全面、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例如：

这胡国光，原是本县的一位绅士；两个月前，他还在前街的清风阁茶楼馆里高谈吴大帅怎

样，刘玉帅怎样，虽然那时县公署已经换挂了青天白日旗。他是个积年的老狐狸。辛亥那年，省里新军起义，占领了楚望台的军械库，吓跑了瑞征以后，他就是本县内首先剪去辫子的一个。……他仗着一块镀银的什么党的襟章，居然在县里开始充当绅士。直到现在，省当局是平均两年一换，县当局平均年半一换，但他这绅士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他是看准了的：既然还要县官，一定还是少不来他们这伙绅士；没有绅就不成其为官。他的“铁饭碗”决不会打破。所以当县公署换挂了青天白日旗，而且颇有些“打倒土豪”的小纸条发现在城隍庙的照壁上时，他还是泰然自若，在清风阁的雅座里发表了关于吴大帅刘玉帅的议论。（《茅盾文集》1卷101—102页）

这是人物介绍。作者选择有褒贬色彩的词语，使叙述带上主观的评判。说胡国光是“老狐狸”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否定和批判。作者还精心选用副词，突出句子的批判色彩。“仗着”、“居然”、“始终”、“颇有”这些副词的运用，使客观的叙述带上了贬意，流露出对胡国光的行为的讽刺和愤慨。在叙述人物行为的同时，作者还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准了”。

三

茅盾作品的人物语言，具有高度的个性化，不仅符合人物的阶级属性，而且具体地表现人物的个性，显示人物与众不同的经历、教养和心理、社会地位，使读者能够从人物的话语中，推见说话的人物。

如《子夜》的主要人物吴荪甫，是一位“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和‘王子’。”他说话的语气常反映出他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气，以及精明果断的个性。他的话常出现“立刻”、“一定”、“要”、“不行”、“不能”、“决不能”、“无论如何”、“非……不可”之类的副词和助动词，构成表示坚决、强调的语言形式，传达人物专横的个性。例如他知道别处工厂工人酝酿罢工的消息，马上找来亲信走狗屠维岳，询问他的纱厂的情形。他很担心工人罢工。当屠维岳给他“不一定”的回答时，他说：

维岳，“不一定”我不要听，我要的是一定！

屠维岳回答他，说要工人不罢工也能办到，但需“三天才能解决。”吴荪甫不让屠维岳说完，就“十分严厉”地说：

不行！工人敢闹事，我就要当天解决！当天！

吴荪甫对走狗说话是这种口气，跟银行大老板杜竹斋说话也用这种口气。为了吞并朱吟秋的工厂，鼓动杜竹斋给朱吟秋借款，阻止赵伯韬给朱吟秋“通融”，他一再对杜竹斋说：

竹斋，一定要招呼老赵拒绝！

不行！竹斋！不能那么消极！

竹斋，一定不能消极！叫老赵拒绝！

吴荪甫这些强硬，狠毒的言词，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同时暴露了他仇视工人的剥削阶级的本质及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残酷面目。

《春蚕》的主人公老通宝是一位固执守旧的蚕农。他的语言鲜明地突出他这种个性。帝国主义入侵，摧毁了民族工业，祸及农村。老通宝面对这种情形，发出感慨：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他认为邻居荷花是“白虎屋”，禁止儿子多多头和她说话。他这样警告多多头：

你再跟那东西多嘴，我就告你叛逆！

荒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家里没饭吃。多多头抛头露脸，带领村里的穷苦人去“吃大户”，老通宝知道后，“劈面就骂道”：

畜生，杀头胚！……

老通宝的这些语言，简短、朴实，而又非常生动形象，富有个性特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他愚昧、固执、守旧的性格。

茅盾小说人物语言的成功还表现在既合乎人物的身份、地位和个性，又能揭示人物说话时的心情，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是一位懦弱、善于经商的小商人。他亲自站柜台招揽顾客，兜售货物。一位乡下人在柜台前看伞，“放了伞”想走时，林老板连忙让步问道：

喂！喂！阿弟，你说多少钱呢？——再看看去，货色是靠得住的！

老主顾买东西，叫除去尾数，他“就从店员手里拿过算盘来算了一会，然后不得已似的把尾数从算盘上拔去”，嘻笑着说：

真不够本呢？可是老主顾了，只好遵命，请你多做成几笔生意罢！

林老板的这两段话，不仅写出了他善于揣摩顾客的心理做买卖的精明个性，还活画出他急于做成生意的急迫心情。

茅盾小说的人物语言还是“活的白话”，（茅盾《王鲁彦论》）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春蚕》中多多头的语言。他在溪边帮嫂子搬养蚕用具时，荷花叫他也替她“带一点儿”，他“笑着回答”：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多多头带着穷苦人上镇里“吃大户”，老通宝威胁着要活埋他，他“笑嘻嘻地回答”：

杀头是一个死，没有饭吃也是一个死！去罢！阿四呢？还有阿嫂？一伙儿全去！

这些话语全是信手从现实生活中拈来的，满是泥土香，但它又是文学语言，有很强的形象性，极准确地传达出多多头乐观、大胆的个性。茅盾小说的语言艺术，将和他的小说中灿烂的人物形象一样，永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

略谈谷柳在香港发表的剧作

杨玉峰

提起黄谷柳（1908—1977），人们很自然想起他的成名作《虾球传》。《虾球传》是谷柳在香港时创作的；而一般人谈到谷柳这时期的著作，焦点往往集中在这个长篇身上。其实谷柳同期还写了很多作品，其中尤以一些独幕剧更有很大意义和价值，可惜一向都没有人注意过。这里笔者试就所知，略为介绍一下。

据目前所知，谷柳在香港时至少有下列八个剧作：

- 1.《反饥饿》（活报剧）——《文艺生活》新15期（1947年7月），页6—9。
- 2.《前程万里》（独幕儿童剧）——《华侨日报·电影戏剧周刊》（1947年10月1日），二张三页。
- 3.《旗袍》（独幕剧）——《青年知识》27期（1947年11月1日），页2—6。
- 4.《未死的烈士》（独幕喜剧）——《华侨日报·文艺周刊》51期（1948年2月15日），三张三页。
- 5.《长命百岁》（歌唱喜剧）——《华侨日报·文艺周刊》58期（1948年2月29日），三张三页。
- 6.《明仑江畔》（歌剧）——《华侨日报·文艺周刊》55期（1948年3月14日），三张三页。
- 7.《破碎的蛋》（童话剧）——《青年知识》32号（1948年4月1日），页2—4。
- 8.《生命的幼苗》（独幕剧）——《文艺生活》海外版9期（1948年12月25日），页44—50。

《反饥饿》是一篇爱国意识很浓厚的活报剧。所谓“活报剧”，简称“活报”，有“活的报纸”的意思；是一种用连写手法迅速反映时事的戏剧形式。《反饥饿》是以三个场景组成，内容主题环绕“反饥饿、反内战”，“要饭吃、要太平”这中心开展的。第一场叙述爱国青年学生在街头到处张贴“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但受到有关当局雇用流氓打手的恐吓和袭击，甚至有些因此而牺牲了。然而这些暴行却不能阻止学生爱国的行动；结果流氓反被学生热诚感动，明白到大家都是被压迫的一群，要想生活安居乐业，必定首先大家团结一起，争取和平。于是流氓也加入了学生的队伍。第二场描述群众游行请愿队伍和警察对峙的情况。警察坚守“阶级服从”的原则，不让群众越雷池半步；而学生怀着满腔热

情，勇往直前：“同学们，我们的路很艰难，但是，我们又前进了一步了！我们的许多同学流了血，但是我们没有辜负他们为和平奋斗牺牲的苦心，我们正踏着同学们的血前进！”场面非常激烈，双方互不退让，结果引起纷争，酿成打斗，而有些学生被捕了。《反饥饿》第三场描写被捕教授夫妇和学生等人在监狱的状况。群众虽然身在囚笼，却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反教守卫的警察无地自容。最后，作者借学生丁的口，说明“新”中国的诞生，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在《反饥饿》里，谷柳塑造了一群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爱国学生，他们崇高的形象，象征了中国新生的一代就如中国一样，是充满希望的。反观那群没良知的警察，处处讲求“阶级服从”，讲求纪律，一副奴才的嘴脸；和那班热情的学生比较起来，对照实在很尖锐！

《前程万里》是一出很有意思的儿童剧。内容叙述一间学校除了开设日校课程外，并且附设夜校，免费招收贫苦孩童就读。日、夜校学生代表两个阶层；前者是生活安定的孩子，后者则是些白天要干活的儿童。学校的老师极力去调和这两个阶层孩子的矛盾，使他们有平等的读书机会，共同创造美好的前程。

很明显，《前程万里》代表了谷柳的一点理想，祈愿任何阶级的孩子，都有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谷柳创作这剧，毫无疑问是有感于当时香港象“虾球”这类流氓般的孩子实在很多，他们本质不坏，如果加以适当教育，一定能在社会造一番事业。其实谷柳注重儿童教育，不单止学校生活，而且还留意到儿童的读物问题。例如他写过一篇名为《对连环图画检讨》的文章，详细考究了连环图种类以及对孩童的影响，“目的是引起关心教育、关心儿童教育的人们的注意。希望优秀的画家、小说家、有远识有良心的出版家，注意这个广大超过想象以上的市场，倾力去教育并拯救我们的新一代。”（载《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第15页）

《旗袍》是一出刻画人性的独幕剧，故事叙述一群青年学生在校友同乐会上采排时，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学生因使性子不穿旧旗袍戏服，结果自暴其丑，角色临时被替代了。作品的意图，正如作者在篇前的《说明》里说：“在这里我介绍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她跟那群热情的同学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爱工作比爱衣冠（外形的美）深厚，她却相反。她跟她的许多在学校内外的同道们，同样忽视了内在的美的因素，忽视了精神生活的修饰和充实。很显然的，这种对内在精神生活抱着满不在乎态度的人，可能成为任何有意义工作的一种赘累，而不是一种帮助。”毫无疑问，《旗袍》是针对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而创作的。

《未死的烈士》虽注明是一出喜剧，但不如说它是一幕讽刺剧更来得恰当。剧中叙述一个小县城为了纪念在前线打仗死了的本县烈士，于是由乡人每人捐出三十担谷来建造一座忠烈祠。正当祠堂落成举行典礼的日子，发觉原来所谓已死的烈士其实并未死；而建烈士祠只不过是议长县长借题发挥、从中谋便宜的借口而已。剧情虽然很简单，但作者对统治阶层那种丑恶嘴脸，和乡民的无知、无奈，实在刻画得很有深度。

《长命百岁》主要是以歌唱为主的剧作，故事以“三百年前广东明仑江畔”作背景，借一个渔翁和两个青年农村男女亚根、秀姑的相遇，唱出封建社会制度的逼害和农民百姓生活的苦况：

渔夫：一百岁唔死有新闻听，

今年皇帝嫌命长。

女仔征去陪鬼训，

男儿捉去运军粮。

三千少女太悲哀，

十万壮丁唔回来！

老夫打鱼逃乱世，

龙门港外避官灾。

亚根：明仑江水长年流，

耕田男儿未出头，

征粮征丁租税重，

有心无力作良谋。

强征女子入宫，抽壮丁、征粮、重税等，都是传统农民百姓的负累，又岂只是渔夫、亚根、秀姑的烦恼呢？《明仑江畔》是《长命百岁》的续篇。剧中说皇帝派遣钦差官兵四出搜捕美丽女子入京；秀姑为保全贞节，迫得自毁容颜。很明显，作者通过秀姑的坚贞举动，反映了统治者的残酷和扰民。何况除了秀姑外，还有多少无辜的女子受到无理的摧残呢！

《破碎的蛋》虽说是一出童话剧，但意义绝不幼稚，反而有点深晦。故事假借“米”少年、“蛋”小姐、生物学专家和人面老虎（大概是指资本家）等角色，批评当时的经济情况。专家不被重视，结果米价暴升、鸡蛋外销，养鸡的人和专家生活反落得没餐温饱，只有资本家才有得益。这种经济不均的现象，是作者批判的，同时也是《破碎的蛋》的主题含义。谷柳主张“如想鸡蛋儿分得匀，要争世界变大同”，虽然有点儿理想化；但作者的心意是值得我们钦敬的！

《生命的幼苗》社会性很强烈。内容以女医生钱如蕴分别替一个富翁妾侍和一个工人邝财的妻子接生作题材，深刻地暴露人性贪婪的劣根，尖锐地批判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富翁万森泉为了要得到一个儿子，不惜收买医生实行偷龙转凤。而邝财那边，因为家境贫穷，又有很多孩子，打算太太生下女孩便送给育婴堂或别人；假使生下男孩，则“就是做叫化子也要把他养大成人”。结果富翁妾侍生了个女婴，而邝财妻子生下个男孩，于是女医生便实行偷龙转凤。孰知事情给女护士宋珍妮知悉，而邝财妻子以为自己产下女婴，一时气愤，活生生把孩子捏死了。事情弄开了，宋珍妮在良知驱使下，情愿丢去职位，也报警把这件丑恶的事揭破。《生命的幼苗》对人性的刻画非常深致，每个角色的形象很突出，予人一种鲜明感觉。

上面简单介绍过谷柳的八个剧作；综合来说，它们有下列几个特点：

（一）剧作类型多样化。

虽然八个都是独幕剧，但其中又分活报、儿童剧、喜剧、童话剧和歌唱剧等类型，充分表现出谷柳在戏剧方面的造诣和创作能力。

（二）现实主义的主题。

八个剧作虽然类型不同，题材有异，但内容主题都很现实。有革命爱国的《反饥饿》、儿童教育的《前程万里》、刻画人性的《旗袍》和《生命的幼苗》、反映阶级矛盾、批判统治阶层罪恶的《未死的烈士》、《长命百岁》及《明仑江畔》，各有各的社会意义，充分表现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了解华南地方社会和谷柳的思想，无疑很有价值。

（三）地方色彩浓厚。

象谷柳其他作品一样，这八个剧作都是以华南一带作背景，故事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况且剧作的文字，非常通俗；谷柳运用大量广州方言和俗语，甚至一些民谣来创作，无形中加强了作品的通俗性和地方格调，更使华南读者产生亲切的感觉。

谷柳的剧作是值得推荐的；活泼、通俗、写实而又有教育意义。可惜笔者到目前为止只看到上述的8篇，相信谷柳一定还有其他的剧作；希望本文刊出后，能抛砖引玉，有更多的研究者对谷柳的剧作加以搜集和研究！



狗 马 病

张 秦

《史记·汲黯列传》：“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闥，补过拾遗，臣之愿也。’”

这里汲黯自言的“狗马病”，不知是什么病。遍查辞书，不得其解。王先谦氏于《汉书补注》中偶及之，云：“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后人遂有从之者，如王伯祥《史记选》。然而“犬马之疾”究系何病？人焉能患犬马之疾？

查《汉书·汲黯传》，此处为：“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多出“之心今”三字，则其意甚明。“狗马之心”者，谓常怀效忠君国之心，如犬马之报其主也。《汉书·汲黯传》除个别字句有省改外，基本上照录《史记》原文。若果《史记》本作“狗马病”，班固无由擅改为“狗马之心今病”的，因二者意思相去太远。以《汉书》证之，《史记》之“狗马病”中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王先谦不察，强为“狗马病”作解，实误。

培养学生抗腐蚀的能力

何 辛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历史时期中，培养青少年学生抗腐蚀的能力，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这里说的“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就是要使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具有抗腐蚀的能力。

我们要培养学生抗腐蚀的能力，首先对什么是抗腐蚀的能力，它是怎样形成的，要有一个了解。顾名思义，抗腐蚀能力就是抵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的能力；换言之，就是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品德去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某种单一的道德品质，如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等，而是无产阶级思想品德的综合体及其抗拒性的表现；不是某一项思想品德教育的结果，而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反腐蚀教育成功的产物。那么，它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在我们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和道德已经占居统治地位，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和道德的影响。这两种互相排斥的东西体现在青少年身上，就变成了个人的好的或坏的思想品德。所以，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品德则是一种个体现象。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是在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等外部条件影响之下，通过学生思想的心理的内部矛盾运动而形成的。在这里学校教育应起主导作用。然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学校教育就要有正确的要求和合理的措施，增强积极影响，排除消极干扰，促进学生思想的心理的内部矛盾运动，帮助他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形成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当学生有了正确的是非观、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和自我教育的能力等，他们就能够抵制外界剥削阶级思想和道德的影响，使不良的外因不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可见，培养学生抗腐蚀能力的过程，就是用良好的外部教育条件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稳定的思想品德，从而使他们能够自觉抵制外界不良影响的过程。而抗腐蚀能力的形成，就是社会主义学校正确地有效地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反腐蚀教育的结果。

那么,从学生本身的思想行为看,抗腐蚀的能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活动是由需要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驱使人们产生积极活动的精神动力,离不开人们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和追求。需要是人们对一定客观事物需求的表现,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可以分为生理需要,心理需要;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个人需要,社会需要,等等。然而,“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需要和选择满足需要的方式不仅取决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受一定的思想和道德的支配。在利己主义支配下的需要,光追求个人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不管甚至损害集体和社会的需要,这是低级的需要。而在集体主义指导下的需要,则把个人需要同社会需要统一起来,不但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为了崇高的事业和理想,必要时还能牺牲个人生理的和安全的需要,这是高级的需要。因之,所谓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就是被强烈的个人欲望和需求所驱使,不择手段地来满足自己低级的需要。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这种人的精神发展是沿着本能占居优势的路线发展的。”而具有抗腐蚀的能力,则是能排除利己的欲望和需要,有高尚的动机,能使个人的需要服从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所以,培养学生抗腐蚀的能力,就是要使学生发展高级的需要,正确地抉择满足需要的行为方式,让个人需要服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从而摒弃资产阶级物念私欲的诱惑。

抗腐蚀能力也是个体的一种社会态度,包含着认识、情感和行为倾向三种基本成分。它是根据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过程,在良好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发展和提高的。小学的儿童,他们的思想品德虽然较入学前有了丰富和发展,但由于他们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较差,还没有产生自己的道德信念,容易接受榜样的影响,因而他们抗腐蚀的能力往往是教师、家长严格要求和生动榜样激励的结果,带有较大的具体性和依赖性。初中的学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虽未形成,行为习惯尚不巩固,容易感情冲动和接受诱惑,但由于他们开始产生自我意识,形成了概念思维,道德概括水平进一步提高,能遵循长远的社会需要而行动,因而可以提高他们的是非观和道德感,帮助他们形成抗腐蚀的能力。高中的学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形成,道德思维逐渐成为真正的深刻的辩证思维,并产生以道德观为依据的基本道德信念,能够坚决抵制错误的思想观点,因而可以增强他们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培养他们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我们应当按照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去培养他们不同水平的抗腐蚀能力,使这种能力逐步形成和提高。

虽然抗腐蚀的能力是逐步发展和提高的,但它主要是由以下的思想和心理的因素构成:一,有社会主义觉悟,能辨别是非,选择合乎道德的需要;二,有高尚的情操,知荣辱,能追求道德美而憎恶丑恶的东西;三,有坚强的意志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能约束自己,不为邪念物欲所惑;四,有良好的行为习惯,能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从善如流。

学生抗腐蚀的能力既然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进行反腐蚀教育,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呢?

第一，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打好培养反腐败能力的思想基础。

思想认识问题，包括理想、信念，以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具有革命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思想觉悟高；反之，便是思想觉悟低。从教育心理学说，这主要属于道德认识的范畴。事实证明，能抗腐蚀的学生，都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理想，有抱负，能辨别是非的；而一些被腐蚀的学生，则羡慕西方和港澳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空虚，没有革命理想和信仰，缺乏是非观。因此，要培养学生抗腐蚀的能力，就要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阶级观点，打好思想基础。

培养抗腐蚀的能力，要从哪些方面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呢？一、是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人的灵魂，有了灵魂才不会六神无主，迷失方向，应该以六中全会的《决议》为武器，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作些社会调查等，进行生动活泼的有说服力的对比教育。使学生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祖国富强的金光大道；并坚信这些道理的正确，逐步把它变成自己的信念，愿意为之而奋斗。这样，才可使学生的思想行动表现出坚定性与一贯性，防止在政治思想上失却方向，出现缺口。二、是人生目的。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人生观问题。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在校主要表现为正确的学习目的），他的思想行为才能符合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不至于迷惘和堕落。应当通过树立和学习先进榜样，适当剖析一些反面教员等途径，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舒适和享受，而是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符合社会进步的人生目的和学习目的，才是高尚的，值得赞扬的；反之，就是渺小的，卑鄙的。使学生在人生观上筑起一道反腐败之墙。三、是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关系到人的行为规范问题，是判断行为美丑、善恶的标准。应该通过榜样、说理、表扬与批评等途径，使学生懂得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道德的原则，而极端个人主义则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前者是道德的，后者是不道德的。因此，一个人的需要和行为要考虑别人，顾及到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不能损害别人和集体与国家的利益。使他们理解我们的道德原则是高尚的，美好的，而剥削阶级的道德原则则是卑鄙的，丑恶的，从而不做越轨的事情。进行以上这些教育，虽然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在程度和要求上有所不同，但只要他们能以无产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政治方向、人生目的和道德标准问题，不同程度在这些方面建立起是非观和是非感，那就逐步为培养抗腐蚀的能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要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增强形成抗腐蚀能力的情意因素。

情操，就是感情和节操。在我们来说，高尚的情操，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集体主义的感情，以及革命的坚定性。从教育心理学看，这些主要属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范畴。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虽然懂得了道理，但若果缺乏情感的催化和意志的推动，他的认识还是不能转化为果敢的行动的。同样，要培养抗腐蚀的能力，光提高思想

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高尚的情操，才能使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变为行为能力，见诸实践。因此，在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培养他们抗腐蚀的情意因素。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呢？一、要培养集体荣誉感和上进心，克服自私感。有自私感的人，因个人私欲得到满足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这就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而有集体荣誉感和上进心的人，能让个人需要服从集体和国家的需要，力求进步，就不会干出有辱于人格和国格的事情。因此，在帮助学生认识心灵美丑的同时，应当运用各种激发情绪体验的手段，使学生以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为荣，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为耻，克服低级趣味，陶冶崇高的品格。二、要培养深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克服好逸恶劳。具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勤劳朴素，好劳恶逸，才能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永葆革命青春；反之，就很容易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因此，应当通过教育、接触工农和参加劳动，使学生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感情，热爱劳动，手脑并用，并以艰苦朴素为荣，奢侈浪费为耻。如此，才不会被资产阶级的娇奢淫逸所诱惑，迷陷进去。三、要培养和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意志坚强的人可以把自己正确的观念、信念和理想付之实现，而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不但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资产阶级花花诱因面前往往要吃败仗。没有坚强的意志，就没有革命的坚定性，这种人是不可能有高尚的节操的。所以，应该在教育活动和行为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革命意志，使他们既能够经常用高尚的动机去战胜不道德的动机，又能够排除内外障碍，坚决执行由高尚动机所引出的行动决定。以上这些情操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所能产生的，而是生动、深刻的教育扣动人心和认真、刻苦锻炼的结果。只有逐步培养起上述高尚的情操，才能使学生爱美恶丑，趋善避恶，洁身自好，促进抗腐蚀能力的形成。

第三，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使构成抗腐蚀能力的行为表现。

行为是思想的表现，习惯是自动化了的举止。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抗腐蚀的保障；不良的行为习惯，是被腐蚀的漏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有人由于养成了懒惰、贪馋的习惯，便跟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一拍即合，结果腐化堕落下去。这次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所揭露出的一些腐化变质分子，就活生生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和精神情操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是在生活过程和教育过程中培养和形成起来的。针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斗争的情况，我们学校应该通过组织活动、树立榜样、铭记警句、有意练习、表扬批评、奖励惩罚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勤奋学习、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反对无心向学、自由散漫的行为习惯；培养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的行为习惯，反对损人利己、奢侈浪费的行为习惯；培养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行为习惯，反对好逸恶劳、追求享乐的行为习惯；培养团结和睦、友谊交往的行为习惯，反对闹小集团、男女鬼混的行为习惯；培养正当娱乐、陶冶身心的行为习惯，反对追求刺激、低级下流的行为习惯；等等。总之，就是要用教育、管理和奖惩的方法来培养发展好的行为习惯，抑制克

服坏的行为习惯，使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班风和校风。这样，学生抗腐蚀的能力才能从行动上形成起来。

第四，要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提高抗腐蚀能力的自觉成分。

自我教育是学生独立生活的必备能力，是一个人在道德修养上自觉能动性的表现。它既是教育的补充力量，也是教育学生的必然结果。在国内外阶级敌对势力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我们争夺年轻一代的情况下，如果学生不能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时时处处离不开教育者的指点和监督，那他们还是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的危险。因此，在反腐蚀教育中，与从知、情、意、行方面影响学生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使他们逐步能够做到“慎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抗腐蚀的能力就会是被动而脆弱的。这对中学生来说，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从反腐蚀斗争的角度看，应当着重从哪些方面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呢？一、要使学生能够“内省”。所谓内省，就是内心进行省察。青少年是在认识别人的过程中，逐步学会以别人为“镜子”来认识自己的，他们的道德评价能力正在形成和提高。因此，应该通过评比、学习先进人物和道德谈话等途径，使学生能以是非观和道德感来分析、评价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努力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有了这种能力，他们就会检点和省察自己，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染，避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二、要使学生能够激励自己。激励自己，就是运用自我鼓舞、自我分析、自我誓约、自我命令、自我禁止等手段，激发自己的意志。如此，他们就能够排除外界不良的影响和干扰，努力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应当利用鼓励进步、严格要求、指导锻炼和集体舆论等方式，培养学生这种激励自己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坚持正确的行动。三、要引导学生锻炼克己制欲的功夫。要想抗腐蚀，则必须抛弃一切不道德的奢想和不合理的欲望和需求，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引导学生在日常实践中不断与私心物欲作斗争，培养自己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情操，练就克己制欲的功夫。这样，他们在资产阶级声色犬马引诱的面前，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诚然，学生这些自我教育能力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要求过高过急，但只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培养，他们自我教育的能力是可以不断增强的。

此外，由于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势力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因而在培养学生抗腐蚀的能力中，学校不但要充分运用集体舆论的力量，重视形成和发展良好的校风，而且要争取学生家庭和社会的配合，使形成强大的一致的教育力量。同时，要注意满足学生在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的正当需要，开展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免使他们的需要向不正当不健康的方面发展，并坚决取缔反动黄色的录音录象制品和淫秽书画在学生中播放及流传。所有这些，都是培养学生抗腐蚀能力所不可忽视的。

后进生的形成及其转变

黎民安 刘大德

思想品德教育是培养革命新一代不可缺少的一个教育内容。近年来，由于各校加强对学生道德品质教育，学校出现了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新风气，涌现一批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的好孩子。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着少数学习落后或在道德品质上有不同程度严重缺陷的后进生。

为什么在学生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品质表现？其原因是什么？如何矫正这些学生不良品德？笔者通过对广州市×××小学十六名典型的后进生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分析，试探讨一下后进生的形成及其转变问题。

现把十六名后进生的调查情况列表如下：

编号	在 期 学 间	年 级	姓 名	性 别	智 力 发 展	道德品质不良的表现	转变后的表现
1	1961 至 1964	四 至 六	张 × ×	男	优 等	吸烟、赌博、殴打同学，捣乱课堂纪律、无结伙闹事的特征，但能左右全班局势，自由散漫、无心向学，成绩低劣。	任少先队大队长，评为市优秀队员，入团后参军，又加入了党。（见《南方日报》1963年6月1日）
2	1974 至 1975	五	戚李 ×× ×× 郑潘 ×× ××	男	优 等	结伙闹事，称“四霸”，专去打干部、吸烟、赌博，对抗教师、偷窃，欺侮同学。学习成绩不稳定。	美术组与武术组的骨干、班委会主要力量，评为“三好学生”。（见《南方日报》1975年6月1日、1980年2月19日）
3	1977 至 1978	五 (上)	周 × ×	男	优 等	贪小便宜、殴打同学、学习成绩不稳定。	拾获上海牌新手表一块，主动交还失主。（见《广州日报》1978年4月22日）

4	1978 至 1978	初一 (下)	张 × ×	男	优 等	吸烟、赌博、偷窃、拦路抢劫同学的钱粮，敢于对抗老师，持刀抗拒家长的管教，学习成绩低劣。	克服不良习气，成为班里热心的图书馆管理员。 (见《广州青少年报》1978年7月28日)
5	1978 至 1978	初一 (下)	唐 × ×	男	优 等	长期逃学，在社会上结伙胡混，沾染偷、赌、骗以及流氓习气。	坚持上学，加入了少先队，乐于为集体做好事。 (见《广州青少年报》1978年8月18日)
6	1978 至 1979	五	张 ×	男		好勇逞强，曾从宿舍三楼跳下。上课随意离开座位，听课如坐针毡，称为“软皮蛇”，学习成绩仅仅及格。	加入少先队，成为优等生。 (见《广州日报》1979年7月24日)
7	1978 至 1980	五	谢 ×	男	中 等	殴打同学、殴打家长，自由散漫，主科成绩经常零分，有“白卷先生”的外号，连续读了三年毕业班。	加入了少先队，写了数万字日记，自学了千计的数学题，评为学习积极分子，考上了中学。 (见《广州青少年报》1980年10月10日)
8	1979 至 1980	五	黄 × ×	男	优 等	留长发、穿喇叭裤、经常寻衅闹事，调戏女同学，贪小便宜、打架，无心向学，四年级留级。	加入了少先队，文体骨干，文学兴趣小组成员，毕业成绩良好，考上中学。(见《广州青少年报》8月22日)
9	1980 至 1981	五	陈 × ×	男	优 等	捣乱课堂纪律，损坏公物、撒谎，主科成绩不及格。	加入了少先队，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被评为“小虎子”。
10	1980 至 1981	五	万 × ×	男	优 等	喜欢侮辱女同学，扰乱课堂秩序，有偷窃行为，包庇坏行为，讲义气，流氓意识较重，无心向学。	乐于助人，报刊发行组长，学习成绩明显上升，评为“四美”竞赛活动的积极分子。
11	1978 至 1979	五	江 × ×	女	中 等	无品德不良行为，学习成绩不稳定，接近及格。	优等生，考上重点中学。

12	1978 至 1980	五	冯 × ×	男	优 等	炒卖票证，经常逃学，三年级学会吸烟、赌博，流氓习气重，敢于打父母，夜间结伙胡混，学习成绩差，连续读三年毕业班。	克服旷课行为，养成尊师守纪习惯，加入了少先队，考上了中学。（见《羊城晚报》1980年4月10日）
13	1979 至 1980	五	陈 × ×	男	优 等	长期逃学，露宿街头，结伙扒窃，敢于持刀威迫家中老人索取钱粮，拦路抢动同学的零钱、粮票，好勇斗狠，专与教师对立，殴打校长，刺伤同学，称“小牛精”。	坚持学习，加入了少先队，学习成绩明显上升，考上了中学，班里文体组干事。（见《中国少年报》1980年9月3日）

从上表所列的情况分析，造成学生品质不良的客观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1、社会的不良影响。

首先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青少年身心造成严重的创伤。这十六名后进生中有十五名是“生在红旗下，长在动乱中”的。当他们懂事的时候，正是“四人帮”横行肆虐的年代，社会和学校都充满了混乱。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这一代青少年的心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毒害，以致无心向学，沾染不良道德行为。其次是社会上剥削阶级影响的侵蚀，如一些坏分子常常利用青少年的无知和好奇心，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书、坏故事、坏风俗，散布低级趣味，在吃喝玩乐中引诱，腐蚀和教唆青少年犯罪。冯××、陈××就是受了社会上一些坏分子引诱，长期逃学，露宿街头，结伙扒窃，夜间结伙胡混，甚至敢持刀威迫家中老人索取钱粮的。

2、家庭的不良教育和不良环境的影响。

有不良行为的后进生，往往与其家庭不良教育有关系。有的家长缺乏正确的管教子女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对子女放任不管或训斥、打骂；有的家长过分溺爱，袒护；有的父母因家庭不和、离婚，对孩子心灵造成创伤；有的家长本人有偷摸、贪小便宜、生活作风腐化的毛病，而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十六例后进生的家庭、学校调查：

家 庭	家长文化程度				溺 爱	教 育 粗 暴	有 恶 习	包 庇 坏 行 为	双 职 工 户	寄 居 他 人	要 求 不 一 致	父 母 离 婚	行 为 不 检	有 犯 罪 活 动	社 会	与 坏 人 结 伙	接 近 落 后 意 识	西 方 影 响
	大 学	中 学	小 学	文 盲														
	1	4	1	10	10	4	2	4	14	1	9	1	1	1		4	14	12
	6.3	26	6.3	62.5	62.5	25	12.5	25	87.5	6.3	56.3	6.3	6.3	6.3	会	25	87.5	75
	%	%	%	%	%	%	%	%	%	%	%	%	%	%		%	%	%
学 校	被教师嫌弃（师生对立）				受同学嘲笑（与干部对立）				申请入队未获批准				被排斥参加集体劳动					
	15（93.80%）				16（100%）				11（68.8%）				14（87.5%）					

说明：生理遗传素质均无病态，发育正常。

3、学校教育工作上的缺点。

由于一部分教师教育观点的错误，教育方法的缺点给学生不良品德的形成与恶化提供条件。如对品德不良学生不能一分为二，看不到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对他们和其他学生不是一视同仁，学生得不到及时的关怀和帮助反而使缺点错误更加发展。从上表调查中可以看到：被教师嫌弃有15人，占98.8%，有的教师对后进生采取惩办主义，任意停课，赶出教室，赶出校门，动不动就处分，使学生产生对立情绪或失去了自尊心和自信心。

十六例后进生智力与性格特征分类：

项目 比例	智力 落后	学习 落后	情绪特征（不 安 宁、 不 稳 定、 易 冲 动）			意志特征（胆 大、 不 畏 难、 任 性、 难 自 制）			对现实的态度						性格类型		
			极表 端 现	明表 显 现	无表 现	极表 端 现	明表 显 现	无表 现	对己（自尊、 自高、 自私）			对人（多疑、 对喜忌、常怀敌 意）					
									极表 端 现	明表 显 现	无表 现	极表 端 现	明表 显 现	无表 现	明外 显 向	明内 显 向	不明 显
人数	0	16 100 %	4 25 %	11 69 %	1 6 %	5 31 %	10 63 %	1 6 %	4 25 %	11 69 %	1 6 %	3 18 %	7 44 %	6 38 %	15 94 %	0	1 6 %

十六例后生气质类型

气类 质型	胆汁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抑郁质
个性 差异	易怒，精力充沛，感情和语言动作发生强烈迅速而难以控制的状态，冷静后对自己的不轨行为又会产生悔悟。 （黄胆汁过多）	热心而喜欢活动，善于计算，情感发生慢，持久而不显露，动作迟缓而不大灵活。 （血液过多）	冷静沉着，善于计算，情感发生慢，持久而不显露，动作迟缓而不大灵活。 （痰液多）	敏感怯弱而易于抑郁、体验丰富而内向，动作缓慢无力。 （黑胆汁过多）
人数 比例	7（44%）	9（56%）	0	0

如表列的比较，可知后进生的气质类型多属胆汁质和多血质。智力发展正常，但学习落后，自尊、自私或讲义气，好勇、胆大、任性。我们要掌握他们的性格特点，了解他们形成不良品德的主、客观原因，经过正确教育引导，是可以转化并能走上正确轨道的。事实上，这十六例后进生在教师的教育引导下，都成为好学生。

矫正后进生不良品德有那些途径呢？笔者通过实践体会到可以归纳七个方面：

一、要教育和转变后进生，必须信任和热爱后进生，使之确信教师的真诚与善意，消除他们疑惧心理与对立的情绪。这是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首要条件。品德不良学生往往比较“心虚”、“敏感”、“有戒心”、“有敌意”，对教师有对立情绪。对教师教育和批评，常常持以沉默、回避或粗暴无礼的“反抗”的态度。为了消除疑惧心理和对立情绪，我们要满腔热情去关心和爱护他们，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们，使他们信任教师的真诚和善意，把教师当作知心人。《学记》中说：“亲其师，信其道”，只有教师从内心到行动尊重、爱护后进生，使之感到教师的温暖，进而感到党的关怀。这时他们就会对教师产生由衷的尊敬和爱戴，并乐于接受教师的教育、要求和指导。马卡连柯就曾经以真诚的信任，爱护、尊重并改造一个流浪儿童成为优秀共产主义战士。从我们教育十六个后进生实践过程中，也深刻说明这一点道理。

在一九七八年，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就曾遇到一个居然敢持刀对抗家长的学生小张。开学前，我们去家访，他躲在厨房里偷听，以为老师要向家长说他什么坏话。但由于我们对他过去的问题一点也没有向家长讲，而是和家长一起商量如何关心他读书和生活。开学后，我们了解他喜欢看图书，就和他商量办图书角，并请他当图书管理员，他逐渐对我们产生好感。有一次，我们叫他写小结，他不明白我们的意思，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都写出来，我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张，现在不是要你写过去犯错误的清单，而是要你写管理图书的经验，你回来再写吧！……”他听了感到惊奇，他过去写的都是检讨书、坦白书，从未写过什么经验。当他第一次在同学们掌声中登台介绍经验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帮助他认识过去错误，寻找根源，鼓励他继续前进。小张终于变好了，并被评为“三好”学生。当他离开母校时，他把自己四十多本图书送给学校弟妹班。由此可见，教师在教育后进生时，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真诚关心和爱护他们，而不能刺伤其自尊心和上进心。因为感情和意志是紧密相联的，师生间的真挚思想感情会转化为行动的力量，驱使学生的意志行动去抑制和改正自己错误行为。

二、善于抓住转机，掌握规律，促进学生品德的转化。从前面十六个品德不良学生的转变，说明后进生一般要经历醒悟、转变、反复、巩固、稳定的过程。他们在转变的过程中，不是直线形的，而是螺旋形推进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艰苦性与长期性。因为，改造比塑造更困难，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有塑造问题，也有改造问题。一般来说应以塑造为主。但是从目前学生的品质现状来看，我们面临着相当大的改造任务。一些学生在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已形成了不正确道德认识和评价道德行为的标准。这就要求我们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时，必须细心调查学生头脑中已形成了不正确的道德观念，抓住关键时机，加紧工作，积极促转化，培养起学生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在十六个后进生事例中，有这样两个学生，一个叫冯××，外号“软皮蛇”是连续两年留级双差生，读了七年书连一封简单的信也不会写。一个叫陈××，外号“小牛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逃学，在社会上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干坏事，甚至炒卖票证，

经常露宿街头不回家。为了探索教育小冯和小陈的新途径，我们主动接近他们，找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性格、爱好和心理特点。刘老师还征得他们家长意见，把他们带回学校，跟刘老师一起住宿生活，隔绝他们与社会不正当的人联系。每天早晨，刘老师带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晚上辅导他们学习，有时大家一起看电视，一起谈心。开始，他们有了进步。但有一次刘老师把一串锁匙交给小陈回房拿东西时，小陈竟趁机打开刘老师的抽屉，拿走五十多元，与社会上一些有流气的人胡混。有些好心人于是劝刘老师莫把“老鼠捉入米缸”了，把小陈送回家算了。刘老师却说：“教育后进生是我们人民教师的责任，多挽救一个孩子，革命就多一份力量。”于是，刘老师和家长一起去寻找，终于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在长堤一间屋檐下找到熟睡了的小陈。刘老师没有责备他，并劝家长也不要打他。小陈很受感动，两眼闪出泪花，承认自己过错。刘老师抓紧这个转机，更加关心和帮助他改正自己缺点，培养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小陈和小冯后来终于改正了不良行为，成长为较好的学生，并升上中学读书。通过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做后进生转化工作，必须耐心、细致，善于引导。学生行为出现反复时，教师绝不能气馁或放弃教育，而应该抓反复、反复抓，坚持不懈地做工作，逐渐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因材施教。缝衣服要“量体裁衣”，种庄稼要“因地制宜”，育人则要“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是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个性差异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摸清学生性格中的优缺点，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发展每个学生合理兴趣、多种才能和健全性格。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实践表明：没有兴趣没有求知欲，没有求知欲就不能认真学习更不能发展学生智力。对后进生，学习最好的刺激是使他们对所学的东西发生浓厚的兴趣。如十六例中的张×，个性爱动，放学回家经常和弟弟捉迷藏，打地道战。我们根据他的特点，让他参加乒乓球队，邀请他参加假日活动。在活动中我们指导他观察事物，学写日记，把他爱动的个性转向学习方面，使其学习兴趣调动起来，学习成绩也提高了。另外，班里有四个被称为“顽童”的学生，他们经常逃学，欺负同学，但他们却喜欢看连环图。我们就根据他们性格爱好，指导他们看连环图，并组织他们学画学雷锋、树新风的连环画。在举办班的画展时，我们让他们当讲解员，从中接受教育，他们个性爱好在正确的引导下得到发展，学业成绩也提高了。其次要结合学生日常在学习或纪律上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对症下药。十六个后进生中，各人有各人特点，而且在前进中也有反复。他们内心世界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就要根据他们个性特点进行教育，出了问题要及时解决，平时则要做到防微杜渐，在问题刚暴露时就得及时解决。对于自卑或自暴自弃的学生，教师则不要过多地去苛责，而要通过暗示、表扬等办法使他看到自己的优点与能力，使其增强信心；对于自尊心强或自高自大的学生进行批评时要顾及情面，留有余地，还要抓住他的上进心，设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缺点或不足；对于“吃软不吃硬”或倔强的学生，教师要力求心平气和与避免顶牛；对于“吃硬不吃软”或轻率的学生就不能过于迁就和温存。因为学

生的个性多种多样，所以教育的方法也不能千篇一律。

四、锻炼与诱因作斗争的意志力，巩固新的行为习惯。学生已形成的不良习惯，总是在一定的诱因影响下，受到内部错误观念的支配，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对一种错误的行为的矫正，既要改变不合理的要求，也要尽可能控制诱因的影响。因此在矫正错误行为的初期，切断诱因是必要的。如让学生更换环境或暂时避开某些诱因（如同伙的小兄弟）都是有益的。不过，避开诱因也是消极的办法，根本的办法是使学生增强在各种环境的诱因下都不受影响，而坚持正确方向的能力。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能光是一味禁止、惩罚，应创设新环境使学生锻炼意志力，培养其独立地与外部诱因作斗争的力量，并在锻炼意志的过程中形成和巩固新的行为习惯。如上面讲到冯××和陈××，刘老师把他们接回学校住宿，就是为他俩更换环境，避开与同伙小兄弟接触的机会。在学校同老师一起住宿，就容易矫正他们的不良习惯，锻炼他们与诱因作斗争的意志力，逐渐培养他们良好生活习惯和意志力。

五、点燃学生自尊心的火种，培养其集体荣誉感。青少年自尊心特别强，并且特别敏感，教师必须善于扶植、培养，尊重后进生的自尊心，激发他们好学上进，维护集体荣誉，为集体为人民多做好事。马卡连柯曾经说过“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的尊重一个人。”尊重，就是热爱、相信和依靠。这是转变学生思想的关键，是添给学生“自尊心”的原油，是点燃学生自信心的火种，是推动学生前进的原动力。如陈××同学在开学初曾经有这样的内心活动：“我是有名的后进生，同学们讨厌我，说我害了集体，想把我轰走，有时我做了好事别人也不信，还说我‘假积极’。入队、评积极分子，从来没有份。”因此，小陈心灰意冷，有自卑感。如何点燃这个后进生火种呢？我们抓住他想入少先队动机，鼓励他写申请书，让他在全班同学中宣读了入队申请书，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这就点起他上进心的火种。接着，我们让他担任班的文体用品小保管员。他工作认真积极，利用中午时间补图书，自己还给班里献了好多新书。有一次，他发现少了一个棋子，心里很着急，一直找到棋子才肯回家。他对工作的热爱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受到班的表扬，名字上了光荣册，后来还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有一次少先队到烈士陵园过队日，突然刮起狂风暴雨，小陈不顾暴风雨，到处寻找同学集合，当了老师的有力助手。以后，他经常为集体做好事，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我们通过小陈的转变体会到，教师对后进生要爱护和关心，决不能动不动就批评、训斥，刺伤他们的自尊心。教师要用放大镜来发现品德不良学生身上的优点，更多地采用赞许、表扬、奖励、信任的办法。在班里设置进步生、跃进生积极分子、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以激励学生上进，是培养自尊心的有效办法。

六、培养学生形成是非观念，提高学生辨别是非能力。是非观念薄弱，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一些学生犯错误的原因之一，也是品德不良学生的心理特点。是非观念差的学生不能在出现错误举动时，及时辨别，加以制止；在犯了错误之后，也不会产生懊悔与改善的意向，因而一错再错，变成品德不良学生。所以，形成是非观念，提高学生

辨别是非能力，是使学生自愿改正错误行为与坚持正确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为此，我们就要对学生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道德观念教育，使之逐步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精神。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运用这些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种种是非、善恶、美丑问题，解决自己头脑中的这类矛盾。

青少年时期，人的抽象思维日益占主要地位，但具体形象的成分仍然起重要作用。帮助犯有过错的学生形成是非观念的方法是多样的，比如坚持说理教育，严格要求，组织舆论，开展思想斗争，在舆论中提高学生行为评价能力，奖惩分明、以奖为主以及树立榜样等，都可提高学生辨别是非能力。而进行榜样教育，不仅是符合学生心理上模仿需要的，而且作为教育手段，它也完全符合学生认识的特点。榜样使学生更具体地理解了道德要求，也就是说理教育的一种直观形式吧。另外根据少先队的特点开展活动，寓教育于活动之中，能使儿童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更多主动性，更能给儿童创设新的情况，提高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区分和识别各种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的界限。

七、学校、家庭和社会统一配合，贯彻教育一致性，这是转化后进生一个重要条件。前面十六例作了分析，后进生的形成同社会上、家庭上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转化后进生不但要教师做细致、艰苦的工作，而且要争取社会上家长上给予配合。在新时期中，家庭教育、社会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把学校、家庭和社会统一起来，步调一致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期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看到，十六例中，家庭教育不妥的就有十二例，占75%。后来通过教师做工作，帮助家长纠正不正确教育方法，使这些后进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这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局限在学校里，而要扩展到学生的家庭和社会上去，尽量扩大校外的积极影响，减少消极的干扰，做到扬长避短，使之步调一致地协同教育。作为人民教师，应当做好学生家长的工作，调动各种教育力量组成教育联合阵线，同心同德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就会收到更好的成效。

总之，对品德不良的学生，只要我们热情地关怀他们，严格地要求他们，摸透他们的心理，有的放矢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是能使他们中大多数健康地成长的。作为一个教育者，应该具有钢铁般的坚强信念，火一般的革命热情，蜜蜂那样勤劳，去培养和塑造年青新一代，使他们成长为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学术研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越秀北路 222 号

邮政编码：51002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 国 国 际 书 店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 2820 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35元

广东省期刊丛刊登记证第六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